



2009年第3期（总第18期）

本期导读

“全国第16届苏轼学术研讨会暨全国苏轼遗址景园旅游发展论坛”2009年9月8-10日在徐州召开。与会代表身临其境地感受了徐州市人民政府投资12个亿在云龙湖风景区、故黄河风光带打造的全国面积最大、景点数量最多的“苏轼文化游览区”。徐州的水如云龙湖、微山湖、故黄河、汴水、泗水，仿佛苏轼生命情态、生活智慧、价值取向的一缕微风、一抹影子、一些象征，仿佛苏轼的奉献、包容、不争、力量、低姿态、顺势而为、因物赋形等意绪纷至沓来。

苏轼知徐州，梦想营造杭州、西湖一样的人居环境。他曾经考察云龙湖（原称石沟湖）上游丁塘一带，并说：“若引上游丁塘之水以注，则此湖俨若西湖，而徐州俨若杭州。”之后，所到之处亦有如此的生命冲动，因此秦观说“我公所至有西湖”。如今，杭州西湖、惠州西湖、颍州西湖、扬州瘦西湖，凤翔东湖、徐州云龙湖的山水形胜、东坡韵味，无不昭示苏轼对水的偏爱、人们对水的理解以及文化与水的融合，人与水近，心随尘远。

“本期关注”刊发了大会的欢迎词、开幕词和会议综述，其它栏目选发了与会代表提交的部分论文，如著名苏学专家曾枣庄教授的《身行万里半天下——论苏轼的杂记文》，高屋建瓴，示范后学；如孟昭全的《关于创立苏学发展学的构想与建议》、韩国强的《浅谈苏轼的徐州词》、苏士福的《从苏轼上元诗词看其忧国爱民之情》等。

刘尚荣、赖正和二编审，管成学、陈子彬二教授的文章也会给你耳目一新之感，敬请关注。

蘇 軾

2009年第3期(总第18期)

研究 SUSHIYANJIU



目 录

- 编辑出版:《苏轼研究》编辑部
- 主办单位: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 协办单位:四川省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四川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 主 编:张志烈
- 执行主编:周成仕
- 副 主 编:宋明刚 蔡心华
- 责任编辑:刘清泉
- 编 辑:唐雅兰
- 特邀编辑:孙开中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三苏纪念馆三楼
邮编:620010 电话:(0833)8299103
[Http://www.3swh.com](http://www.3swh.com)
E-mail:sushiyanjiu@163.com
准印证:四川省刊型内部准印证
(2006)第03-007号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年9月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本期特稿

- 《苏轼为官之道》绪论 苏 灿/4

□苏学论坛

- 身行万里半天下 曾枣庄/16
——论苏轼的杂记文
- 《类编老苏大全文集》初探 刘尚荣/24
- 相濡以沫,生死与共 管成学/28
——苏颂与苏轼亲情考述
- 从苏轼上元诗词看其忧国爱民之情 苏士福/34
- 东坡调谑亦雅诮 许植基/39
- 庐山一游,卓绝千古 山流水/42
——《记游庐山》在“苏轼生平传记”中的选用评析
- 也探三苏故居 赖正和/45
- 苏洵对族谱学的贡献 陈子彬/50
——恭读苏洵经典之作《族谱后录》

□顾问：蒋仁富 李 静 苏 灿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孔凡礼 王水照
刘乃昌 朱清华 刘尚荣
邱俊鹏 周先慎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影聪 王晋川 方永江
刘川眉 孙开中 苏 灿
陈 弼 李显平 宋明刚
何家治 张志烈 张忠全
杨胜宽 杨常沙 周成仕
周裕锴 蔡心华

□苏文感悟

浅谈苏轼徐州农村词

韩国强/55

□景苏札记

苏东坡的政治人生(第一章)

雷金贵/66

□新书序评

《叶梦得与苏轼》序

张志烈/58

《东坡文化产业发展概论》序 王 均/60

□本期关注

“全国第16届苏轼学术研讨会”欢迎词 段 雄/73

“全国第16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张志烈/74

“全国第16届苏轼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希龙/77

关于创立苏学发展学的构想与建议 孟昭全/79

□苏学专家

走入苏海

何晓苇/62

——杨胜宽先生的苏轼研究道路

□苏学动态

远追东坡遗韵，近承时贤风流 白 水/80

——“全国第16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在徐州召开

说东坡，品东坡

白 水/80

——康震莅临眉山

西方汉学界的苏轼研究

唐凯琳/64

——比较文学

《苏轼的为官之道》绪论

苏灿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苏轼为官的时代背景、五个阶段、基本理念、千秋功业和几点启示：为官之道，以民为本；谋事之道，以实为魂；做人之道，以廉为先。

关键词：为官之道 谋事之道 做人之道

在我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提出了许多治国安邦的良策，总结出了不少从政为官的经验教训，留下了许多从政为官的优秀论著。它们或者是讲述做官的准则，或者是讲述做官的方法，或者是讲述做官的业绩……所有这些从政为官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都为后人安邦治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后人所遵循、传颂和敬仰。

北宋一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苏轼，从嘉祐六年（1061）登上政治舞台到1101年病逝江苏常州，从政经历了40年，在这个过程中，他先后几次进入朝廷做官，历任兵部尚书、端明殿侍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先后在凤翔、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10多个地方长期担任行政长官，提出了很多精彩的为官思想、观点和方法，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从政经验，取得了为人称颂的为官业绩，受到后人的赞叹，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和借鉴。

历朝历代以来，很多专家、学者都十分注意研究苏轼留下的文化遗产，但是绝大多数都集中在苏轼文学艺术领域方面，而对于他从政为官的研究还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论文，应该说也是十分可喜的事情。本书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苏轼为官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全面地集中展示了苏轼为官从政40年的思想观点和政务活动，对于我们批判地继承苏轼为官从政的

这份政治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一、苏轼为官的时代背景

宋代从公元960年宋太祖建国开始，到1279年宋代的灭亡，前后经历了320年的历史。其中，又分为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期，北宋从960年开始到1127年灭亡，前后经历了167年，这167年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可以说是北宋政治经济走向繁荣的时期，后一个阶段则是逐渐走向衰弱的时期。苏轼就在北宋政治经济从繁荣走向衰弱的重要转折时期来到了这个人世上，经过家庭和乡学的教育以及朝廷的考试，逐渐成长起来，走上了北宋的政治舞台。

苏轼诞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农历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逝世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他以66个春秋走完了辉煌而悲惨的人生，结束了长达40年曲折而坎坷的从政生涯。为了全面准确地把握苏轼60多年来的人生经历和40年的从政生涯，我们有必要对苏轼从政为官的北宋时代，主要是从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五个皇帝统治时期的时代背景作一个大致的回顾。

翻开中国历史，特别是北宋时期的历史，使我们看到苏轼出生在北宋从兴盛到衰亡的转折时期，他为官于北宋经济社会积贫积弱的年代。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机构臃肿，官员泛滥。据史料记载，仁宗一朝，13次科举，取进士4千多人，诸科5千多人，中举者都陆续加入了国家官员的行列。

仁宗时，户部副使包拯上疏说，真宗时，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现在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及守选人，还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超过了一倍多。此外，等候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再加上朝廷和地方官员贪污腐化成风，以受贿为生，导致官僚机构日益腐败。

第二，军队庞大，负担沉重。宋太祖时，全国有禁军十九万三千人，到了仁宗时代，禁军激增到八十二万六千人，全国军队总计达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军队的数额十分庞大，随之而来的军费的开支十分惊人，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国家赋税总收入的十之七八，也就是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收入都用于养军队，财政负担十分沉重。

第三，财力亏空，赤字加剧。宋仁宗、英宗、神宗统治下的几十年时间，是宋朝经济向前发展的时期，也是统治集团衰弱腐朽的时期。从宋朝开国到真宗、仁宗时，国库连年亏空，支出大大超过了收入。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英宗治平二年（1065），朝廷的剥削收入，达到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但这年朝廷的支出有一亿二千三十四万，非常支出又有一千一百五十二万多，财政亏短一千五百多万。这些数字说明了宋朝的财政危机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

第四，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宋真宗到英宗统治时期，农民和士兵的起义接连不断，包括赵延顺起义、王长寿起义、陈进起义、王伦起义、张海起义、保州士兵起义、王则起义以及四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所有这些起义都极大地震动了宋王朝，给予宋朝以沉重的打击。

第五，改革变法，呼声不断。从真宗到仁宗，改革的呼声不断，比较有代表性人物和主张有：范仲淹的新政、文彦博的“省兵”、王安石的万言书、司马光的上三札等等，希望改变现状，富国强兵的呼声十分高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变法派与保守派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论争，尤其是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代表的两派斗争更加激烈，随之而来的出现了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局面。

苏轼就是在这样的经济政治背景下来到了人世，并且在家庭的熏陶下参加了科举考试，走上了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五个皇帝统治的长达40年的政治舞台。一方面，统治集团内部要求变法与反变法的论争，此起彼伏。

另一方面，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群众的起义不断，在这样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加上他的为官理念和处事性格，决定了他从政为官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是曲折的坎坷的，最终成了统治集团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二、苏轼为官的五个阶段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他从小“奋厉有当世志”，七岁读书，八岁读小学，十岁由其母授其书至十六岁，便能写出数千字的文章。嘉祐元年（1056），19岁的苏轼和弟苏辙，随父苏洵赴京应试中举，次年正月赴省试，以《刑赏忠厚之至论》博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赞赏，名列第二名。同年三月，宋仁宗主持殿试，苏轼中进士乙科，苏辙也同榜及第，赢得金榜题名，名满京师，取得了走向仕途的通行证。

第一阶段：初仕凤翔。嘉祐六年（1060）十一月，朝廷授予苏轼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简称凤翔府判官）。苏轼带着他的第一位夫人王弗，满怀壮志豪情走上了他人生仕途的第一站。苏轼在凤翔任职三年，初步展示了他的政治抱负和组织才华，他除了“签书一局，兼掌五曹文书”外，还负责着“编水筏竹”供应京都、集运军需供给西部边防两大要务。他针对“衙前”之役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从实际出发，大胆修改衙规，提出“自由择取水工，以时进止”的主张，从此使“衙前之害减半”。另外，苏轼还提出改革“官僚”，免债放欠等建议，主张政府让利于民，与此同时，他还疏浚了东湖造福后代，受到老百姓的赞扬，被人们誉为“苏贤良”。

第二阶段：湖州惊变。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苏轼在凤翔任满被调回京师，进直史馆。这两年，苏轼家中遇到两大不幸：一是年仅27岁的结发妻子王弗去世；二是父亲苏洵又相继病逝。他由此中断了在朝廷做官的日子，转而回乡服孝。1069年2月还朝后，又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此时，正值王安石执政，苏轼直言敢谏，引起王安石不快，把他放到开封府做推官。王安石实行新法，二人在改革的内容和方法上产生了分歧，一个主张激变，一个主张渐变；一个侧重变法，一个侧重任人。在政见严重不合的情况下，苏轼自

本期特稿

已提出外任，终止了在京城为官的机会。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调任杭州通判，他在任职期间，勤于政务，甚至在除夕之夜，也在公堂之上忙于处理囚犯事务；他还组织灭蝗、赈济饥民、疏浚六井，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时年39岁的苏轼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又三年，熙宁十年（1077）改知徐州，在徐州任上遇到了黄河决口，彭城被洪水围困，他组织军民抗洪抢险，保护了彭城，受到了朝廷嘉奖。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又知湖州，到任不满三个月，便被李定、舒亶、何正臣等罗织罪名，于八月十八日被捕入狱，造成了有名的“乌台诗案”，使苏轼的仕途受到了一次重大的打击。后来由于神宗皇帝的深怜和太后的提醒以及各方的营救，终于使苏轼得到了从宽处理，十一月二十八日结案出狱，结束了长达百余天的牢狱之灾。

第三阶段：贬谪黄州。“乌台诗案”结案后，苏轼的性命虽然保住了，但是他的仕途却受到了重创，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由一个地方长官，堂堂太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苏轼到达黄州贬所。黄州这几年，苏轼生活简朴，厉行节约，艰苦度日。他在友人马梦得为他求得的一块数十亩废弃了的营地上，开垦荒地，修房起屋，自称“东坡居士”，从此，“苏东坡”之名就闻名海内，直至今日。苏轼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十分充实，写下了一系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中国豪放词派的顶峰之作；他的《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奠定了他在中国散文创作史上的崇高历史地位。苏轼在黄州生活了四年之后，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三月，奉召汝州团练副使，一路走来，历经庐山、金陵，不仅写下了著名的《题西林壁》一诗，而且还前往半山园拜见了罢相隐居的王安石，最令他痛心的是第四子遁儿夭亡于金陵，东坡在百般哀痛之余，乃上表乞居常州，得到了朝廷的许可。

第四阶段：朝廷重用。正当苏轼前往常州居住之际，这时朝廷传来力主改革变法的神宗皇帝驾崩的消息；随之，由年仅十岁的哲宗继位，朝廷大权实际上掌握在了反对改革变法的宣仁太后手里。宣仁太后大权在握，迅速启用司马光为宰

相，苏轼也在这个大气候下，得到了朝廷一连串的提拔重用。他先是复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到任才五天，又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再迁起居舍人。次年，即元祐元年（1086）又迁中书舍人，寻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二年，兼侍读，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一、二年间，青云直上，堪称苏轼毕生仕宦的得意时期。苏轼还朝以后，虽然位高权重，但是他与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主张又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尤其是在“免役法”的兴废问题上争论激烈，气得苏轼回到家还痛骂“司马牛！司马牛！”因而遭到司马光等旧党的仇视，不断上书诬陷、攻击，使苏轼在朝廷无法立足，被迫再度请求外任。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二度到杭州担任太守。这次作为一把手的苏轼到达杭州后，充分展示了他在地方为官的能力。他体察民情，疏浚西湖，修建苏堤，创办医院，深得百姓的崇敬和爱戴。元祐六年（1091）五月，苏轼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师，恰逢朝中洛、蜀党争，苏轼又遭洛党弹劾，只好再求外任。同年八月，苏轼除龙图阁学士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元祐七年（1092）二月，苏轼又改知扬州，三月十六日到任，工作不到半年，又以兵部尚书召还京师。

第五阶段：再贬三贬。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逝，18岁的哲宗终于亲临朝政，他上台后，一改高太后的做法，罢了反对新法的官员，启用章惇为相。这时的苏轼失去了高太后这一座政治靠山，只得再求外任，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罢去了他的礼部尚书职务，以端明殿学士、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县）。苏轼在定州期间，虽然遭贬，但仍然心系国家，尽力戍边，整顿军纪，惩治贪污，修葺营房，深得军心。绍圣元年（1094），朝廷大贬元祐旧臣，苏轼再遭诬陷，先被削去两学士之职，谪知英州（今广东英德），途中未至，又三易诰命，钦差快马传旨：“知英州苏轼，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惠州地处岭南，属蛮貊之邦、瘴疠之地，是古来封建统治阶级惩处逆臣、放逐政敌的险恶场所。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苏轼携带王朝云来到了惠州，他过起了恬淡闲适的生活。常常写诗抒情，后来被传到了宰相章惇耳里，章惇听罢就再次将苏轼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治所在今海南省儋州市中和镇）安置，把62岁高龄的苏轼发配到了海外最偏远、最险恶的地方去。苏轼到儋州

后被逐出官舍，一度过着居无室、食无肉、病无药的凄惨生活，还是在村民的帮助下，在一片桄榔树下搭起了五间茅屋栖身。苏轼在这里传播中原文化、开凿井泉、介绍农耕方法、破除迷信、散发药剂、提倡民族平等，受到了百姓的拥戴。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驾崩，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苏轼奉命移廉州（今广西合浦），继而改迁舒州团练副使，永州（今湖南零陵）居住，半途又接第三道赦令，提举成都玉局观，复朝奉郎，在外州军任便居住。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六月苏轼抵达常州，上表辞官请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享年六十六岁，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

三、苏轼为官的基本理念

苏轼为官之道的核心是“民本”思想。他为官40年，围绕“以民为本”这个思想，形成了一系列为官的基本理念，很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七大理念：

第一，哲学理念。苏轼的为官理念，是受他的哲学理念支配的。因此，在研究苏轼为官的理念时，必须研究他的世界观的形成，首先研究他的哲学理念。他的哲学理念概括起来就是“四观”。一是“无过不及”的中庸观。苏轼中庸观的精髓在于既不可过，又不可不及。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既要防止“右”，也要防止“左”。二是“时乃日新”的运动观。苏轼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在发生、发展、变化中，变是永恒的，不变是相对的。三是“刚柔自断”的辩证观。苏轼认为，柔优于刚，柔胜于刚，以柔克刚，刚柔自断。反之，若以刚克柔，不但不能取胜，反而有害。用在为官执政的层面，就表现为：“古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道之。”四是“内圣外王”的人生观。人生观决定人的处事行为、处事准则。苏轼认为“内圣”与“外王”是统一的，不朽的事功离不开心性的修养，外在的事功来自于内在的修养。所以，他在内圣中开出外王，在外王中成就内圣，在为官的实践中创下了不朽的功业。

第二，民本理念。苏轼的民本理念，在他的许多著作和文章中都有阐述，概括起来主要是

“三观”：一是“民本观”。苏轼在处理官与民的关系问题上，由于他从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深深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因此，他始终把“民”放在第一位，在他的不少文章中都明确提出了“民本”的观点。例如，在《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中的《刑政》篇里就明确地提出了“民者国之本”的理念，他在《策别训兵旅二》中也明确地说：“民者，天下之本。”他还在《东坡书传·五子之歌第三》明确指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他还进一步指出“一人三失”者，失民则失天，失天则失国也。由此可见，苏轼在君与民的关系上他是把

“民”放在了第一位，一事当前，首先要想到老百姓，这对于一个封建官吏来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二是仁政观。苏轼在官与民的关系上，确立了民是第一位以后，他进一步提出为官者要施仁政的理念。他在那篇一举成名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总结了“尧、舜、禹、汤、文、武、成、康”历代治国的经验，明确提出了“爱民”、“忧民”的观点，提出了君王治理国家应“广恩”、“慎刑”，主要靠施仁政的观点。另一方面，他还提出了许多治理国家要顺应民意的观点。他在《未能歧易传·涣卦》中说：“世之方治也，如大川安流而下，及其乱也，溃溢四出而不可止。水非乐为此，盖必有逆其性者，泛溢而已。逆之者必衷，其性必复。水将自择其所安而归焉。古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导之。”他在这里明确地阐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治民如治水，善治者，听其自择，然后从而导之。这就是说，治理国家就像治水一样，只要按照水的流向进行疏导，水就可以治好，就会在大河中安然流淌；官吏只要按照百姓的意愿办事，就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三是惠民观。苏轼为了落实他的民本观、仁政观，进一步提出了惠民观的主张：一是轻赋税。苏轼在《御试制科策》中回答皇帝提问时说：“德之之形，莫著于轻赋。”意思就是说，最大的德政就是减轻老百姓的赋税；苏轼在《道德》一文中，还提出了“薄敛”之说，他明确指出最大的“毒莫深于夺民利”，也就是说最大的毒害在于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为了实现轻赋的目的，苏轼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提出“轻重厚薄，一出于地”的赋役原则，即根据老百姓所占用的田地的多少来确定

本期特稿

征收税赋和承担劳役的多少。二是免“积欠”。所谓“积欠”，就是老百姓一年一年累积起来但又还不起朝廷的钱财。苏轼多次给朝廷上书，要求免除这些“积欠”。三是“裕百姓”。苏轼一方面提出用“度地以居民”的均民之术来解决地少人多所造成的人民的贫困问题；另一方面，他主张“以官榷与民”，也就是说将官府专卖的盐、茶、酒等让给平民去经营而得利。

第三，改革理念。苏轼的改革理念，在他的《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进策25首》、《御试制科策一道》、《拟进士对御试策》、《思治论》等文章中均有不少精彩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是五论：一是目的论。苏轼改革的目的应该是富民强国，一切法律法令必须对人民有利益，并以此为标准来判断改革的成功与否。对王安石变法的有些扰民规定，他不赞成；对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做法，他也不赞成，他认为新法中有些法规还是有利于民的，应该继续执行。二是渐变论。苏轼的改革观和王安石的改革观在方法上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主张“渐变”，一个主张“激变”。苏轼主张“渐变”的理由在他的《进策·策略第一》、《礼以养人为本论》、《问养生》、《代滕甫论西夏书》和《上神宗皇帝书》中都有很多明确的论述，他有一句名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而民不惊”（《辨试馆职策问札子》）。意思就是说，要让改革在老百姓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推进。他认为国家就像一辆快速奔驰的马车，如果突然来个急转弯，非翻车不可。他还用医生给病人看病、下药作比喻，论述了改革应当“渐变”不应“激变”的道理，他认为治国就好比治病人，医生遇到一个危重的病人如果下猛药，就很可能要致病人于死地；一个贫弱的国家如果搞“激变”，很可能欲速则不达。他并以此来劝告神宗皇帝不要急进，在改革上应该逐渐推进。三是用人论。苏轼认为改革最重要的是用人，得天下在得人，失天下在失人。选人要经过考试，取其优秀者委以官职，杰出人才要大胆使用，看准了就要下决心，选人的渠道要宽，用人的标准要严，重要部门择人要精，任职时间不能太短，考课官员要看主流，鼓励有成绩的官员，重罚腐败无能的官员，他还提出对于有一般过错的官员，要给出路。四是节流论。苏轼认为改革要注意处理好聚财与节流的关系，尽取天下之财而满足当时之需，不可取，要注意藏富于民。他说“广取

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各级官府要注意节流，要节省开支，以备天灾、水旱、欠收之需。苏轼还明确提出：“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计，则可以九年无饥也。”五是强兵论。苏轼认为，要居安思危，要重视强兵，要做好外敌入侵的准备。他明确提出：“夫为国者，使人备已，则权在我，而使已备人，则权在人。”他明确提出从五个方面加强军队建设：一是人人都要练兵习武；二是要减少禁兵的数量；三是要注重培养将才；四是要严格训练；五是要培养勇敢作战的精神。

第四，经济理念。苏轼在参加制科考试向朝廷提交的25篇策论中，比较系统地谈到了他的一些经济理念。概括起来主要有五：一是较赋税。苏轼针对土地的变化而赋税不变动的问题，抓住田契的改变而实现田地转移这个关键环节，依据其易田之值而推算“广狭瘠腴”征收赋税，一下子解决了田多赋少的问题。二是均户口。苏轼认为，开垦土地，是致富之道。而天下之人又常常聚集于富裕之地，造成人多地少的矛盾，为此，他提出了鼓励百姓从人多的地方迁徙到人口稀少的地方去的主张，以实现均户口的目的。三是劝农桑。苏轼积极主张栽桑养蚕，并把栽桑养蚕的绩效与官员的考核升迁挂钩，他明确地指出“为农桑之政，计户口为考课之法。”（《策略二》）四是减开支。苏轼认为，要“节用以廉取”，他针对当时的问题，具体提出从三个方面来节用：一要减冗兵，减少军费开支；二要裁减冗官冗吏，减少财政开支；三要约束皇室奢侈豪华派场的开支。五是免杂税。苏轼认为，政府一方面自己要“节用”，另一方面对百姓要“廉取”，所谓“廉取”，就是政府应减免苛捐杂税，包括“禁关、征市、租盐铁、榷酒、谋茶”等税目，“求利太广而用法太密”（《策别·安万民一》），应当尽量减免。总之，苏轼在“开源”、“节流”、“减税”这三个方面的经济理念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第五，教育理念。苏轼为官十分重视教育，并且有他独到的见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一是教化观。苏轼主张敦教化。敦，就是重视；教化，就是教育感化。苏轼主张仁义礼信教育感化天下之民，以实现国家的安定。他主张“劝亲睦”，鼓励老百姓和睦和谐相处，不要“轻于犯法”，要“父子亲、兄弟和、妻子相好”。他还教导人

们不要“丰于才而廉于德”，要注重思想道德品质上的修养。二是环境观。苏轼认为，教育有大的环境，也有小环境，社会大环境和家庭小环境都很重要，同时学习也还要有一定的氛围。三是方法论。苏轼十分重视学习的方法，他在《与王庠五》中说：“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苏轼这种带着问题有目的地读书的学习方法，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第六，军事理念。苏轼从小就有尚武精神，为官十分重视军队建设，尤其是在做地方长官的时候，他提出了很多值得称道的军事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教战守”。苏轼在《策别训兵旅》等文章中提出，“蓄材用”、“练军实”、“倡勇敢”、“教战守”等强军的主张，并分别论述了将帅、士兵的重要意义。二是“定军制”。苏轼提出，随着国家的统一，朝廷“不必举疑四方之兵而专信禁兵也”，“郡县之土兵，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这样做既减轻了朝廷的负担，又增加了国家的整体军事力量。三是全民皆兵。苏轼认为，最大的忧患莫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他明确提出，“以战守之术教民”（《策别安万民五》），“民皆习于兵”，“天下知兵者众，而盗贼戎狄将有所忌”（《策别训兵旅二》）等观点，他要求对天下之人普遍讲其兵法，练其武术，“尊尚武勇”，一旦暴发战争就可全民参战。这实际上就是居安思危、全民皆兵的思想，一个封建官吏在九百多年前就有这样的国防观念，实属少见。

第七，廉政理念。苏轼为官十分重视清政廉洁，他不仅有廉政的专论，也有廉政的实践，概括起来，主要有五个观点：一是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中提出来的“乃知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讲清了廉洁与功名的关系，廉洁是功名成败的决定因素。二是贫富有别，生死无异。他在《后杞菊赋》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观点：贫也好、富也好、吃肉也好、吃菜也好，最终都不免一死，人生在世何必去贪图荣华富贵。三是循理无私，节用廉取。苏轼认为：

“君子之顺（顺利地干好事）也，岂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东坡易传》）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按照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办事，不要受到私心杂念的干扰。节约廉取，就是指朝廷要带头减少开支，要减少苛捐杂税。四是建章立制，考课百官。苏轼提出要从制度上约束和惩制腐败官员，他在《六事廉为本赋》中提出，要把廉政考核结果和官员的使用结合起来。他在《进策》中详细地阐述了考课百官的具体方法，特别强调要严格执法，用法律来约束官员，并依法处理违法的官员。五是非我所有，一毫莫取。苏轼在他那篇著名的散文《赤壁赋》中提出“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意思就是说，只要不是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要拿。他实际上提出了廉政要从我做起，从自身做起的要求，这对于一个封建官吏来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四、苏轼为官的千秋功业

苏轼从政为官 40 年，他不仅提出了一系列为官理念，而且做出了为后人称颂的为官业绩，尤其是他为官杭州、徐州、定州、登州和贬官黄州、惠州、儋州期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千秋功业。

第一，抗洪抢险，保护彭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七月十七日，黄河上游曹村决口。八月二十一日，洪水到达徐州城。九月九日，城外水位高达二丈八尺九寸，与城内平地高出一丈零九寸，徐州城外洪水涛涛，城内百姓人心惶惶，有的富人准备弃家而逃。在这危机关头，苏轼来到城门口坐镇指挥，劝大家不要出城，对大家说：有我苏轼在，洪水绝不会进城！他亲自到禁军营地要求军队参加抗洪抢险，得到了军方的全力支持。苏轼一边带领徐州军民筑堤防洪，加高、加厚城墙和防洪堤；一边和他人研究泄洪的办法，决定从上游挖开一个缺口，让洪水流入黄河故道，达到分洪的目的。经过四十五天的顽强拼搏，终于把洪水挡在了徐州城外。十月十五日，洪水慢慢消退，彭城安然无恙。苏轼在徐州抗洪的显著功绩，不仅受到了百姓的夸赞，而且也受到了朝廷的嘉奖。在荣誉和成绩面前，他又将皇帝奖给他的三万贯钱，千捌百担粮食和七千二百个民工指标，用于加固、加长防洪堤，确保了徐州城以

本期特稿

后的防洪安全。

第二，疏浚西湖，美化城市。在苏轼任职的地方，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东坡处处有西湖”，事实的确如此，苏轼任职的不少地方现在都保留着西湖的说法。例如，杭州西湖、扬州瘦西湖、惠州西湖、颍州西湖等等，而最有名的还是杭州西湖，至今杭州人民说起苏轼疏浚西湖的事来，还是那样津津乐道。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发现西湖淤泥葑草壅塞，有人提出应该疏淘，有人则表示反对，苏轼面对这种情况，他在元祐五年

(1090)四月二十九日，就上书朝廷，写下了《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要求疏浚西湖，强调“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并明确阐述了不可废的五条理由，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他亲自发动并招募民工20余万，开展了规模浩大的西湖疏淘工程。他采纳了曾任临濮县主簿、时任杭州监税官苏坚的建议，疏通盐桥河、茅山河，作堰造闸，使“西湖活水之所注，永无乏绝之忧。”为了解决疏浚西湖大量的葑草、湖泥堆放问题，他提出，“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东坡先生墓志铭》)于是，筑成从南山下直通栖霞岭的长堤，既解决了“葑田”的出路，又解决了南北游人的通行。苏轼还把清理后的湖面分派给人种菱，为防止种菱人户侵占湖面，又在湖中立三塔为界，后逐渐演变成闻名国内外的西湖十景之一——“三潭印月”。为了美化湖堤，苏轼还在堤上修了六座桥，分别取名为映波桥、镇澜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跨虹桥，在长堤竣工以后，他又组织大家在长堤两旁栽种了大量的芙蓉、杨柳。后来苏轼离开杭州后，继任林希来到长堤上，看到湖水碧波荡漾，长堤两岸垂柳依依，十分高兴，他就将长堤命名为苏公堤，从此“苏堤春晓”以它“十里长虹”的风韵位于西湖十景之首，杭州西湖从此名扬中外了。

第三，开办医院，治病救人。据史料记载，在宋代没有一家公立医院，社会上只有私人医生行医。苏轼第二次到杭州担任地方长官后，他发现当地百姓看病困难，他自己拿出了五十两黄金，还筹集了一些资金，创办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所公立医院，取名为安乐坊，为杭州人民防病治病，拯救了不少人的生命，至今被人们传为佳话。据苏轼的弟弟苏辙撰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公又多作饘粥药剂，遗吏挟医，分坊治病，活

者甚众。公曰：‘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私橐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蓄钱粮以待之。至于今不废。”苏辙的这段话如实的记载了苏轼当年在杭州筹资金、办医院、救病人的情景。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苏轼知杭州，创办的安乐坊，三年医好了病人上千人。苏轼不仅创办医院，而且他还大量地收集民间的偏方验方和养生经验，他将自己所收集的药方圣散子介绍给老百姓，防病治病。他在《圣散子后序》中说：“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有皆中下品药，约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宋人将他这些偏方验方和经验汇编成册，取名《苏学士方》，再后来人们又将沈括收集的药方合在一起出版，取名为《苏沈良方》，流传至今。

第四，整治军队，巩固边防。苏轼在地方做官十分重视军队建设，巩固边防海防。苏轼元祐八年(1093)十月二十三日到达定州后，不仅担任地方行政长官，而且还兼任了统管军队的职务。当时，定州属于宋代的边境地区，他一到那里就发现了军队建设上的很多问题，首先是禁军营房损坏比较严重，大部分不能遮风挡雨，不少军士的家属子女忍饥受冻，军士饮酒赌博和偷窃行为时有发生，有的长官巧取掠敛放高利贷。他一边向朝廷报告，请求拨款，派人整修营房；一边逮捕法办贪官将领，很快就刹住了军队当中的歪风邪气，使定州的防务有了进一步的改善。除此之外，他还整顿弓箭社，要求弓箭社人户寝室起居，不放下弓箭刀马，武艺就不会生疏，一旦边境有事，即可驱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在登州上任只有五天时间，他仍然关心海防建设，向朝廷提出了加强海防军队建设的建议，朝廷同意了他的意见，使登州海防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第五，著书立说，启迪后人。苏轼为官40年，无论是在朝廷任职，还是在地方为官，甚至被遭贬流放，他始终笔耕不断，著书立说，取得了显著的业绩。据统计，他一生写下了两百多万字的著述，涉及政治、军事、历史、文化、教育、艺术、宗教、人生、民俗等方面，后人编辑出版了《苏轼全集》。这里我们只对他的诗、词、赋、散文、书法和绘画作一个简要的介绍，就可看出他的伟大。首先是诗。他一生写了2700多首诗，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许多诗篇“脍炙人口”。例如，咏诵庐山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

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成为咏庐山的千古绝唱。再如，咏杭州西湖诗，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此诗一出，使杭州西湖名扬中外。其次是词。他一生写了300多首词，许多具有开创性的词章，至今读来令人振奋。例如，他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开创了前无古人的一代词风，充满豪情，令人心旷神怡。再如，他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此词一出，千年未，多少文人墨客，咏中秋月亮，无人超越。还比如，他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江城子·记梦》），开创了用词来写悼词的先例，被后人誉为悼念亡人的千古绝唱。第三是赋。他写的《赤壁赋》、《后赤壁赋》，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的地位。《赤壁赋》不仅进入了中国的教育课堂，而且进入了日本的中学教科书。有人说：“赋到此翁无古人”。第四是散文。苏轼被誉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一生创作了4200多篇散文，许多名篇被编进了中学教科书。第五是书法。苏轼的书法居“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代四大家之首。他的代表作《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和书圣王羲之《兰亭集序》、颜真卿《祭侄文稿》齐名。第六是绘画。苏轼的绘画，以枯木、竹石著称，成为中国绘画史上湖州墨竹派的一个重要成员。所有这些，在宋代文坛都是具有开创性的重大成果，从而确立了他在北宋文坛的领袖地位，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历史地位。

五、苏轼为官的几点启示

苏轼为官几十年，既有理念也有实践，他的这些为官理念和实践，对于我们今天担负着艰巨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重任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有哪些值得借鉴、参考和启示呢？概括起来，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为官之道，以民为本

苏轼的为官之道，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

以民为本。在苏轼看来，君与民之间，民贵君轻，老百姓是天，老百姓为大，老百姓是第一位的。按照他这个理念，他无论在朝廷做官，还是在地方行政，甚至在遭贬流放，他都始终坚持以民为本的观念，尽心尽力为老百姓办事，有时甚至甘冒触犯“龙颜”的风险，为老百姓的利益向朝廷直谏，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第一，顺应民心，推进改革。苏轼为官的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年代，大量的事实表明，苏轼是坚持和赞成改革的，苏轼在改革问题上和王安石的改革有分歧，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苏轼的改革观，一些史学家把苏轼说成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苏轼的改革观有两点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一是苏轼坚持“渐变”的改革观，他有一句名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而民不惊”，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坚持逐步推进改革，而使老百姓逐步适应改革的愿望。二是苏轼坚持改革要有利于让老百姓得到利益，而不是损害利益，并以此为标准来检验朝廷的改革措施正确与否。这两条对我们今天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也是有重要启迪和借鉴作用的。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坚持“渐变”的改革观。改革开放30年，之所以取得伟大的成功，就是因为坚持了改革的逐步推进。回想改革之初，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然后逐步推进到城市，然后再进一步推进到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由点到面，由小到大，由易到难，一步一步地把改革引向深入，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渐变”的改革路径。我们必须继续坚持这种“渐变”的改革观，尤其是在改革已经向纵深发展的今天，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步显露出来，更需要我们逐步的渐进的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充分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避免因某些改革措施的急进而引起社会的震荡，影响改革开放的大局。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改革措施有利于人民群众。任何一项改革，如果只有少数人的积极性，而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改革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当年，王安石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一条重要的教训就是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今天，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这场伟大的改革，他的根本宗旨始终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的一切改革措施都是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本期特稿

赞成不赞成为标准的。凡是人民群众拥护的改革措施，我们就大胆推进；凡是人民群众一时还不理解的改革措施，我们就逐步推进或暂缓推进，允许等，允许看，也要允许试，只要是对人民群众有利的改革措施，最终是会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拥护的。

第二，让利于民，多给少取。苏轼为官的北宋时期，是一个国力积贫积弱的时期，内忧外患，财力空虚，百姓贫苦，农民起义不断，社会矛盾十分突出。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摆脱危机，确实是北宋朝廷官员为官能力的一个重大考验。苏轼应对这种形势的经济观有许多条，我认为至少有三条是应该肯定和值得借鉴的：一是节用，二是廉取，三是劝农桑。这三条不仅对当时有指导作用，而且就是今天也仍然值得我们借鉴。首先，要重视勤俭节约。苏轼主张朝廷要“节用”，也就是皇家要带头节约开支，一切活动都要“务从简约”。据史载，宋王朝的节庆和祭祀活动是很多的，而且耗资巨大。例如，宋真宗一次郊祀活动就用掉了七百余万钱，东封泰山花掉八百余万钱，由此可见一斑。苏轼提出朝廷减少开支，带头厉行节约，这无疑是正确的。今天，我们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财力雄厚了，国力增强了，仍然需要勤俭节约，节约一切不必要的开支，这应该是我们各级从政为官者必须要认真对待的。其次，要让利于民。苏轼主张“廉取”，实质就是主张政府要尽量减少各种苛捐杂税，这一点应该说是对人民有好处的。最近几年来，我们党提出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免除了千余年来的“皇粮国税”，为广大农民办医疗保险，减免农村中小学生学杂费，还每年开展农村民生八大工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对农民、农村多给予，少索取，甚至不索取，体现了我们党在新时期执政的新理念，我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认真贯彻执行好中央的这些惠民政策，不打折扣，确保落实到位。第三，要高度重视“三农”。苏轼主张“劝农桑”，就是鼓励农民重视农业，栽桑养蚕。这作为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封建社会来说，应该是一条很好的治国之道。他有助于解决好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也有助于增加国家的财富，我认为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我们国家，虽然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国力比较强大了，但是还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口仍然在农村，“三农”问题依然是我们国家

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够放松对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重视，要继续坚持把“三农”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加大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投入，认真落实好中央出台的“三农”问题的一系列政策，努力推进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努力推进农村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这是我们每一个领导者的崇高使命和神圣的职责。

第三，急民所难，帮民所需。苏轼的民本理念体现在各个方面，尤其是他在各个地方为官时期，帮助老百姓解决生计问题，诸如烧煤的问题、收养弃婴的问题、饮水的问题、推广水稻问题、吃盐问题、喝酒问题等等，都在他的帮助范围之内，因而他赢得了各地百姓的衷心拥戴和爱护。我们共产党人和一个封建官吏比较起来，应该做得更好，事实也如此。在战争年代，我们带领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从根本上解决了老百姓的生计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又切实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就业问题、饮水问题等等民生问题，所以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认真办好“八大民生工程”，帮助老百姓切切实实解决一些困难和问题。

第四，启迪民智，培养人才。苏轼按照他的民本思想，十分注重启迪民智，培养人才。他在海南儋州被贬期间，虽然生活十分艰苦，但是他仍然办起了学堂，倡导读书，在他的指导下，海南走出了第一个进士，至今人们还念念不忘。苏轼在儋州办学的事，给我们至少有三点启示：一是为官要重教。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是希望，是未来，只有把教育办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才有希望。今天我们的条件和苏轼当年已经是两个世界、两重天，没有理由不好好教育，只有把我们的教育搞上去了，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二是再苦也不能苦教育。苏轼当年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不忘记办教育，还自编教材，修砌学校，指导学生。今天我们更要增大对教育的投入，不断改进教育的环境和条件。解决好教师的实际问题和困难，让他们在一个比较宽松的条件下教书、育人。三是要千方百计帮助各级各类大中专毕业生实现就业。培养人才的目的是为了使用人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人才各尽其长，创造了宽广的舞台，只要我们用其所长，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他们就必将对社会作出

应有的贡献。

第五，保障民安，居安思危。苏轼在地方为官，特别是在边疆地区为官，他十分重视国家和百姓的安全。在定州，他提出组织弓箭社；在登州，他上书朝廷要求加强军队建设，这都是他居安思危、巩固边防、确保民安的重要举措。苏轼的国防观念至少有三点启示：一是要居安思危。今天，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和平和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定不能忘记国防建设，在和平环境里一定要想到战争说不定哪一天就可能来临，我们越是搞现代化建设，越是要增强国防观念，随时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思想上，筑起一道牢固的戍边的思想长城。二是要支持人民解放军加强军队建设。人民解放军是我们国家的柱石和长城，是抵御外来侵略的铁拳，我们作为一个地方党政领导一定要从国家的安危的全局考虑，积极支持军队，帮助军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特别是他们的家属、子女、就业、上学等实际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三是要积极做好民兵预备役工作。民兵预备役是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来源，我们一定要支持他们搞好训练，随时准备参加到保卫祖国和人民安全的战斗中去。

（二）谋事之道，以实为魂

为官要做事，如何做好事、办实事、做成事？这是每一个从政为官的人必须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苏轼在几十年的为官生涯中，始终把他的民本理念，贯穿在他的整个从政实践中。从他为官所创造的全部业绩来看，他在各地都突出了一个“实”字，就是查实情、说实话、办实事、重实干、见实效。

第一，深入基层，察看实情。苏轼先后在十几个地方为官，他每到一地都注重到实地去查看实际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例如，他到达密州后不久，就发现了这里蝗虫危害十分严重，见老百姓用蒿蔓裹蝗虫一堆接一堆，相连二百多里，然而有的官吏却说这不是灾害，甚至说蝗虫是为民除草，对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他当即给当朝宰相韩琦反映了他的看法，并提出了捕蝗的办法。在杭州为官他发现，渐西七州军，冬春积水，不能种早稻，到五六月水退，才播好晚稻，又遇干

旱，早晚都受损，老百姓吃饭都成问题，刚进入冬天，有的就已经断粮了，因此他向朝廷提出，赈救饥荒的建议。在扬州，他了解到因朝廷历年“积欠”，老百姓还不起钱而流落他乡，再加上温疫流行，老百姓苦不堪言，他先后两次上书朝廷要求减免“积欠”，并得到了朝廷的同意，皇帝下诏各种“积欠”一律宽免一年，受到老百姓的衷心感谢。这几件事情，使我们受到深刻的启示：一是新官到任首先要重视调查研究。毛泽东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确实是真理，每到一地，一定要把当地的实情搞清楚，取得发言权，才有资格担负起那里的领导工作。二是要敢于从实际出发，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意见和办法。领导者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这是毛泽东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仍然要重视出思路、出办法、出对策，并把它用于指导工作。三是对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上级报告。有些问题不是下面职权范围所解决得了的，就要及时地向上级报告，以求得上级的支持、指导和帮助。

第二，求真务实，敢说实话。苏轼在任地方官期间，最值得令人称道的是，他拒绝朝廷决定开挖八丈沟的事情。元祐六年（1091），苏轼出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在他到来之前，朝廷就决定开挖八丈沟，以解开封洪水之患。他到任后发现问题，随即选派官员到实地测量，摸清了八丈沟入淮口的水位，在淮河洪水上涨时要高于八丈沟上游蔡河口水位八尺五寸，由此，他得出结论，新沟若开，洪水来临时，不仅起不到排水的作用，反而遭淮河逆灌。颍州将遭到八丈沟上下游洪水的双重袭击，颍州人民将受到洪水的严重威胁。为此，他连续三次上书朝廷《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终于说服朝廷停止了这个劳民伤财的工程。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很多，最重要的至少有三点：一是要敢于说实话。苏轼新官上任，对上一届决定的事情，尤其是经过朝廷批准的事情，他敢于提出质疑，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们共产党人，为官一地，当实际情况和上面的有关决策发生不一致时，一定要勇于向上级反映下面的实际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办法。二是要重视科学的调查研究。苏轼在遇到问题时，没有随意否定，而是经过科学的测量和全面的论证，才提出自己的否决意见的。从这里，

本期特稿

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对于有争议的问题，既不能随意否定，也不能盲目肯定，任何决策都必须建立在全面、客观、科学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必须建立在一定数据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可行性分析基础上，权衡利弊，慎重决策，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失误。三是决定重大问题，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苏轼正是从避免颍州人民遭受洪灾的袭击，而多次向朝廷提出不能挖八丈沟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向人民负责的表现，归根结底也是向朝廷负责的表现。我们作为共产党人，更要把向人民负责和向党负责的一致性结合起来，把事情办得更好。

第三，为官一任，多办实事。苏轼在地方为官，十分重视为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在徐州，他找到煤碳，为百姓解决了燃料和炼铁问题；在诸城（密州），他收养弃婴，挽救了这些孩子的生命；在惠州，他提出用竹管引水，解决了百姓的饮水问题；在杭州，他创办了安乐坊，即医院，为百姓解决了就医问题；在惠州，他设计并推广了秧马，减轻了农民的劳作之苦；在定州，他推广水稻技术，使当地百姓吃上了大米，他创酿的松醪酒，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得金奖，成为名酒；在蓬莱（登州），他改革盐税，打破官商垄断，允许百姓自由贩盐，解决了百姓食盐问题；在扬州，他提出改革漕运，允许百姓运输官方粮食时，适当搭载部分土特产，以弥补生活不足。从苏轼做的实事，使我们受到哪些启示？一是为官之道要从小事做起。苏轼做的这些事情，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作为百姓来讲都是大事。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讲的：“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们一定要切实关心百姓的油、盐、柴、米，关心他们的吃饭、穿衣、住房、就业、就医，从这些具体问题做起。二是要勇于改革那些不适应老百姓生存和发展的旧框框。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一个封建官吏都可以改革那些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更应该站在人民的利益立场上，勇于改革那些不利于老百姓的具体意见、措施和政策，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使我们的各项政策措施更有利与老百姓，有利于人民群众。三是好事要办好。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实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有条件的可以快一点，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努力办。要充分依靠社会的力量、政府的行为解决问题，一定不要过多地

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尤其是农民的负担，把好事办好，让老百姓满意。

第四，危险关头，带头实干。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苏轼知徐州，到任三个月就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徐州城被洪水围困，苏轼带领徐州军民英勇抗洪，奋战40多天，终于保住了彭城，受到朝廷的嘉奖。为了防止洪水再次袭击，他又奏请朝廷拨款，进一步加固护城堤，消除了徐州城的隐患。从这件事情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一是在危急关头，领导一定要身先士卒。彭城大水来临，苏轼临危不惧，把百姓的安危放在第一位，这确实值得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特别是担任一个地区主要领导责任的领导干部学习。当年，江泽民总书记亲自到九江组织军民抗洪抢险的镜头，充分显示了我们党在危难关头冲峰在前的英雄气概。二是在困难面前，要听取专家的意见，善于科学决策。苏轼在洪水到来以后，一方面组织军民加固城墙，抢修防洪堤。另一方面，他听取了他人的意见，从上游打开一个缺口，使洪水流入黄河故道，因而有效地缓解了徐州城的水势。这就充分说明，我们在重大灾害面前，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一定要注意听取专家的意见，运用科学的方法战胜灾害。这不由使我们想起“5·12”大地震，在处理堰塞湖问题上，党中央、国务院充分听取专家的意见，从而顺利地疏导了湖水，确保了下游的安全。这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的成功的典范。三是既要考虑当前，也要注意长远。苏轼在抗洪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他没有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而是进一步防范今后洪水再来，因而他提出了进一步加筑城墙和防护堤的意见，并将朝廷奖励他的资金用于工程。这是苏轼为官的一个优秀品格，他做事没有短期行为，我们每一个领导同志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应该立足当前，考虑长远，谋划未来，使我们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第五，不图虚名，重视实效。苏轼元祐七年（1092）二月知扬州，当时正值芍药盛开，时任扬州通判的晁补之提出举办一年一度的万花会。苏轼认为，办花会主要靠老百姓来筹备，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他下令将花会罢除，今年不办，以后也不再办。此举赢得了老百姓的一致拥护，深得民心。从这件事，给我们为官执政者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呢？一是办事要以老百姓是否有利为标准。让老百姓自己出钱，而老百姓又得不到什

么利益和好处的事情，最好不办，避免浪费百姓的钱财，这是我们每一个为官从政者必须要时刻考虑的问题。二是为官从政切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花架子”。形式主义害死人，“花架子”表面看起来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实际上得不偿失，空耗钱财，有百害而无一利，实属应当戒除。三是一定要注重实效。我们做每一项决策，都要考虑实际效果，凡是沒有实效的事情，要少办或者不办，在全社会形成一个戒形式、重实效的良好风气。

（三）做人之道，以廉为先

做官首先必须要学会做人，做人之道，以廉为先，这是苏轼为官给我们的一条重要启示。苏轼为官几十年，十分重视官德的修养，尤其是在廉政建设上他有许多论述，并付之行动，形成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甚至效仿。

第一，行成于廉，功毁于贪。苏轼为官一生十分重视廉洁从政，他在《六事廉为本赋》一文中，明确提出：“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乃知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举其要兮，廉一贯之。”苏轼这番话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为官从政，要以廉为先。就是为官之道以廉为首，廉洁不保，再大的功劳也毁于一旦。联想到近年来我们一些干部，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一个又一个的因贪腐而落马的深刻教训，为官从政一定要把廉洁放在第一位，时时保持高度的警惕，切莫要去触摸高压线，确保为官清廉。

第二，计划开支，加强自律。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苏轼以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作团练副使，生活十分艰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描述了他的生活状况：“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大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这段描述，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有计划地开支，只要每天的基本生活能够保证，做到有计划地使用钱财，我们的收入是完全能够保证基本生活需要的，而没有必要去贪图更多的钱财。这是每一个为官从政者确保廉洁的一条具体可行的良策。只要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廉政也就保住了。

第三，反对奢侈，提倡节俭。苏轼为官不仅重视自身的约束，而且敢于监督朝廷保持节俭之风。有一件事特别突出，就是神宗皇帝过元宵节要购买四千盏浙灯。苏轼认为，此事不可，上书皇帝“谏买浙灯状”，明确批评朝廷，“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民）口体必用之资”，要求停止买灯。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从而终止了一件有损民利的事情。从这件事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为官不仅要廉洁自律，洁身自好，而且要敢于监督他人，尤其是要敢于监督一把手，凡是不利于百姓的事情，不利于为官清廉的事情，一定不能去做，保持良好的政风。

本书的研究方法：一是采用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我们一方面阅读了苏轼的有关原著和参考了前人以及今人的研究成果，还参加了眉山市组织的东坡国际学术研讨会。另一方面，我们组织了考察组，用了48天时间，行程万余公里，沿着苏轼当年为官的10个省、16个城市进行了考察，参观了苏轼的遗址、遗迹、遗物，听取了几十名苏学专家介绍苏轼当年为官的经历，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二是批判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批判地继承了苏轼为官之道当中一些积极的理念，特别是对当今有借鉴作用的一些观点和方法，我们尽可能地把他保存下来。同时，也结合当前我们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提出了为今人可借鉴或遵循的为官理念。三是领导干部与专家学者相结合。在课题研究当中，我们既有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又有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两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既体现了一定的学术水平，又贯穿了一定的从政经验，使课题既有一定的学术性，又有一定的实用性。四是集体讨论与分头研究相结合。

在整个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十分重视发挥集体的智慧，相互讨论、修改，充分体现集体的智慧。同时，我们又充分发挥每一个同志在研究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结构，总体上分为三论：一是绪论。主要阐述了苏轼为官的时代背景、为官经历、为官理念、为官业绩和几点启示，实际上是全书的一个总论。（下转33页）

身行万里半天下

——论苏轼的杂记文

曾枣庄

内容提要：苏轼杂记文约六十篇，其中有少数为误入之作，故首先辨伪；弄清写作时间和写作背景，是准确理解其主旨的关键，故次为之编年；宋人喜破体为记，以论为记，而苏轼尤为突出，故末论其杂记文特色。

关键词：苏轼 杂记文 辨伪 编年 特色
破体为记

“身行万里半天下”（《苏轼诗集》卷六《龟山》，下引苏诗只括注卷次），“人间胜绝略已遍，匡庐南岭并西湖。”（卷四十《赠昙秀》）苏轼一生，南北东西，确实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写了大量的诗、词及杂记文，限于篇幅，这里只论其杂记文。

苏轼杂记文特多，据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文集》，杂记文达两卷六十余篇：(1)《仁宗皇帝御飞白记》、(2)《醉白堂记》、(3)《盖公堂记》、(4)《庄子祠堂记》、(5)《李太白碑阴记》、(6)《喜雨亭记》、(7)《凌虚台记》、(8)《超然台记》、(9)《眉州远景楼记》、(10)《墨妙亭记》、(11)《墨君堂记》、(12)《宝绘堂记》、(13)《墨宝堂记》、(14)《李氏山房藏书记》、(15)《放鹤亭记》、(16)《众妙堂记》、(17)《思堂记》、(18)《静常斋记》、(19)《石氏画苑记》、(20)《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21)《净因院画记》、(22)《灵壁张氏园亭记》、(23)《游桓山记》、(24)《石钟山记》、(25)《睡乡记》、(26)《南安军学记》、(27)《凤鸣驿记》、(28)《密州通判厅题名记》、(29)《滕县公堂记》、(30)《雩泉记》、(31)《钱塘六井记》、(32)《奖谕敕记》、(33)《清风阁记》、(34)《中和胜相院记》、(35)《四菩萨阁记》、(36)

《盐官大悲阁记》、(37)《胜相院经藏记》、(38)《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39)《黄州安国寺记》、(40)《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41)《南华长老题名记》、(42)《应梦罗汉记》、(43)《成都大悲阁记》、(44)《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45)《秦太虚题名记》、(46)《方丈记》、(47)《野吏亭记》、(48)《遗爱亭记》、(49)《琼州惠通泉记》、(50)《传神记》、(51)《顺济王庙新获石磬记》、(52)《熙宁手诏记》、(53)《观妙堂记》、(54)《法云寺礼拜石记》、(55)《赵先生舍利记》、(56)《北海十二石记》、(57)《子姑神记》、(58)《天篆记》、(59)《画水记》、(60)《刻秦篆记》、(61)《雪堂记》，有些版本还收有(62)《杭州龙井院讷斋记》、(63)《醉乡记》(25《睡乡记》)，有少数虽是苏轼的文章，但不同版本标题不尽相同，不一定属杂记文。

苏轼杂记文辨伪

以上共六十一篇。有些苏轼集还收有《醉乡记》、《睡乡记》、《杭州龙井院讷斋记》，实为误收。《醉乡记》为隋代王绩撰，见《东皋子集》、宋陈振孙《直齐书录解题》卷一六云：“《东皋子》五卷，唐大乐丞太原王绩无功撰。绩，文中子王通仲淹之弟也，仕隋为正字，嗜酒简放，不乐仕进。晚以大乐吏焦革善酿，求为其丞，不问流品，亦阮嗣宗步兵之意。”《全唐文》卷一三二亦作王绩文。

《睡乡记》此乃乃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

所撰，见《鸡肋集》卷三一。《鸡肋集》乃晁补之自辑，今本为明人依宋版重刻，当比明人编纂的苏轼文集可信。前写睡乡，有如仙境，只有黄帝、尧、舜曾游这一仙境，战国、秦、汉之君，“内穷于长夜之饮，外累于攻战之具，于是睡乡始丘墟矣。”只有庄子和山人处士能知这一仙境：“蒙漆园吏庄周者，知过之，化为蝴蝶，翩翩其间，蒙人弗觉也。其后山人处士之慕道者，犹往往而至，至则嚣然，乐而亡归，或以为之徒云。”最后感叹自己“幼而行勤，长而竟时，卒不能革，岂不迂哉！”有一篇专论苏轼哲学思想，只字未提苏轼的哲学名著《东坡易传》，却把这两篇误入苏轼集的《醉乡记》、《睡乡记》作为小标题写在文章中，令人发笑。

《杭州龙井院讷斋记》，既见于苏轼《苏文忠公全集》卷六六，又见于苏辙《栾城集》卷二三，《栾城集》为苏辙自编，当可信。辩才之所以称辩，是因为“师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鸣如千石钟，来不失时如沧海潮，故人以辩名之”。秦观之所以以讷名其斋是因为“及其退居此山，闭门燕坐，寂嘿终日，叶落根荣如冬枯木，风止浪静如古涧水，故人以讷名之”。但在苏辙看来，辩、讷均不足概括辩才，但可名其斋：“此非师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长不短，不垢不净，不辩不讷，而又何以名之？虽然，乐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辩而贵其讷，此众人意也，则其以名斋也亦宜。”

苏轼杂记文的编年

《苏轼文集》所收苏轼杂记文并未编年，这里我们先依原书顺序分别考察各篇的写作时间，然后再按写作时间重新编序。

苏轼杂记文的写作时间有六种情况：

一是文末自署写作时间，如《庄子祠堂记》（1078.11）自署“元丰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记；《眉州远景楼记》（1078.7）自署“元丰元年七月十五日记”；《宝绘堂记》（1077.7）自署“熙宁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记”；《放鹤亭记》（1078.11）自署“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众妙堂记》（1098.3）自署“戊寅三月十五日，蜀人苏轼书”，戊寅即为绍圣五年（1098）；《思堂记》（1078.1）自署“元丰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记”；《石氏画苑记》（1080.12）

自署“元丰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赵郡苏轼书”；《灵壁张氏园亭记》（1079.3）自署“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记”；《四菩萨阁记》（1068.10）自署“熙宁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记”；《黄州安国寺记》（1084.4），前有“（元丰）七年，余将有临汝之行”，末署“四月六日，汝州团练副使眉山苏轼记”，元丰七年即1084年；《南华长老题名记》（1101.1）自署“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一日记”；《滕县公堂记》（1078.7）自署“元丰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事苏轼记”；《南安军学记》（1101.3）自署“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四日，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眉山苏轼书”；《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1095.5），自署“绍圣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记”；《南华长老题名记》（1101.1）自署“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一日记”；《野吏亭记》（1096.11）自署“绍圣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记”；《琼州惠通泉记》（1101.6）自署“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记”；《熙宁手诏记》（1088.11）自署“元祐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臣某谨记”；《法云寺礼拜石记》（1093.7）自署“元祐八年七月中旬，内殿崇班马惟宽”。

二是文末虽未自署写作时间，但文章本身提供了可靠的写作时间，如：《仁宗皇帝御飞白记》（1054）。记云：“熙宁六年冬，以事至姑苏，其子（王）诲出庆历中所赐公端敏字二、飞白笔一以示臣，且请臣记之。”熙宁六年为1073年，此为受托撰记时间。又有仁宗“升遐以来十有二年”语，仁宗升遐在嘉祐八年（1063），下推十二年，当为熙宁七年（1074），此为实际撰记时间。

《墨妙亭记》（1072.12）。记云：“熙宁四年十一月，高邮孙莘老自广德移守吴兴。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于府第之北，逍遥堂之东，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是岁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览叹息，而莘老求文为记。”熙宁四年之后之“明年”，则此记当作于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1079.7）。记云：“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元丰二年即1079年。

《游桓山记》（1079.1）。记云：“元丰二年正月已

亥晦，春服既成，从二三子游于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遗音。”本此，当作于元丰二年（1079）。

《石钟山记》（1084.6）。记云：“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此记即作于是时。

《凤鸣驿记》（1062）。记云：“始余丙申岁举进士，过扶风，求舍于馆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于逆旅。其后六年，为府从事。至数日，谒客于馆，视客之所居，与其凡所资用，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将去，既驾，虽马亦顾其阜而嘶。余召馆吏而问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而逾月而兴功，五十有五日而成。’……余闻而心善之。其明年，县令胡允文具石请书其事。余以为有足书者。”丙申岁指嘉祐元年（1056），“其后六年”即为嘉祐六年“辛丑”（1061），“今太守宋公”指凤翔知州宋选，“其明年，县令胡允文具石请书”，则此记当作于嘉祐七年（1062）。

《雩泉记》（1076）。记云：“东武滨海多风，而沟渎不留，故率常苦旱。祷于兹山，未尝不应。民以其可信而恃，盖有常德者，故谓之常山。熙宁八年春夏旱，轼再祷焉，皆应如响。乃新其庙。……作亭于其上，而名之曰雩泉。”熙宁八年即1076年。

《钱塘六井记》（1072）。记云：“熙宁五年秋，太守陈公述古始至，问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给于水。南井沟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应。’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办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余人。”熙宁五年即1072年。

《奖谕敕记》（1078）。记云：“熙宁十年七月十七日，河决澶州曹村埽。”其下详尽记述了徐州防洪的经过，末云：“明年二月，有旨赐钱二千四百一十万……改筑外小城。……臣轼以谓黄河率常五六十年一决，而徐州最处汴泗下流，上下二百余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难落，不与他郡等，恐久远仓卒吏民不复究知，故因上之所赐诏书而记其大略，并刻诸石。”熙宁十年后的“明年”，此记当作于元丰元年（1078）。

《胜相院经藏记》（1080）。记云：“元丰三年，岁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简，号曰宝月，修行如幻，三摩钵提，在蜀成都大圣慈寺，故中和院，赐名‘胜相’，以无量宝、黄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众香，庄严佛语及菩萨语，作大宝藏。……时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说偈言。”元丰三年即1080年。

《应梦罗汉记》（1081.4）。记云：“元丰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予将往岐亭。宿于团封，梦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诉。明日至岐亭，过一庙，中有阿罗汉像，左龙右虎，仪制甚古，而面为人所坏，顾之惘然，庶几畴昔所见乎？遂载以归，完新而龛之，设于安国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阳君忌日，饭僧于寺，乃记之。责授黄州团练使眉山苏轼记。”元丰四年即1081年。

《秦太虚题名记》（1080.8）。记云：“明年予谪居黄州，辩才、参寥遣人致问，且以题名相示。时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涨，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儿子迈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因录以寄参寥。使以示辩才，有便至高邮，亦可录以寄太虚也。”苏轼谪黄州在元丰三年（1080）。“去中秋不十日”，此记当作于8月初。

《顺济王庙新获石磬记》（1101.4）。记云：“建中靖国元年四月甲午，轼自儋耳北归，舣舟吴城山顺济龙王祠下。”建中靖国元年即1104年。

《赵先生舍利记》（1080.11）。记云：“赵先生棠本蜀人，孟氏节度使廷隐之后，今为南海人。仕至幕职，官南海。……轼与先生之子昶游，故得此舍利四十八粒。……昶今为大寺丞，知藤州。元丰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宝月大师之孙悟清，使持归本院供养。赵郡苏轼记。”元丰三年为1080年。

《子姑神记》（1082.1）。记云：“元丰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师来黄州。”其下有“至之明年”语，当为元丰四年；又有“其明年正月”语，当作于元丰五年正月。

《天篆记》（1083）。记云：“江淮间俗尚鬼。岁正月，必衣服箕帚，为子姑神，或能数数画字。惟黄州郭氏神最异，予去岁作《何氏录》以记之。”

《何氏录》即《子姑神记》，作于元丰五年正月。此谓“予去岁作《何氏录》”，则此记当作于元丰六年。

《刻秦篆记》(1076.1)。记云：“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亲巡东方海上，登瑯琊台，观出日，乐之忘归，徙黔首三万家台下，刻石颂秦德焉。二世元年，复刻诏书其旁。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岁在壬午，至今熙宁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苏轼来守高密，得旧纸本于民间，比今所见，犹为完好，知其存者，磨灭无日矣。而庐江文勋适以事至密。勋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笔意，乃摹诸石，置之超然台上。……正月七日甲子记。”熙宁九年为1076年。

《雪堂记》(1082)。记云：“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东坡乐府》卷下《江城子》引云：“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元丰壬戌即元丰五年(1082)。

三是文章提供了撰写时间的重要线索，加上其他可靠资料，可确定其写作时间，如《醉白堂记》(1075.11)。记云：“故魏国忠献韩公(琦)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昔公尝告其子忠彦，将求文于轼以为记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彦以告，轼以为义不得辞也，乃泣而书之。”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集卷一)云：“熙宁八年六月甲寅，定策元暉之臣、永兴军节度使、守司徒兼侍中、魏国公判相州韩琦薨。……其年十一月庚申，发两河卒，以一品卤簿葬公相州安阳县农安村之原。”根据以上两条资料，可知此记写于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

《盖公堂记》(1076.11)。记云：“吾为胶西守，知(盖公)公之为邦人也，求其坟墓、子孙，而不可得，慨然怀之。师其言，想见其为人，庶几复见如公者。治新寝于黄堂之北，易其弊陋，达其壅蔽，重门洞开，尽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绳，名之曰盖公堂。时从宾客僚吏游息其间，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其《胶西盖公堂照壁画赞》(《苏轼文集》卷二一)云：“熙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命工摹置胶西盖公堂中，且赞之云。”建盖公堂与撰赞于堂中当在同时。其后不久，苏轼被命知河中府，次年正月即离密州赴河中任，有《大雪青州道上有怀东武园亭寄交代孔周翰》(《苏轼诗集》卷一五)：“超然台上雪，城郭山川两奇绝。

海风吹碎碧琉璃，时见三山白云阙。盖公堂前雪，绿窗朱户相明灭。堂中美人雪争妍，粲然一笑玉齿颊。”

《喜雨亭记》(1062.3)。记云：“余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树，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扶风即陕西凤翔，根据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苏轼于嘉祐六年十二月到凤翔府签判任，“余至扶风之明年”当为嘉祐七年(1062)三月。

《凌虚台记》(1063)记云：“因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屢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危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太守陈公指陈公弼，他于嘉祐八年六月代宋选知凤翔。嘉祐八年即1063年，此记当作于是年。

《超然台记》(1075.12)记云：“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苏轼于熙宁七年九月自杭州通判移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十二月到密州任，记有“处之期年”语，则当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末。

《净因院画记》(1071)。记云：“与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谓得其理者矣。昔岁尝画两丛竹于净因之方丈，其后出守陵阳而西也，余与之偕别长老臻师，又画两竹梢一枯木于其东斋。臻师方治四壁于法堂，而请于与可，与可既许之矣，故余并为记之。”可知此记实为文同将赴陵州任前二人同游净因院时作。宋家诚之《石室先生年谱》熙宁四年载：“是岁，先生归乡，赴陵州。按：先生作《陵州谢表》云：‘臣已于三月五日赴任讫。’又作《榆阴》诗，自序云：‘熙熙辛亥岁(即四年)春，予自京师赴陵州。’”本此，苏轼此记当作于熙宁四年(1071)春文同离京前。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五系此事于熙宁三年，与文同诗文所载不合，应以文同诗文及文同年谱为准。

《密州通判厅题名记》(1077)。记云：“始，尚书郎赵君成伯为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称之。余其邻邑人也，故知之为详。君既罢丹稜，而余适还眉，于是始识君。其后余出官于杭，而君亦通守临淮，同日上谒辞，相见于殿门外，握手相与语。已而见君于临淮，剧饮，大醉于先春亭上而别。及移守胶西，未一年，而君来倅是邦。君曰：‘吾厅事未有壁记。’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属于余，余未暇作也。及为彭城，君每书来，辄以为言。且曰：‘吾将托子以不朽。’”彭城即徐州，苏轼知徐州在熙宁十年(1077)，此记当作于是年。

《中和胜相院记》(1067)。记云：“今宝月大师惟简，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为记，岂不谬哉？然吾昔者始游成都，见文雅大师惟度，器宇落落可爱，浑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传记所不载者。因是与之游甚熟。惟简则其同门友也。其为人，精敏过人，事佛齐众，谨严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爱，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从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国与其所以将亡而不遂灭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画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称者，故强为记之。”《苏轼文集》卷六九《书摹本兰亭后》：“(摹本兰亭)子由自河朔持归，宝月大师惟简请其本，令左绵僧意祖摹刻于石。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子由自河朔持归”指摹本兰亭是苏辙任大名府推官时带回，“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时，苏轼兄弟在眉山老家守父丧，惟简请摹本兰亭刻石，与请苏轼撰《中和胜相院记》当为同时事，即1067年事。

《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

(1100.10)。记云：“东莞古邑，资福禅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尝戒也，而律自严，未尝求也，而人自施。……东坡居士，见闻随喜，而说偈言。”《苏诗总案》卷四四载，元符三年十月，苏轼赦，自海南北归，行至广州，“祖堂来告东莞资福寺罗汉阁成，作记。”元符三年即1100年。

《方丈记》(1094.9)。康熙《曲江县志》卷二《揽圣第八·寺观》载：“月华寺，在城南一百里，天竺僧智药开创。……绍圣初重建，东坡为题梁。”所引题词即此记。曲江即韶州(今广东韶关)，绍圣初即1094年，《方丈记》即绍圣元年九月苏轼赴惠州贬所途经曲江时所作。

《遗爱亭记》(代巢元修)(1068)。记云：“东海徐公君猷，以朝散郎为黄州，未尝怒也，而民不犯，未尝察也，而吏不欺，终日无事，啸咏而已。每岁之春，与眉阳子瞻游于安国寺，饮酒于竹间亭，擗亭下之茶，烹而饮之。公既去郡，寺僧继连请名。子瞻名之曰遗爱。谷自蜀来，客于子瞻，因子瞻以见公。公命谷记之。谷愚朴，羁旅人也，何足以知公。采道路之言，质之于子瞻，以为之记。”巢谷字元修，苏轼《元修菜》自序云：“菜之美者有吾乡之巢，故人巢元修嗜之，余亦嗜之。元修云：‘使孔北海见，当复云吾家菜耶。’因谓之元修菜。余去乡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元修适自蜀来见余于黄，乃作是诗使归致其子，而种之东坡之下云。”苏轼兄弟服父丧期满“去乡”还朝是在熙宁元年(1068)年底，“余去乡十有五年”，则当在元丰六年(1083)，徐君猷罢黄州任在元丰六年四月末，此记当作于徐离黄前不久。

四是可据宋人所撰较为可靠的苏轼年谱定写作时间，如《墨宝堂记》(1072)。《东坡纪年录》：“熙宁五年壬子公在杭州，……作《宝墨堂记》。”《东坡乌台诗案》：“熙宁五年轼任杭州通判日，太子中舍越州签判张次山有书求轼作本家《宝墨记》。”熙宁五年即1077年。《李氏山房藏书记》(1076.11)。《东坡纪年录》：“(熙宁九年)十一月朔，作《李氏山房藏书记》。”熙宁九年即1076年。

五是可定大体写作时间而不能定具体写作时间者，如《墨君堂记》(1069)。记云“凡人相与号呼者，贵之则曰公，贤之则曰君，自其下则尔、汝之。虽公卿之贵，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则进而君、公，退而尔、汝者多矣。独王子猷谓竹君，天下从而君之无异辞。今与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

容，作堂以居君，而属余为文，以颂君德，则与可之于君，信厚矣。”可见墨君堂为文同藏所画墨竹之堂。文同《黄氏易图后题》（《丹渊集》卷二一）自署“熙宁己酉孟冬望日墨君堂书”，熙宁己酉为熙宁二年（1069），苏轼此记当作于此年前后。

六是暂难编年，《李太白碑阴记》、《静常斋记》、《清风阁记》、《盐官大悲阁记》、《观妙堂记》。

根据以上编年，重新以写作时间先后排序如下：

《喜雨亭记》（1062）、《凤鸣驿记》（1062）、《凌虚台记》（1063）、《中和胜相院记》（1067）、《四菩萨阁记》（1068.10）、《墨君堂记》（1069）、《净因院画记》（1071）、《墨妙亭记》（1072.12）、《墨宝堂记》（1072）、《钱塘六井记》（1072）、《仁宗皇帝御飞白记》（1074）、《醉白堂记》（1075.11）、《超然台记》（1075）、《盖公堂记》（1076）、《李氏山房藏书记》（1076）、《零泉记》（1076）、《宝绘堂记》（1077.7）、《宝绘堂记》（1077.7）、《密州通判厅题名记》（1077）、《思堂记》（1078.1）、《滕县公堂记》（1078.7）、《眉州远景楼记》（1078.7）、《庄子祠堂记》（1078.11）、《放鹤亭记》（1078.11）、《奖谕敕记》（1078）、《游桓山记》（1079.1）、《灵壁张氏园亭记》（1079.3）、《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1079.7）、《秦太虚题名记》（1080.8）、《赵先生舍利记》（1080.11）、《石氏画苑记》（1080.12）、《胜相院经藏记》（1080）、《应梦罗汉记》（1081.4）、《子姑神记》（1082.1）、《雪堂记》（1082）、《遗爱亭记（代巢元修）》（1083年春）、《天篆记》（1083）、《黄州安国寺记》（10844）、《石钟山记》（1084.6）、《熙宁手诏记》（1088.11）、《法云寺礼拜石记》（1093.7）、《北海十二石记》（1093.8）、《北海十二石记》（1093.8）、《方丈记》（1094.9）、《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1095）、《野吏亭记》（1096.11）、《众妙堂记》（1098.3）、《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1100.10）、《南华长老题名记》（1101.1）、《南安军学记》（1101.3）、《顺济王庙新获石磬记》（1101.4）、《琼州惠通泉记》（1101.6）。

苏轼杂记文的特色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序例》说：“杂记类，

所以记杂事者。……后世古文家修造宫室有记，游览山水有记，以及记器物，记琐事皆是。”杂记文的特点就是杂，苏轼的杂记文尤杂。有楼记，如《眉州远景楼记》；有阁记，如《清风阁记》；有斋记，《静常斋记》；有驿记，如《凤鸣驿记》；有碑记，如《李太白碑阴记》；有学记，如《南安军学记》；有藏书记，如《李氏山房藏书记》；有台记，如《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有题名记，如《密州通判厅题名记》、《秦太虚题名记》；有山水记，记山如《游桓山记》、《石钟山记》，记水如《零泉记》、《钱塘六井记》、《琼州惠通泉记》；有石记，如《北海十二石记》、《顺济王庙新获石磬记》（实为一篇考古文）；苏轼好书画，记书法的有《仁宗皇帝御飞白记》、《刻秦篆记》；记绘画的有《石氏画苑记》、《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画水记》、《净因院画记》、《传神记》；苏轼所撰亭记、堂记、寺庙记尤多，亭记如《喜雨亭记》、《墨妙亭记》、《放鹤亭记》、《灵壁张氏园亭记》、《野吏亭记》、《遗爱亭记》；堂记如《醉白堂记》、《盖公堂记》、《众妙堂记》、《思堂记》、《庄子祠堂记》、《墨君堂记》、《宝绘堂记》、《墨宝堂记》、《滕县公堂记》、《观妙堂记》、《雪堂记》；苏轼喜与和尚交往，故所撰寺庙记特多，如《中和胜相院记》、《四菩萨阁记》、《盐官大悲阁记》、《胜相院经藏记》、《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黄州安国寺记》、《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南华长老题名记》、《应梦罗汉记》、《成都大悲阁记》、《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方丈记》、《法云寺礼拜石记》、《赵先生舍利记》；记皇帝诏敕有两篇，一为《熙宁手诏记》，是为杨绘而作；一为《奖谕敕记》，是为自己徐州防洪有功所得奖敕而作。苏轼好奇，降神之记也有两篇，即《子姑神记》和《天篆记》。

苏轼杂记文的又一特点是破体为记。杂记文萌芽于先秦，盛于唐，变于宋。杂记文当以记事为主，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论杂记文的演变云：“按《金石例》云：‘记者，记事之文也。’……而《文选》不列其类，刘勰不著其说，则知汉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叙事为主，后人不知其体，顾以议论杂之。故陈师道云：‘韩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耳。’盖亦有感于此也。”杂记文以记事为主，以描写、抒情、叙事、议论的错综并用为特征，寓情于景。但宋人好发议论，多以论为记，苏轼尤为突出。有先

议论而后进入记叙的，如《超然台记》；有先记叙而后议论的，如《凌虚台记》；有记叙在中间，前后为议论的，如《石钟山记》；有议论在中间，前后为记叙的，如《放鹤亭记》；甚至有除用寥寥数语交待本事外，几乎通篇都是议论的，如《清风阁记》、《思堂记》。其《李太白碑阴记》甚至无只字记事，而纯是一篇驳论，先摆出李白“失节于永王（李）璘”的靶子，后面都是苏轼的反驳：“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其肯从君子昏乎！”认为李白是“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的东方朔式的人物：“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寢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辩。”这纯粹是以论为记。茅坤《苏文忠公文钞》卷二五云：“古来豪俊所被横口之污蔑者多，长公此一番洗刷，绝是。”

黄庭坚《书王元之竹楼记》（《山谷全书·正集》卷二五，清光绪二十年义宁州署重刻本）云：

“荆公（王安石）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盖尝观苏子瞻《醉白堂记》，戏曰：‘文词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的确如此，《醉白堂记》只有开头一段与最后一段是记事，中间的文字都是论韩、白优劣。先说韩琦为什么羡慕白居易：“天下之士，闻而疑之，以为公既已无愧于伊、周矣，而犹有羡于乐天，何哉？轼闻而笑曰：公岂独有羡于乐天而已乎？方且愿为寻常无闻之人而不可得者。”然后从三个方面比较韩、白，先说韩之所有，白之所无，韩之功业非白可比；次言白之所有，韩之所无，功成身退，悠游度过晚年则韩不如白；三是言韩、白之所同：“忠言嘉谋，效于当时，而文彩表于后世。死生穷达，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此公与乐天之所同也。”“忠言嘉谋，效于当时”是指立功，“文彩表于后世”是指立言，“死生穷达，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是指立德。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立功、立德、立言，他们都达到了。末以韩琦处已厚，取名廉作结：“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无自少，将推其同者而自托焉。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古之君子，其处已也厚，其

取名也廉。”黄震《黄氏日抄》卷六二云：“《醉白堂记》，反复将白乐天、韩魏公参错相形，而终之以取名也廉之说，尊韩之意，隐然自见于言外矣。”

尹洙戏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传奇》体”（陈师道《后山诗话》）。《传奇》这唐裴铏所著小说。”其实与其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似传奇小说，还不如说苏轼的《子姑神记》、《天篆记》更像传奇小说。《子姑神记》首言苏轼到黄州贬所前，子姑神就知道他将至；次记苏轼到黄后，曾亲自观看其降神：“予往观之，则衣草木，为妇人，而置箸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箸画字，曰：‘妾，寿阳人也，姓何氏，名媚，字丽卿。自幼知读书属文，为伶人妇。唐垂拱中，寿阳刺史害妾夫，纳妾为侍书，而其妻妒悍甚，见杀于厕。妾虽死，不敢诉也，而天使见之，为直其冤，且使有所职于人间。盖世所谓子姑神者，其类甚众，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为赋诗，且舞以娱公。’诗数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杂以嘲笑。问神仙鬼佛变化之理，其答皆出于人意外。坐客抚掌，作《道调梁州》，神起舞中节。曲终，再拜以请曰：‘公文名于天下，何惜方寸之纸，不使世人知有妾乎？’”末以苏轼为答其意而撰此记作结。降神事民间多有，即使所记为实，亦属小说家言。《天篆记》（卷一二）所记事与《子姑神记》相似。以传、记名篇的不少文章实属小说，已引起注说研究者的重视。以论为记并不妨碍描写、抒情，《石钟山记》（卷一一）是一篇带有考辨性质的游记，是一篇具有某些论说文（特别是驳论文）特点的游记。通篇围绕着石钟山山名的由来，先写郦道元和李渤对山名由来的看法，摆出要证明的观点和要反驳的靶子；接着用亲访石钟山的所见所闻，证实并补充了郦道元的观点，反驳李渤的观点，使形象的景物描写为证明和反驳服务。最后，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不可“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这一中心论点，交代了写作意图。全文思路清晰，结构严谨，说理透辟，文笔流畅。其中夜游石钟山一段，写得非常生动形象。有生动的比喻（大石“如猛兽奇鬼”，鹳鹤“若老人咳且笑者”，水声“如钟鼓不绝”，“如乐作”），形象化的拟人（大石“森然欲搏人”），贴切的象声词（“磔磔”、“噌吰”、“坎坎镗鞳”），对夜游石钟山的所见所闻作了绘声、绘色、绘形的描写，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行文也有缓有急，抑扬顿挫，波澜起

伏，诙谐风趣。大石“森然欲搏人”，上有云霄间栖鹘的惊啼，下有山谷中鹳鹤的怪叫，写得来阴森可怖，寒气袭人。“余方心动欲还”，暂缓紧张气氛；突然又听见“大声发于水上，舟人大恐”，又重趋紧张。经过“徐而察之”，原来是微波冲击石缝发出的声音，又趋缓和，确实写得来舒张有致。文笔也变幻多姿，毫不板滞。写栖鹘，是先点鸟名，再写惊飞，最后写其惊叫；写鹳鹤，是先写怪叫，然后再交代是鹳鹤在叫。前者用象声词“磔磔”形容其惊叫，后者用比喻“若老人咳且笑”形容其怪叫。两处水声的写法，作者也不肯雷同一笔，表现了苏轼驾驭语言的非凡能力。《石钟山记》确如《古文辞类纂》卷五六刘大櫆所评，是“坡公第一首记文”，是“子瞻诸记中特出者”。

如果说《石钟山记》以写景胜，那么《石氏画苑记》则以刻画人物胜，为我们刻画了一位不好功名富贵，而好读书、收藏的异人：“石康伯字幼安，蜀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举进士不第，即弃去，当以荫得官，亦不就，读书作诗以自娱而已，不求人知。独好法书、名画、古器、异物，遇有所见，脱衣辍食求之，不问有无。居京师四十年，出入闾巷，未尝骑马。在稠人中，耳目谡谡然，专求其所好。”形如剑侠，言善滑稽：“长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画道人剑客，而徒步尘埃中，若有所营，不知者以为异人也。又善滑稽，巧发微中，旁人抵掌绝倒，而幼安淡然不变色。与人游，知其急难，甚于为己。有客于京师而病者，辄舁置其家，亲饮食之，死则棺敛之，无难色。凡识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独深知之，幼安识虑甚远，独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二，状貌如四十许人，须三尺，郁然无一茎白者，此岂徒然者哉！”此文重点不在写石氏画苑，而在刻画石康伯之为人。石“善滑稽”，苏轼此记亦“善滑稽”，《苏文忠公文钞》卷二四茅坤评：“中多以文为戏，然亦自是佳品。”

苏轼的杂记文还善于小处着笔，以小见大，唐顺之称其《仁宗皇帝飞白御书记》“小题从大处起议论”（《苏文忠公文钞》卷二四）。“小题”因为所议为仁宗书法之一种；“从大处起议论”，因所议实为仁宗的朝政：“合抱之木，不生于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于三家之市。臣尝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测知圣德之所至，独私窃览

观四十余年之间，左右前后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俊伟，深厚雄杰，不可窥较；而其小者，犹能敦朴恺悌，靖恭持重，号称长者。当是之时，天人和同，上下欢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余，功业难名而福禄无穷。升遐以来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内外，下至深山穷谷，老妇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长，见当时之人，闻当时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岂独上之泽欤？凡在廷者，与有力焉。”

苏轼的《墨宝堂记》、《众妙堂记》、《李氏山房藏书记》等也善于以小见大。《墨宝堂记》以大半篇幅写世人往往“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饮食，华衣服，好声色而已。有人焉，自以为高而笑之，弹琴弈棋，蓄古法书画图，客至，出而夸观之，自以为至矣。则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见于后世者，以有言语文章也，是恶（何）足好？而豪杰之士又相与笑之，以为士当以功名闻于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见于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为也。而其所谓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于伊、吕、稷、契之所营，刘、项、汤、武之所争，极矣。而或者犹未免乎笑，曰：是区区者，曾何足言！”

而许由辞之以为难，孔丘知之以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岂有既乎（尽）？士方志于其所欲得，虽小物，有弃躯忘亲而驰之者。故有好书而不得其法，则椎心呕血，几死而仅存，至于剖冢斲棺而求之，是岂有声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乐之也，虽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是一篇讽刺王安石变法之作，《乌台诗案·为张次山作〈墨宝堂记〉》载苏轼供词云：“熙宁五年内，轼往通判杭州日，太子中舍越州签判张次山，有书求轼作本家《墨宝堂记》。除别无讥讽外，云蜀之语曰：‘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试之学，而骤出之于政，其费人，岂特医者之比乎？轼以谓学医者当知医书，以穷疾之本原。若今庸医瞽伎，投药石以害人性命，意以讥讽朝廷进用之人多不练事，骤施民政，喜怒不常，其害人甚于庸医之未习。”《苏文忠公文钞》卷二四唐顺之评认为，此篇也是以“小题从大处起议论，有箴规之意”。箴规“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讥以“未试之学而骤出之于政”。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类编老苏大全文集》初探

刘尚荣

内容提要：本文简述了宋代苏洵文集传刻情况，重点介绍了《类编老苏大全文集》的基本面貌，并且具体介绍了发现苏洵佚诗 20 首：《九日和魏公》、《送蜀僧去尘》、《游嘉州龙岩》、《游凌云寺》、《初发嘉州》、《题仙都观》、《仙都山鹿》（并序）、《过木柄观》（并引）、《题白帝庙》、《神女庙》、《题三游洞石壁》、《和杨节推见赠》、《答张子立见寄》、《荆门惠泉》、《襄阳怀古》、《万山》、《昆阳城》、《寄杨纬》、《与可许惠所画舒景以诗督之》等，对其中的《自尤》（并序）作了赏析，还从版本的角度介绍了《辨奸论》的最早出处。

关键词：苏洵文集 类编老苏大全文集 苏洵佚诗

一 宋代苏洵文集传刻简述

苏洵文集在宋时已有多种传本，见诸记载的有：（1）欧阳修《赠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及曾巩《苏明允哀词》皆言有文集二十卷。（2）晁公武《都斋读书志》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并著录苏洵《嘉祐集》十五卷。（3）《通志·艺文略》著录《老苏集》五卷又《嘉祐集》三十卷。（4）《宋史·艺文志》著录《苏洵集》十五卷又《别集》五卷。以上各本之书名卷数互异，而其内容与编次等，已无从考知。

今所知见的宋刊苏洵文集凡五种：

（1）《嘉祐集》十五卷。南宋中叶蜀刻小字本《三苏文集》之一，版式大小与传世的《东坡应诏集》，正同。黄丕烈有跋。蒋篁亭、顾广圻等人之校宋本，即据此本录校；《四部丛刊》曾据此

本影印。原书存上海图书馆。

（2）《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十二卷。题吕祖谦注，吴炎校勘，宋绍熙四年（1193）刊本。民国间有影宋抄本。原书存北京图书馆。

（3）《嘉祐集》十六卷附录二卷。徐乾学家传是楼所藏，卷末题“绍兴十七年（1147）四月晦日婺州学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以著录。

（4）《老泉文集》十一卷。宋刊《三苏先生文粹》所收，有婺州刊本等。

（5）《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存四卷。疑是北宋麻沙本。

上列诸书，前四种各家书目多有记载，后世又有影印、手钞或翻刻本流传，为读者熟知。第五种则诸家书目罕予著录，然其资料价值与版本价值似在各本之上。本文拟对该书做初步探讨、评价，为叙述方便，以下简称该书为《类编老苏集》。

二 《类编老苏集》基本面目

本书卷首题名为《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存总目数页及正文四卷。目录存卷一至八；卷九以下应收苏洵代表作《衡论》等，已佚。正文卷一至四，计古律诗二卷，杂论一卷，经论一卷，全。卷五以下正文全佚。此书无序，足本应有卷数亦无考。

此书每半叶十五行，每行二十五至二十八字不等。左右双栏，细黑口，双鱼尾，下鱼尾下记叶数。字近柳体，又喜用俗字，校讎不精，且有误

刊。

正文各卷卷首顶格题书名为《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卷末则题《类编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无“增广”二字。第四卷卷首顶格题《新雕类编老苏先生大全文集》。书名标列不统一，正反映了坊刻本粗疏之处。

本书为清朝瞿镛“铁琴铜剑楼”旧藏，书首原有“经后人范文安珍藏”，“静巖秘珍”等朱文印记。瞿氏上承绎云楼、汲古阁、稽瑞楼、爱日精庐，收藏宋元善本甚富。《类编老苏集》当亦有所自出，唯不见宋、元、明诸家书目之著录。缘因何在，尚待查考。

本书题名及行格版式等，均与传世的《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宋乾道间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所刻）一书相似。但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考订：《类编老苏集》“讳殷、徵、匡字，阙笔；而桓字不改作威，亦不阙笔。疑是北宋麻沙本。”经复核，书中构、慎等字均不讳，与上述乾道刊本《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讳字情况颇不一致。《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收《类编老苏集》，笼统著录为“宋刻”。今据全书避宋讳情况，似应定为北宋末年刻本。

此书已成为海内孤本。虽为残帙，但刊刻年代比其它诸本苏洵文集都早，内容上又有与众本不同之处，很值得做专题研究。

三 苏洵佚诗的重大发现

《类编老苏集》第一、二两卷，共收古律诗四十余首，计分十九类：纪行、怀古、投献、简寄、酬答、送行、释氏、九日、器用、寺观、祠庙、山水、城洞、园圃、书画、禽兽、自述、挽辞、效古。存诗数量超过《嘉祐集》一倍，其中将近半数为苏洵的久已失传的佚诗。

见于《嘉祐集》而此书未收的诗有：《送王吏部知徐州》、《送任师中任清江》。见于此书而《嘉祐集》及其它各本苏洵文集均未收的诗则共有二十首，多为嘉祐元年（1056）至六年（1061）间的作品。今略以写作时代为序，列举诗题如下①：《九日和魏公》、《送蜀僧去尘》、《游嘉州龙岩》、《游凌云寺》、《初发嘉州》、《题仙都观》、《仙都山鹿》（并序）、《过木柄观》（并引）、《题白帝庙》、

《神女庙》、《题三游洞石壁》、《和杨节推见赠》、《答张子立见寄》、《自尤》（并序）、《荆门惠泉》、《襄阳怀古》、《万山》、《昆阳城》。另有《寄杨纬》、《与可许惠所画舒景以诗督之》等，写作年月待考。

此前有人从宋建安本《百家注分类东坡诗集》及明成化本《东坡续集》等书中，发现苏洵的几首佚诗。凤毛麟角，弥足珍贵。如今获睹《嘉祐集》以外确属苏洵所作的二十首诗，真可庆幸借此改变“苏明允不能诗”的传统偏见了②。这些诗，取材广，内容杂，艺术手法亦颇具特色。这些诗，主要记述了嘉祐年间苏洵的行迹、交游、见闻、感受，诚如叶梦得所说：“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③下面摘举数例，做些粗浅评价：

这里有赞美祖国壮丽山河的佳什：“谁开三峡才容练，长使群雄苦力争”，④摄下长江三峡雄奇险峻的风姿；“长江触山山欲摧，古佛呴水山之隈。千帆万舸颠前过，仰视绝顶皆徘徊。足踏重涛怒汹涌，背负乔嶽高崔嵬”，⑤描绘出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宏伟壮观的奇景。

这里有抒怀言志的诗章：“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士偶傍醉中来”⑥，写的是嘉祐元年（1056）的苏洵以布衣身份受“异礼”而结交韩琦等执政大臣时，“其意气尤不少衰。”⑦“予懒本不同，实为人事劫”；⑧“佳镜日已去，何时休远行”⑨，表达出嘉祐四年（1059）的苏洵身世坎坷、求官无望时的厌倦与苦闷。“少年实强锐，议论今我怯。”⑩说出了饱经沧桑后的愧悔。“何以洗怀抱”，“泪与汉流倾”⑪，抒发了壮志难酬时的悲愤。

这里有追慕仙人的歌吟：“巫阳仙子云为裾”，“愿采山下霜中蔬”⑫，何其飘逸高雅。“朝食白云英，暮饮石髓鬯。心肝化琼玉，千岁已无恙，”⑬则又峻洁坚定。

这里有悲天悯人的咏叹：“未必三军皆反虏，江河填满道流血”，“昆阳城外土非土，战骨多年化墙堵”⑭，谴责了西汉末年刘秀与王莽在昆阳之战中的滥杀无辜，草菅人命。

特别应予指出的是，嘉祐四年（1059）十月至次年二月，苏洵奉诏携其子苏轼、苏辙离蜀赴京⑮，沿途“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⑯父子三人所作诗文汇编为《南行

集》。此书虽已佚，而《南行集》中苏洵的诗，《类编老苏集》却录存了十余首。这是一笔很值得重视的文学遗产，为有志钩沉《南行集》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四 《自尤》——苏程交恶始末记

在《类编老苏集》保存的苏洵佚诗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自尤》（并序），它真实记载了可能是影响苏洵生活道路的一件大事：苏洵与妻兄程濬及其子程之才交恶的始末。

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有云：

老苏《族谱亭记》，言乡俗之薄，起于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者，盖苏与其妻党程氏大不咸，所谓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诗，述其女事外家事，不得志以死，其辞甚哀。

《族谱亭记》见《嘉祐集》卷十三，该文抨击的“某人”，是“乡之望人也，而大乱吾俗焉”。文中揭露了“某人”治家的六大恶行：骨肉之恩薄，孝悌之行缺，礼义之节废，嫡庶之别混，闺门之政乱，廉耻之路塞。但“某人”凭借“官爵货力”、富贵权势，仍足以“荡惑里巷”，“动摇府县”，“欺罔君子”。文章斥“某人”为“州里之大盗”。之所以“书其事而阙其姓名”，是为了“私以戒族人”，使“某人”观此文而“有悔”。该文并未直书苏程交恶一事。如果说此前我们对苏程交恶内幕还缺乏充分了解，在读了《自尤》诗后，就会一目了然，而且能理解此事对苏洵打击有多么沉重。

程家为眉山望族；苏氏乃当地寒门。程濬之父程文应，曾为大理寺丞，已显贵；苏洵之父苏序，则是豪爽侠义的白丁。苏洵有兄名苏涣，天圣二年（1024）中进士乙科，苏氏自唐以来五世无出仕者的困境始告结束；程濬亦同榜进士及第，并封官。官小职卑的苏涣无力从根本上提高苏家的社会地位，苏洵本人更因屡试不举，遂废学荡游。当苏洵娶程濬之妹为妻时，“程氏富而苏氏极贫”，两家门第不等，只是由于夫人的“孝恭勤俭”，方得家庭和睦。然而到苏洵之女与程濬之子（程之才）结亲时，程家一门显贵，苏洵仍为布衣。苏、程之间门不当户不对的情况更为严重，矛盾日趋尖锐。一场婚姻悲剧，已是所难免。

《自尤》诗前有二百四十字的长叙，其中谈

到四个问题：（1）标榜自己“幼居乡间，长适四方，万里所至，与其君子而远其不义，是以年五十有一而未始有尤于人，而人亦无以我尤者”。（2）夸奖小女“幼而好学，慷慨有过人之节，为文亦往往有可喜”，视若掌上明珠。（3）程濬“內行有所不谨，而其妻子尤好为无法”。知书达礼的苏小妹“固为其家之所不悦”；得病后“其夫与其舅姑遂不之视而急弃之”，致苏小妹于死地。（4）苏洵初而深怨程家，后友人对苏洵说：“子自知其贤而不择以予人，咎在子而尚谁怨？”事隔八年，苏洵满怀悔恨与哀思，写下《自尤》诗。

《自尤》全诗七百字。一韵到底，一气呵成；纯用白描，不事雕琢。这是一曲百感交集、动人肺腑的哀歌。

诗中说，苏小妹十六岁嫁给程之才，十八岁受迫害而亡，时在皇祐四年壬辰之岁（1052）。清人王文诰《苏诗总案》考订苏程二家绝交在皇祐五年（1053），今人所编《苏洵年谱》、《东坡年表》等，亦多从王文诰说不妥，均应依此诗改正。

诗中写道，苏小妹“读书未省事华饰，下笔亹亹能属文”；“俨然正直好礼让，才敏明辩超无伦”。由于“乡人婚嫁重母族”，所以当叔舅程濬主动“求以其子来婚姻”时，苏洵只得应允。

不料文质彬彬、才华横溢的苏小妹出嫁之后，竟“日负忧责无欢欣”。原因是“舅姑叔妹不知道，弃礼自快纷如云”，闹得不成体统。苏小妹“捩耳不听生怒嗔”，忍不住回娘家“悲且泣”。苏洵曾劝她独善其身，以尽妇道。一年后，她为程家生下孙儿，得到的报答却是“一朝有疾莫肯视”，加紧了折磨迫害。在苏洵夫妇为小女之病忧惶奔波以求救治时，程濬作为叔舅和尊翁，其态度却是：

“此时汝舅拥爱妾，呼卢握槊如隔邻。狂言发病若有怪，里有老妇能降神。呼来问讯岂得已，汝舅责我学不纯。”请神弄鬼，“多多扰乱”，本属胡闹，反怪苏小妹“不肯同其尘”。后来竟发展到“舅姑不许再生活，巧计窃发何不仁。婴儿盈尺未能语，忽然夺去词纷纷。传言姑怒不归觐，急抱疾走何暇询。病中忧恐莫能测，起坐无语涕满巾。须臾病作状如故，三日不救谁缘因。”由此可见，苏小妹是死于吃人的礼教，死于包办婚姻，死于封建迷信，死于程家对她从精神到肉体的折磨，死于非命。

苏小妹之死，曾“惊动”众人，“行人闻者皆酸辛。”然而这时的苏洵，身为布衣。无势无勇，

只能忍气吞声，坐视“孤塚埋冤魂”。眼见幼女受欺凌而死，却无力抗争。这使苏洵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影响到他此后的处世为人。

众所周知，苏洵少不喜学，荡游四方。“年二十七始大发愤”，“闭户读书为文辞”。⑩不料屡试不中，科场失意。“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⑪皇祐四年，苏洵已经四十四岁，发生了苏小妹之死的不幸事件。倍受屈辱的处境，促使他加快了《权书》、《衡论》的写作，另觅进身的阶梯。嘉祐初年，苏洵的散文受到欧阳修的推重，名动京师，“苏氏文章遂擅天下”。但他的社会地位未变，仍是布衣。苏洵一改“绝意功名”的旧态，竟迫不及待想求得一官半职；并加紧对苏轼、苏辙兄弟的培养，使他们同科进士及第。嘉祐五年，朝廷几经周折，授苏洵秘书省试校书郎的起码官，他发了阵牢骚却并未拒绝。苏洵晚年急切求官的苦衷，正可以从《自尤》诗中找到部分答案。苏小妹死后八年，苏洵仍耿耿于怀，写下追记冤情的长诗。因为他忘不了当年的屈辱，忘不了“官爵货力”可护身，布衣只能受人欺。

《自尤》诗的最后点明题意：“虎跑牛触不足怪，当自为计免见吞。深居高堂闭重键，牛虎岂解逾墙垣。登山入泽不自爱，安可侥幸遭骐麟。明珠美玉本无价，弃置沟上多磷磷。置之失地自当尔，既尔何咎荆与榛。”由于不辨良莠而自怨自艾，因为明珠暗投而追悔莫及。自嘲比漫骂更引人同情，曲笔写出的凄楚悲愤更催人泪下。

五 《辨奸论》的最早出处

《辨奸论》是否为苏洵所作，学术界众说纷纭，但多从内容分析，缺少作版本考订工夫。清人李绂发难，谓《辨奸论》“非老泉作”。他在《穆堂初稿》卷二十四中提供的证据之一是：

老泉《嘉祐集》十五卷，原本不可见。今行世本有《辨奸》一篇，世人咸因此文称老泉能先见荆公之误国。其文始见于《邵氏闻见录》中，《闻见录》编于绍兴二年。至十七年，婺州学教授沈裴编《老苏文集》附录二卷，有载张文定公方平所为《老泉墓表》，中及《辨奸》；又有东坡《谢张公作墓表书》一通，专叙《辨奸》事。窃意此三文皆赝作。

李绂的版本依据是：《辨奸》出自“世俗所刻不称《嘉祐集》的二十卷本，而他自称见到了“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张镗翻刻巡按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此本，“诸论中独无所谓《辨奸论》者。”

李绂所说“世俗刻本”，盖指清康熙间邵仁泓所刻本。此本诚然不足为据，而明嘉靖本又何足为凭？明嘉靖本今不难得，该书源于宋刻本《嘉祐集》十五卷，不收《辨奸》。这是由于《辨奸》最早可能出自《别集》五卷。宋绍熙四年（1193）所刻《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与宋刊《三苏文粹》，都收入《辨奸》，尤其是成书年代当早于《邵氏闻见录》的《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卷三杂论中也收录了《辨奸》，这就使李绂的“邵氏赝作”说，不攻自破。

苏轼的《谢张太保撰先人墓表书》，早就收入《东坡前集》卷二十九。而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八云：“世传《前集》乃东坡手自编者，随其出处，古律诗相间，谬误绝少。”又《直斋书录解题》亦云：“坡之曾孙给事峤季真刊家集于建安，大略与杭本同。盖杭本当坡公无恙时已行于世矣。”余嘉锡认为此亦“指《前集》言之。”⑫《东坡前集》既为东坡生前亲自釐定，则《谢表》与《辨奸》一样，不可能出自“邵氏赝作”。

《辨奸论》的作者究竟是邵伯温还是苏洵，文中的“奸”究竟指谁人？作为学术问题，应允许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笔者在此无意做全面考订，只想从版本角度，提供点新资料而已。

此外，《类编老苏集》所收诗文，字句每与《嘉祐集》不同，颇富校勘价值。今举一例：卷三杂论所收《谏上》，题下有注云：“贤君不时有，谏臣不时得。故作《谏论》。”此注见于《三苏文粹》本，但《嘉祐集》诸本无之。这是作者自注还是编书人的校注，还可以研究，但此注有助于考定苏洵作文命意，则是显而易见的。这类例证不少，不详述。

总之，《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虽然只存四卷，但对研究苏洵生平思想，补《嘉祐集》之佚缺，校订现存苏洵诗文，皆至关重要，不容忽视。

论文注释：

①关于这些诗及其它苏洵佚诗的编年、辨伪等，笔者另撰《苏洵佚诗辑考》（见《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本文不赘述。（下转33页）

相濡以沫 生死与共

——苏颂与苏轼亲情考述

管成学

内容提要：苏颂是中外推崇的科学泰斗，苏轼是影响世界的文坛巨星，但他们渊源有自：是同一个祖先的叔侄、同一个恩师的进士、同一个牢狱的囚徒。1060年，苏洵领苏轼、苏辙兄弟到苏颂家里认宗盟之亲后，开创了他们两人40余年生死与共的情谊。

关键词：同一个祖先 同一个恩师 同一个牢狱

苏颂与苏轼是宋代最有影响的两位伟人。一个是中外推崇的科学泰斗，一个是光照文坛的文学巨星。

李时珍称赞苏颂的《本草图经》：“考证详明，颇有发挥。”^①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颂扬苏颂说：“作为大诗人苏东坡诗友的苏颂，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药物学家。他在1061年撰写了《本草图经》，这是附有木刻标本说明图的药物史上的杰作之一。在欧洲，把野外可能采集到的动植物加以如此精确地木刻并印刷出来，是直到十五世纪才出现的大事。”^②

前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科学家卢嘉锡编写对联，表彰苏颂的科学业绩：“探根源，究终始，治学求实求精；编本草，合象仪，公诚首创。远权宠，荐贤能，从政持平持稳；集人才，讲科技，功颂千秋。”^③

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科学技术馆，在英国的南肯辛顿科学博物馆，在日本精工舍钟表的发祥地——长野县诹访湖科学馆等地，都陈列着苏颂研制的水运仪象台的复制品。全世

界都在使用苏颂的科学发明激励人民献身科学，造福人类。

他们已经离开我们九百年了，但他们的声音依然在我们的身边回响。在中学生的课堂上，在高校的校园里，在青年人的诗歌朗诵会上，你随时可以听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这两位同时代的伟人，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们有过什么交往与切磋呢？他们的情谊与遭遇，对新时代的莘莘学子有些什么启迪与教益呢？

一、心照不宣的叔侄

宋代元丰二年（1079），苏颂与苏轼因受政敌李定及其同伙的诬陷，先后被捕入狱。两人的狱室，仅一墙之隔。苏颂常常听到狱吏对苏轼的刑讯拷打之声，写诗留为纪念：“源流同是子卿孙，公自多才我寡闻……”^④

子卿是汉代苏武的字，苏颂说他俩都是苏武的子孙。

在我们收集到的三十七部《苏氏族谱》中，苏颂是庐山派子孙，因其福建省同安县的祖祠称庐山堂，故称庐山派，苏轼是眉山派子孙，因其眉山派始祖苏味道由唐凤阁侍郎同平章事贬为眉州刺史，始有眉山苏轼，故称眉山派。

庐山派始祖、唐代隰州刺史苏益在其族谱序

言《吾祖渊源》中说：“我苏氏自高阳肇端，昆吾得姓。昆吾樊有兄弟六人。樊居昆吾，而封于苏，因地命氏。当夏之时，为诸侯伯。厉商而昆吾之后无闻。至周有忿生，为周司寇……封于温，世世仕周，家于其封，故河南、河内皆有苏氏……六国之际，苏纵、苏秦及代、厉，皆其苗裔也。”

“汉兴，高祖徙天下豪杰以实关中，苏氏亦由河南、河内而迁秦，遂家于长安、杜陵间。至汉武帝时，建公官校尉，从卫青大将军……立大功，封平陵侯，居长安而葬武功，其后遂家其所封，是为武功人。”⑤

平陵侯苏建正是出使匈奴十九年、杖节不屈的苏武（字子卿）的父亲，这就是苏颂写诗给苏轼说：“源流同是子卿孙”的依据。

苏轼的父亲苏洵，在《苏氏族谱后录》上篇写道：“苏氏之先出于高阳，……当夏之时，昆吾为诸侯伯，厉商而昆吾之后无闻。至周有忿生，为司寇……司寇苏公与檀伯达皆封于河，世世仕周，家于其封，故河南、河内皆有苏氏。六国之际，苏纵、秦及代、厉，其苗裔也。至汉兴，而苏氏始徙入秦……其后曰建，家于长安杜陵，武帝时，为将以击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后世遂家于其封。建生二子：长曰嘉，次曰武，次曰贤。嘉为奉车都尉，其六世孙纯，为南阳太守，生子曰章，当顺帝时为冀州刺史，又迁为并州，有功于其民，其子孙遂家于赵州。其后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云。味道圣历初为凤阁侍郎，以贬为眉州刺史，迁为益州长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归，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苏氏。故眉山之苏皆宗益州长史苏味道。”⑥

苏颂的二世孙苏玭，在续修的《苏氏世谱原序》中，接着先祖苏益的序言说：“建事武帝，从大将军青击匈奴，以功封平陵侯，侯生三子：嘉为奉车都尉，贤为骑都尉、中子武以中郎将使匈奴……仕东汉者，代郡太守竟，南阳太守、中陵侯纯，冀州刺史章……唐室之初……良嗣、味道、瑰俱相中宗，瑰封许国公……自昆吾至司寇凡千余年，司寇至平陵凡八百余年，平陵至许国亦八百余年，许国而下，世次可考。始隰州刺史益，随王潮入闽，始居闽中。”⑦

从上可知，汉代苏建、苏武之子孙，传至唐代有苏良嗣、苏味道、苏瑰任宰相。苏味道被贬四川，留下了苏洵、苏轼等眉山派子孙。苏瑰立

于孙苏益迁入福建，留下了苏绅、苏颂等庐山派子孙。

苏颂与苏轼的交往始于嘉祐五年（1060）。嘉祐元年（1056），苏洵携苏轼、苏辙赴京应试。嘉祐二年，苏轼、苏辙同中进士，使苏洵父子名动京师。苏洵的文章，一直被欧阳修、韩琦等人所赏识，早在公卿士大夫间传诵。苏轼、苏辙同时高中，文章又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推崇，迎考的士子对三苏“尊其贤，学其文，以为师法。”⑧

嘉祐五年二月苏轼、苏辙为母亲守孝期满，与父亲苏洵一起到达京师，在西冈租房居住，等待皇帝的任命。这时苏颂改集贤校理、同知太常礼院，正在整理各类古籍。他刚刚也在西冈买了房子。他在“追省生平，感事述怀”诗的注文中说“予初置京师西冈宅，甚隘陋，罢相日，二府诸公见过，以为不称相第”。⑨由于两人的住处都在京师西冈，他们就见面认同宗，叙家谱，开始了君子之交。

苏颂长孙苏象先在其所著《魏公谭训》中明确地说：“自明允（苏洵字）讲宗盟之好，东坡称祖父为宗叔。”⑩可见是苏洵主动找苏颂认了本家，开始了苏颂、苏轼情深意切、历尽风雨的交往。他们在京师西冈比邻而居约八个月。深秋时，苏颂被任命为颍州知州，离京赴任。嘉祐五年十一月，苏轼被任为凤翔签判，也离开京师。

苏颂与苏轼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敢于斗争，不怕撤职、入狱和杀头。如后文所述的被写入《宋史》的“熙宁三舍人议案”。在日常生活中，他俩也能体贴入微，关怀备至，说一些不可告人的悄悄话。

载入《东坡志林》的现抄三件事如下：

元祐三年（1088）五月三日，苏颂告东坡：“孔道辅为张士逊所卖”。元祐三年龙兴节，颂告轼：“李沆尝言梅询非君子”。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颂告轼：“盛度不喜钱惟演”。可见两人的关系是何等亲密无间。

二、同一个恩师的进士

苏颂（1020至1101），字子容，福建同安（今厦门市）人。庆历二年（1042）进士。苏轼（1036至1101），字子瞻，四川眉州（今眉山市东坡区）

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

苏颂比苏轼大十六岁，苏轼比苏颂中进士晚了十五年。但凑巧的是他俩是同一个考官，同一个恩师，都是欧阳修任主考官，都是欧阳修批阅的试卷。

宋代邹浩为苏颂写的《苏公行状》中说：“再举为别轼第一，考官欧阳公修、张公方平谓人曰：

‘吾所试题，非通天下之奥，穷制作之原，不在首选。’遂中庆历二年乙科。”此次苏颂的父亲苏绅与欧阳修同为主考官，为避亲嫌，苏颂只能参加乙科别试。考题是有关“通天下之奥，穷制作之原”的科技论文，正是苏颂的专长，他在16岁时就作过《夏正建寅赋》，纵论夏代的天文历法。他父亲称赞说：“夏正建寅无遗事矣，汝异时当以博学知名也。”^⑪苏颂还作过《斗为天之喉舌赋》，纵论天文历法。他还有一篇《历者天地之大纪赋》流传至今，^⑫是一篇难得的古代天文历法文献。可见他成为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绝非偶然。

苏颂的另一试卷是策问《周礼》名数。

苏颂的长孙苏象先在《魏公谭训》卷三中记载：“祖父别试南庙，欧公为考官。策问《周礼》名数。祖父居第一”。

欧阳修对苏颂试卷的批语是“才可适时，识能虑远。珪璋粹美，是为邦国之珍；文学纯深，当备朝廷之用”，^⑬可谓爱才殷切，寄以厚望。

苏颂在《元祐癸酉秋九月蒙恩补郡维扬》诗的注文中说：“予举进士日，欧阳公主文衡，误见赏拔。后留守宋都，予在幕府。自尔相知尤厚，始终不替。”^⑭欧阳修不仅赏识苏颂的文章，又是苏颂出仕后的长官。欧阳修任南京留守，苏颂任推官，欧委以重任，并夸奖说：“子容处事精审，一经阅览，则修不复省矣。”^⑮

欧阳修病逝，苏颂写诗哀悼：

早向春闱遇品题，继从留幕被恩知。……
谁将姓字题延道，共立门生故吏碑。

前两句说的是考官和属吏，后两句说的是愿写入恩师的墓志，为恩师立门生故吏碑。

嘉祐二年（1057）正月，翰林学士欧阳修主持礼部大考，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负责具体考务工作的是国子监直讲梅尧臣，他发现了苏轼精心构思，才气横溢的文章“有孟轲之风”，便送给欧阳修看，欧阳修又惊又喜，赞不绝口，欲以此文为考试之冠。但是，他误以此卷为门生曾巩所写，因文章气势与往日所见略同，为避嫌，

让居第二。后苏轼又在第二张试卷“春秋对义”中，被录为第一。

欧阳修对苏轼的试卷评价也很高：“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灿然，论议蜂出。其行业修饬，名声甚远，臣今保举，堪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⑯

欧阳修赏识苏轼的文章，绝非偶然。苏轼父亲苏洵的文章，近承欧阳修、韩琦，远追贾谊、孟子，文风古朴，文势雄健，内容真实，自成气象。一改雕琢文句、卖弄辞藻的所谓太学体文风。苏轼在父亲言传身教之下，继承唐代古文运动之遗风，掌握了一手纯熟的古文笔法。欧阳修正想借助京师的大考，扭转险怪奇涩、华而不实的太学体文风，提倡唐代以来的古文运动。在文风改革的大方向上，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欧阳修痛下决心，大刀阔斧，将一批素有文坛声誉的“太学体”考生黜抑，将默默无闻的来自四川闭塞之乡的苏轼、苏辙列为优等。金榜一出，舆论大哗。一些放肆的考生竟聚守在早朝的路上，对欧阳修谩骂诋毁，连巡街的士兵也无法制止。更有甚者，写了死人的祭文，投入欧阳修的家中。谩骂威胁，丝毫不能减弱欧阳修爱才荐才之心。

当苏轼奔母丧离京入川后，欧阳修给梅尧臣写信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又给张方平写信感谢他推荐苏轼，将来之好文章，定当属于苏轼。他拿着苏轼的文章对自己的儿子欧阳裴说，你记住我的话，再过30年，文人就不会提到我了。

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泰斗，文章道德，誉满天下，议论风发，风度秀伟。文人学士莫不推崇备至。他却对远在西蜀，素无声名的苏氏父子大加称赞，礼遇有加，表达了他的激赏之情。使默默无闻草芥之微的苏氏父子名震京师，文传天下，读书求学之人，都以其人为楷模，以其文为师法，宋代的文风时尚也随之一变。

苏颂、苏轼都多次以文章和书信表达，他俩一生最敬重的人除了父母，莫过于恩师欧阳修。他俩一生无论显达还是穷蹙，都对欧阳修敬之如严师，爱之如慈父。他们师生之间，相知相许的真挚情谊，荐才爱才，尊师重道的史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迪。

三、同一个牢狱的囚徒

元丰二年（1079）八、九两月，苏轼与苏颂先后被逮捕入狱。苏轼被关押在知杂南院，苏颂被囚禁在三院东阁。二人的狱室，仅一墙之隔。御史台的官吏李定、何正臣、舒亶等审问拷打苏轼的声音，苏颂听得清清楚楚。他写了许多诗传给子侄们和苏轼。其中一首说：欲怜比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诗下的注文说：“时苏子瞻自湖守追赴台劾，尝为歌诗，有非所宣言，颇闻镌詁之语。”⑯

苏颂与苏轼的入狱，与同一个政敌有关。这个政敌就是任御史中丞的李定。苏颂和李定成为政敌，还得从“熙宁三舍人事件”说起。这是一次关于选才任官的斗争，这事件震动朝野，风闻天下，写入《宋史》，流芳千古。

熙宁二年（1069）二月，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第二年四月颁布青苗法，实施中遭到非议，举朝共争之。王安石的学生李定，初任泾县主簿，又迁秀州判官。孙觉荐之，奉召来京。初谒谏官李常，常问：“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无不喜者。”常曰：“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据实以言，不知京师乃不许。”⑰安石大喜，立荐之神宗，神宗问青苗事，其对如昔言。神宗信之，遂命李定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当时的中书舍人苏颂、宋敏求、李大临封还皇帝的制书，反对这项违背法治的任命，这就是震惊朝野的“熙宁三舍人事件”。

苏颂坚持任官要遵守法制，经由吏部考核，不能按皇帝一时高兴，随意擢拔。他恪尽职守的坚定性受到满朝文武的称赞，虽被撤职，却使李定也没能任职御史台。苏轼对这位宗叔，更是推崇备至，终生敬仰。苏颂被撤职之后，苏轼写了《送李陶通直赴清溪》诗：“忠文公二大老，苏李广平三舍人。喜见通家三弟子，自言得邑少风尘。”表达了他对苏颂忠直守职的敬佩之情。他在写给苏颂的悼词中说：“在熙宁初，陪公文德殿，已为三舍人之冠……”⑲写这个悼词时，据苏轼辞世，只有两个月，可见苏颂在“三舍人事件”中的高风亮节对苏轼影响之大。

正是这个投机钻营的李定后来又任了御史中丞。他诬告苏轼，一手制造了株连司马光、张方平等人的乌台诗案。乌台就是御史台，是朝廷的

监察机构，权力甚大。元丰二年（1076），任御史中丞的李定和任监察御史里行的舒亶，挖空心思，查遍苏轼所有的奏章、诗文，找到一些对新法不满的词句，弹劾苏轼“侮慢朝政，有不臣之心”。神宗轻信了他们的奏章，下诏逮问苏轼。七月苏轼在湖州被捕，八月押至京师，囚于知杂南院的监狱。

苏颂任开封府尹时，因孙纯（《宋史本传》误为李纯）案件被舒亶所劾，贬知濠州。到濠州后，又因任开封府尹时，国子博士陈世儒夫妇的案件，被诬告宽纵，而逮捕来京，也囚于御史台监狱。

苏颂认为他与苏轼都是被诬陷，蒙受了不白之冤。他的狱中诗，有一个小序说：“己未九月，予赴鞫御史，而子瞻先已被系。予昼居三院东阁，而子瞻在知杂南院，才隔一垣，不得通音息。因作诗四篇，以为异日相遇一噱之资耳。”⑳现录两首如下：

源流同是子卿孙，公自多才我寡闻。
谬见推称丈人行，应缘旧熟秘书君。
文章高绝诚难敌，声气相求久益勤。
莫为歌诗能数昧，圣朝终要颂华勋。

近年出处略相同，十载遭回我与公。
杭婺邻封迁谪后，湖濠继踵絷维中。
诗人嗫嚅常多难，儒者凄凄久讳穷。
他日得归江海去，相期来访蒜山东。

第一首说虽然都是苏武之子孙，您才华横溢，我却孤陋寡闻。你错误推尊我有长者之行，应起源于我过去认识您的父亲秘书君。您诗文高妙绝伦，世无匹敌，我们声气相求，应该弥久益勤。不要为诗歌讽谏所迷惑，圣明的朝廷总会要颂扬其伟大的功勋。

第二首说最近十年是两人政治上的遭回时期，被贬之后，分任杭州通判和婺州（今浙江金华）知州，任职湖州、濠州又接踵被捕入狱。作为诗人的苏轼因吟咏而常遭灾难，做为儒者的苏颂因命运凄楚也长期处于穷窘逆境。如果将来可以脱离官场，期望您到蒜山（在镇江，苏颂为父守坟之地）来相聚。

两首诗说明了他俩源流相同，志气相同，遭遇相同。处于危难之中，苏颂对两人蒙冤深信不疑，并能仗义执言，咏诗以记。更说明苏颂的临危不惧、光明磊落的品格和对苏轼的笃信不疑、

一往情深。

四、生死与共的情谊

苏颂与苏轼生活的时代是风起云涌、惊涛迭起的时代，政府官员大起大落，宠辱无常。但是，他俩相知相许，相濡以沫，推心置腹，终生不渝。

嘉祐五年（1060），苏洵找苏颂认了同宗。平治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于京师。苏颂当时任三司度支判官，亲自赴丧。应苏轼之邀，作《苏明允宗丈挽词》二首：

观国五千里，成书一百篇。
人方期远到，天不与遐年。
事业逢知己，文章有象贤。
未终三圣传，遗恨掩重泉。

“成书一百篇”指苏洵所撰《太常因革礼》100卷，“未终三圣传”是指苏洵正在研究伏羲、文王、孔子所传《易传》，想作三圣之《易传》。

尝论平陵系，吾宗代有人。
源流知所自，道义更相亲。
痛惜才高世，赍咨涕满巾。
又知余庆远，二子志经纶。①

虽然苏洵《三圣传》没有完成。但苏颂对苏洵的家学发扬光大却充满信心：“又知余庆远，二子志经纶。”

元丰二年（1079），他俩共同经历了牢狱之灾。出狱后，苏颂经历了短暂的罢郡归班，又知沧州，回吏部，政治出现了新的转机，苏轼被贬谪黄州，过了四年多被监管的生活，他就是此时在黄州东山坡上结庐种地自号东坡居士，而有了东坡的雅号。

元丰七年（1084），苏轼结束了黄州的贬谪生活，获量移汝州之命，政治上有了新的希望。他立即给苏颂写信，报告他将离黄赴汝。苏颂已任礼部侍郎，身体有病，苏轼向其推荐名医庞安时。六月，苏颂母陈夫人病故，苏颂在维扬服丧。九月，苏轼由仪真赴维扬，吊陈夫人丧，撰《苏子容母陈夫人挽词》，②称赞陈从易（苏颂外公）、苏颂冰晶玉洁的品质和陈夫人有松竹之美的志节：

苏陈甥舅真冰玉，正始风流起颓俗。
夫人高节称其家，凛凛寒松映修竹。

元祐元年（1086）神宗病逝，哲宗继位，高

太后掌政。苏颂、苏轼都进入了政治的上升时期。苏颂升任吏部尚书，主持了誉满全球的水运仪象台研制工作。苏轼回京任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知制诰兼侍读。元祐七年，苏颂升左丞，元祐八年苏颂升宰相。元祐时期，两人有机会在中央政府任职，交往甚密。苏颂任职的诏书，有些就出自于苏轼之手，如《苏颂刑部尚书诏》、《赐苏颂上表陈乞致仕诏》、《赐光禄大夫守吏部尚书兼侍读苏颂上表乞致仕不许诏》等。苏辙也写过《苏颂免尚书左丞不许诏》等。苏轼称赞苏颂“温文而毅，直亮不回”，“历事四朝，允有一德”，“白首忠信之节，议论如故，志意不衰”。

苏颂用诗回答苏轼，写有《次韵苏子瞻题李公麟画马图》、《次韵子瞻锁院赐酒》等。后一首诗曰：

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入众引声长。

百官班里听恩旨，争颂雄文出未央。

这是对才华横溢的苏轼的最恰当的颂扬。

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卒。哲宗亲政，启用章惇为相，以“绍述熙丰”为名，贬斥元祐老臣，追夺司马光、吕公著赠谥，毁所立碑。苏轼先贬惠州，后谪儋州（海南岛）。当时苏颂已七十八岁高龄，以中太一宫使始居润州（今镇江），为父母守坟。章的党羽、御史周秩还是写了弹劾苏颂的奏书。哲宗在奏书上批示：“颂知君臣之义，无清议此老。”才幸免于难。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崩，徽宗继大统。由于大赦，苏轼有从海南岛北返的生机。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二十日，八十二岁高龄的苏颂病逝于润州。当时苏轼正在从海南岛北返的途中，五月到达南京，得知苏颂病逝。六月十二日从仪真渡长江到润州。由于一路劳苦，病不能起，十三日派幼子苏过吊苏颂之丧，又出钱请和尚诵经，为苏颂荐福。他亲写祭文《荐苏子容功德疏》：

伏以自昔先君以来，常讲宗盟之好。俯仰之间，四十余年。在熙宁初，陪公文德殿
下，已为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际，缀公迩英
阁前，又为五学士之首。虽凌厉高躅，不敢
言同；而出处大概，无甚相愧。散缘薄物，
以荐一哀。伏惟三宝证明。云云。

这是文学大师向他的宗叔永别的悼词，从先君老泉领轼、辙兄弟认宗盟之亲，已有四十余年。“三舍人之冠”肯定了苏颂政治上的高风亮节；

“五学士之首”赞扬了这位大儒的学术之功。“虽凌厉高躅，不敢言同”是说苏颂以凌厉的作风领导了水运仪的研制，仕途也高登宰相之位。这是苏轼不能同日而语的。“而出处大概，无甚相愧”，是说两人出仕处世，品格相同，无愧于世人。

当苏颂的子孙回谢苏轼时，他病情已十分严重。一个多月之后，苏轼也医治无效，病死于常州。宋代两颗巨星，在两个月内，相继陨落。

论文注释：

①李时珍《本草纲目·序》，人民出版社，1982校点本。

②、③管成学《苏颂与〈本草图经〉研究》，长春出版社1991年版，扉页李约瑟题词、首页庐嘉锡题联。

④、⑨-⑩、⑪、⑫、⑬苏颂《苏魏公文集》，中华书局1988年校点本，第130页、第51页、附《魏公谭训》、附《赠司空苏公墓志铭》、第49页、第49页、第128页、第129页、第191页。

⑤、⑥、⑦颜中其《新编苏氏大族谱》，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第39页、第24页。

⑧、⑩《欧阳修文集》，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本，《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举荐苏子容应制（科状）》、《举苏轼应制科状》。

⑪、⑬《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校点本，第10859页《苏颂传》、第129页《李定传》。

⑭、⑮《苏轼文集》，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本，《荐苏子容功德疏》、《苏子容母陈夫人挽词》。

（北京大学资源学院文物系副主任、教授）

（上接15页）

二是政论。主要阐述了苏轼的为官理念，概括了苏轼为官的七大理念，包括哲学理念、民本理念、改革理念、经济理念、教育理念、军事理念和廉政理念。三是事论。主要阐述了苏轼为官所做出的业绩，包括经济业绩、军事业绩、社会事业业绩、文学艺术创作业绩。

全书全面地展示了苏轼为官一生的政治思想

和政务活动，为我们各级党政领导提供了一份从政为官的参考资料。如果本书能够为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从苏轼为官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当中受到一点启发，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四川省眉山市政协主席）

（上接27页）

⑯陈师道《后山诗话》：“世语云：苏明允不能诗……。”

⑰、⑱语见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

⑲《题白帝庙》，见《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集》卷二“祠庙”类（以下不重出书名）。

⑳《游凌云寺》，同上卷二“寺观”类。“凌”，原误刊为“陵。”

㉑《九日和魏公》，同上卷一“九日”类。

㉒《和杨节推见赠》，同上卷一“酬答”类。

㉓《游嘉州龙岩》，同上卷一“纪行”类。

㉔《和杨节推见赠》，同上卷一“酬答”类。

㉕《襄阳怀古》，同上卷“怀古”类。

㉖《神女庙》，同上卷二“祠庙”类。

㉗《题仙都观》，同上卷二“寺观”类。

㉘《昆阳城》，同上卷二“城洞”类。

㉙自嘉州（今四川乐山）出发，江行至荆国度岁，再转陆行北上去开封。

㉚苏轼：《南行前集叙》。

㉛欧阳修：《赠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见《文忠公集》卷三十四。

㉜苏洵：《上韩丞相书》，见《嘉祐集》卷十二。

㉝见《四库提要辩证》卷二十二。

（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学术著作一部编审）

从苏轼上元诗词看其忧国爱民之情

苏士福

内容提要：本文从写作背景和诗词文本的角度，比较赏析苏味道、苏轼、辛弃疾的上元诗词的继承和革新，着重从苏轼的诗词文中解读他的忧国爱民之心。

关键词：上元诗词 苏味道 苏轼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古人称“元”，是指月亮正圆。一年之中有“三元”——正月十五称为“上元”，七月十五称为“中元”，十月十五称为“下元”，故元宵节亦称为“上元节”。

按照中国民间的传统，在这天皓月高悬的夜晚，人们要点起彩灯万盏，以示庆贺。出门赏月、燃灯放焰、喜猜灯谜、共吃元宵、合家团聚、同庆佳节、其乐融融。

元宵节燃灯、观灯的风俗起自汉朝。隋唐以后，上元之夜放灯的习俗流传甚广，赏灯活动更加兴盛，皇宫里、街道上处处挂灯，还要设立高大的灯轮、灯楼和灯树，进而演变成民间盛大的节日。张灯时间也从一夜增至三夜。到北宋时，放灯增至五夜，南宋增至六夜，明朝官府发布有上元节假日十天的规定，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灯节。正月十五夜观灯已成为民间充满热闹欢乐的节日风俗。

元宵观灯，既是家家户户制灯艺术的大展示，也是文人骚客的大聚会，文人观灯，不可无诗，所以，元宵节又是诗人创作高峰。苏味道、李峤、郭利贞、崔液、卢照邻、欧阳修、苏轼、辛弃疾、李清照、周邦彦、李持正、唐寅等诸多才子都有上元佳品问世。

历代学者认为，上元诗词佳作，首推初唐武则天时期宰相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实际上，

苏味道的后裔北宋翰林学士苏东坡的上元诗词与乃祖相比也毫无逊色。

武则天长安年间，京城举办灯会，金吾弛禁，人皆夜游，文士赋诗，争相吟诵。是时官宦文士赋诗者数百人，各有佳句。苏味道（648—705）乘兴而作的《正月十五夜》，径相传诵。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苏味道这首诗对元宵夜观灯夜游的热闹场面，描写得淋漓尽致。

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晚的京都，地上满城的花灯与空中燃放的焰火交相辉映，红透云天；围城河的桥上，点缀着无数明灯。万灯闪烁，犹如天上的繁星。城门解禁，游人像潮水一般地涌来，看灯者人山人海。豪门贵族的车马喧阗，马蹄下飞扬起阵阵尘土。在灯影月光的映照下，艳如桃李的舞女载歌载舞，她们一面走，一面唱着《梅花落》，市民们的欢声笑语，汇成一片。京城的元宵灯会，通宵都在热闹的气氛中度过，热闹非凡，令人观赏不尽。

诗家公推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为天下元宵诗之首。元代文学家方回评曰：古今元宵诗“五言好者殆无出此篇矣”，古今作者难出其右。诗中火树银花合、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等，措语之妙，言尽而意不尽，读之使人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感。后人多有借仿，流传至今。

苏味道的后裔第十二世孙苏轼（1036—1101）的上元节诗词，较之苏味道，别具一格，充满了忧国爱民的强烈情感，也是上元诗名篇。

从苏轼描写春节和上元的诗词考索，其中不仅可以管窥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的春节风俗，而且可以从此一点来鸟瞰苏轼一生的人生历程，探究苏轼忧国爱民的心路历程。

苏轼最早描写春节生活的诗作，是写于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冬末任凤翔签判时期的《馈岁》、《别岁》、《守岁》三首风俗诗。苏轼在这首组诗《馈岁》结处曰：“官居故人少，里巷佳节过。亦欲举乡风，独唱无人和”，书写了初入仕途的苏轼在残冬已尽，新春将至之时，身在异地他乡的寂寞。但他的心情并不平静，苏轼在《别岁》中言道：

“问岁安所之？远在天一涯。已逐东流水，赴海归无时”，一年的时间既已远走了，就不会再回来。“勿嗟旧岁别，行与新岁辞”，不要悲哀嗟叹旧岁的流逝，更重要的是要珍惜新的时光。“人行犹可复，岁行那可追”，人之远行尚可归来，而岁月的流逝却不能追回了。他在《守岁》中感慨地说：“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想到春节将过，重要的是不要将自己的心事、理想、愿望随意蹉跎，趁着现在自己还年轻气壮，努力从今夕开始，就会大有作为。词中不难看出苏轼萌发出的积极人生态度。

苏东坡步入仕途后，写过不少上元诗词，笔下越出了苏味道的元宵夜单纯写景诗，词中内含了强烈的思想情感，表露了苏轼忧国爱民的情怀。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苏轼刚由杭州通判来密州任太守，正好遇到元宵佳节，他到街上观灯、看月，此时的情景使他感慨万千，写下了《蝶恋花·密州上元》，描绘了杭州上元和密州上元的不同景色，流露了苏轼对杭州的思念和初来密州的心情。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词分上、下两阙。上阙描写杭州上元，写灯、写月、写人，声色交错，显示了杭州元宵节的热闹；东坡用一句“灯火钱塘三五夜”，点出灯夕的盛况。这一天，夜月正圆，灯光交辉，满城男女游赏。街上游人如织，男子歌啸而行，女子艳装而出，月光“照见人如画”。但杭州庆赏元宵，没有像苏味道当时描绘唐代京城那样的规模宏大，而是“帐底吹笙香吐麝，

更无一点尘随马”，同样花团锦簇，碧玉清澈，秀丽清纯。词中既借用“游伎皆秾李”，又引喻“尘随马”，与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诗“暗尘随马去”自有异曲同工之妙。苏轼认为，富贵人家浓妆艳服，设帐吹笙，香气缭绕，别有一番乐趣——此般风味应无价。

不讲排场，不暴敛扰民，是苏轼的一贯主张。早在熙宁二年（1069）正月，神宗皇帝想多敛花灯热闹闹过好上元节，下令减价收买浙灯4000盏，于是苏轼上了《谏买浙灯状》，指出卖灯之民并非都是富户，他们卖灯，只是为“衣食计”。减价买灯，是“陛下以耳目之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陛下为民父母，惟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说来也巧，两年后，朝廷将苏轼从京师外调到浙江杭州任通判。杭州上元闹灯，苏轼坚持己见，不能只为玩乐观灯而大肆向市民摊派，其规模量力而行，适可而止。

“更无一点尘随马”，一说是因为江南杭州气候清润，“更无一点尘”，衬托出月夜银辉皎洁；更主要的是官宦之家“帐底吹笙香吐麝”，骑马出游的人不多，花灯规模和街上游人之众不能与武则天时的京都攀比。

下阙描写密州上元。正月十五月正圆，灯月交辉，引来满城士女，争相游赏。闻听吹箫击鼓，却见是农家正在举行社祭，祈求丰年。直到夜深，“火冷灯稀”，苏轼才离去。

苏轼见过了杭州上元的热闹，再来看密州上元节，自觉凄清。更何况他这一次由杭州调知密州，环境和条件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心情完全不同。首先，密州不比杭州，百姓贫穷，劳苦又粗陋，变法的实施，并没有让农民得到多少实惠。密州这里连年蝗旱，百姓挖野菜充饥，民不聊生，使他感到郁郁不乐。作为一个爱民之官，刚上任就忙着治蝗，马不停蹄地走县下乡，同时上书朝廷，请求减免密州赋税。再加之密州这里盗贼满野，狱讼充斥，斋厨索然，饿殍陈路，苏轼还要昼夜部署捕盗打黑，收养弃婴，使这位刚到任不到四十岁的太守心急如焚，忧思满腹，不禁发出“人老也”之叹。

苏轼在这年上元之夜，闲行街上，听到箫鼓之声，走去一看，却见村民正在举行社祭，祈求丰年。对于祈年，苏轼并不陌生，认为这

是很灵验的事。早在苏轼任凤翔签判时，他就在骊山祈天求雨，结果雨降三天，旱象解除。为表官民久旱逢雨后的喜悦心情，苏轼将所修的一座游亭命名为喜雨亭，又写下了《喜雨亭记》以作纪念。苏轼今日看见密州百姓祈年之情景，感触灵魂，使他久久不愿离去。直到深夜，“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郊外彤云四垂，阴霾欲雪。这时，苏轼多么渴望快些下场大雪呢！——元宵观灯无所谓，但愿“瑞雪兆丰年”。上元节后，苏轼就到密州城南二十里的常山祈雨，并作《雩泉集》，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苏轼处处关注民生，心系百姓的爱民思想。

从这里可以想象，在当时的环境下，苏轼笔下的密州上元节怎会出现像杭州那样的热闹情景，更不会出现像初唐那样的“火树银花合”盛况。

苏轼这首《蝶恋花·密州上元》词，的确是“有境界”之作，笔绘两地之境，意合两地经历之情感，景情相对而内含统一，立意高妙而寓意致远，写出了对“凡耳目之所接者”的真实感受，抒发了对国计民生的忧患之情。内容、笔墨不囿于成规，自抒胸臆，意之所到，笔亦随之，不求工而自工。此词运用了转折、反衬等章法技巧，“寂寞山城人老也”，使情调陡然一转，犹如从天上掉到了地下，体现出了他当时的境遇和心情，感情急剧低落，顿觉清涼萧条，寂寞冷清。——此句非东坡未能为文也。

更为沉痛的是，苏轼自爱妻王弗死别的十年中，围绕王安石变法，革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愈演愈烈，苏轼被卷进了这场漩涡之中，身不由己，宦海沉浮，不断地放外任，贬谪，流徙，历尽苍桑，备尝艰辛，已是“尘满面，鬓如霜”了。

联想到苏轼熙宁乙卯（1075）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亡妻《江城子》悼亡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此情此景，民穷家难，怎能提起苏轼上元节游玩的乐趣，又往哪里“话凄凉”呢？

虽然如此，苏轼仍然是条铮铮硬汉，满怀爱国激情，他希望能够尽快奉诏回京，朝廷委以重

任，报效国家。就在这年（1075）冬天，苏轼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表述了自己的愿望。

老夫聊发少年狂……酒酣胸胆尚开张。
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据《汉书·冯唐传》记载：云中太守魏尚治军有方，“使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一旦入侵，必所杀甚众。后因报功时多报了六颗首级，被文帝“下之吏，削其爵”。冯唐竭力为魏尚辩白，认为文帝“赏太轻，罚太重”，颇失人心。文帝幡然醒悟，当日便令冯唐持节赦免魏尚，官复原职，并拜冯唐为车骑都尉。

北宋仁宗、神宗时代，国力不振，国势羸弱，时常受到辽国和西夏的侵扰。苏轼由出猎联想到国事，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处境，不禁以西汉魏尚自喻，希望朝能够派遣像冯唐一样的使臣，为我请命，持符节前来召自己回朝，让我像魏尚一样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建业立功。

“老夫聊发少年狂”，这时苏轼谈笑间萌发了年轻时的狂妄，突发奇想。他并不在意自己的衰老，而更在意的是希望朝能够重用他，给他机会去发挥自己的才能，建立功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苏轼那时虽然在政治上处境不甚得意，满怀一肚子的委屈，如果朝廷一旦召用，他仍会把雕弓拉得满满的，全力报效国家。

苏轼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历来勤政爱民，每至一处，都颇有政绩，为百姓所拥戴。密州时期，他的生活依旧是寂寞和失意的。郁积既久，喷发愈烈，触景生情，遇事而作。《蝶恋花·密州上元》、《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均充满了关怀国家命运的爱国精神，体现了作者苏轼忧国爱民的爱国主义思想。

历史总是那样无情，常向那些弄潮儿开玩笑。历代皇帝不管什么节日，总要用很多物力人力铺张一番，供他游玩。还要大臣赋诗以纪，粉饰太平。那些官宦文士，多以词藻华丽的乐章歌颂天下升平以取悦皇上。而苏轼的上元诗词则不同一般，词内总是挂念着平民百姓。

《上元侍饮楼上三首呈同列（一作正月十四日夜）》诗：

澹月疏星绕建章，仙风吹下御炉香。

侍臣鹄立通明观，一朵红云捧玉皇。
薄雪初消野未耕，卖薪买酒看升平。
吾君勤俭倡优拙，自是丰年有笑声。
老病行穿万马群，九衢人散月纷纷。
归来一点残灯在，犹有传柑遗细君。

第一层写淡淡的月光，稀疏的星星围绕在建章宫，皇宫的气象犹如仙境一般，香烟缭绕。文武百官毕恭毕敬地站在通明殿前，等候皇帝驾到，这场景，就象一朵朵红云捧着玉皇大帝一般。

第二层即笔锋一转，联想到了百姓。降雪刚刚融化而田地尚未耕耘，百姓卖掉柴薪换来酒肴祈求升平，但愿吾皇倡导勤俭鼓励农耕，农家获得丰年自有笑声。

第三层略论得失。我从皇宫出来穿过观灯的人群，看到大街小巷游人逐渐散去，但花灯仍然闪如繁星。深夜归家时家中点燃的蜡烛已快燃尽，我所得到的只有侍饮楼上遗给近臣的黄柑。

从诗文内容看，此诗不像是一篇取宠的应制诗，倒像一个进谏奏章。按照常规，众多大臣侍宴多是毕恭毕敬，“侍臣鹄立通明观”，觐朝山呼“万岁”，“一朵红云捧玉皇”。而苏轼上元侍宴却笔锋一转，“吾君勤俭倡优拙”，为民请命，“自是丰年有笑声”。真乃心系百姓，与百姓休戚相关，不计个人得失，敢于犯颜直谏，实乃耿情之东坡也！这是诸多上元诗中所少见的。

苏轼因与王安石变法意见不合，出为杭州通判，迁密州太守，调任徐州太守，移任湖州太守。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蒙受“乌台诗案”冤案，责授黄州，贬谪儋州，精神上受到极大摧残，生活极度艰难。宋哲宗元符己卯二年(1099)上元节，苏轼在《书上元夜游》中又记述了另一番景象。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词意是说，宋哲宗元符二年己卯（1099）上元节，我在儋州，有几个老书生过来对我说：“如此美好的月夜，先生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出去呢？”我很高兴地跟从他们，步行到了城西，进入了僧舍，走过了小巷，当地的百姓聚集在一起，纷纷买肉喝酒，日子虽然艰苦，但生活颇有乐趣。回到家中已经三更了。

从苏轼出游到回家已经三更的情节中，呈现了儋州上元之夜的清雅景象与祥和淳朴的民风，抒发了苏轼与民同庆，悠然自得的心境。回到家后，苏轼为自己看破得失，“放杖而笑”，同时也笑韩愈不能看破得失，不能作到随遇而安。“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说出了因缘自势，随遇而安的生活哲理。苏轼在这孤村僻壤虽然不能像在繁华的大城市一样享受元宵节的欢乐，但与黎民同喝酒、共赏月，也是很快乐的事了。——远离了官场的龌龊，过一个与民同乐的清闲生活，有一失也有一得也。

苏轼的忧国爱民思想，自始至终体现在他的上元诗词文中。无独有偶，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1140-1207)的《青玉案·元夕》亦是如此。他既发挥了苏味道《正月十五夜》的艺术风格，又继承了苏轼的忧国爱民思想，达到了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完美结合。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
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
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上阙，专门写景。元宵佳节，灯火辉煌，犹如春风吹过千树花开，漫天飘飞的焰火似流星一般洒落，又像清亮的雨滴在夜空中闪耀。一个个新颖生动的比喻使元宵夜一派壮观美丽的景象跃然纸上。“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化用苏味道“火树银花合”句。“宝马雕车香满路”，化用苏味道“暗尘随马去”句。“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化用苏味道“游伎皆秾李”句。“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化用苏味道“金吾不禁夜”句。

下阙，专门写人，也是作者的主题用意所在。作者写的这些丽者，皆非意中关切之人，在百千人群中只寻找一个——却总是踪影难觅，“众里

“寻他千百度”，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忽然，眼睛一亮，在那一角残灯旁边，分明看见了，是她，正是她！她正在灯火稀疏处悄然而立，还未归去，似有所待！

这究竟是怎样一位女子呢？她幽居自处，喧嚣之下静待，众人堆里独处，不入流俗，是作者之所思、所求。而这个孤高离尘的美人形象，正是作者的情趣所在和自我影像，实际上表现了辛弃疾抗金主张均未被采纳后“自怜幽独”的情怀，他的兴趣并不在欣赏热闹的灯景世界，而是不入凡俗——忧国独思，壮志难酬。“蓦然回首”，这恰恰是整首词的不凡之处，也使这句词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实为苏味道之后上元诗词中的又一名篇，可与苏轼的《蝶恋花·密州上元》相媲美，与苏轼并称“苏辛”。

诗家评论，灯有种种，人有不同，都是观灯人，心境各有异。这也是苏味道应制之作《正月十五夜》与苏轼境界之作《蝶恋花·密州上元》词艺的区别。

苏味道在武则天朝春风得意，武则天性喜祥瑞，“赋诗取宠”就成了当时官宦文士追逐的一股风尚。当时的宫廷诗人，誉称“文章四友”、“沈宋比肩”的苏味道、李峤、崔融、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间都有元宵诗佳作，他们追求词藻华美，对仗工整，音韵和谐，尽以华藻的词章粉饰太平，以迎合上心，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就是典型的一例。但这些人的题材和内容都比较狭窄。而苏轼则处在北宋积弱积贫的社会变革的时代，苏轼与王安石等人变法的政见不合，被摈斥在外，毕生不得志，空怀爱国惜民之心，上元节心情郁闷，借以诗词抒情。

历代元宵诗词，描写元宵夜都市繁华者居多，北宋钱塘人周邦彦（1056-1121）《解语花·上元》：“因念都城放夜，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 “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化用了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诗句，着重从大处着笔，“满路飘香麝”与“游伎皆秾李”突出了都市特点，“自有暗尘随马”与“暗尘随马去”分别描写了北宋汴京和唐初长安元宵夜的欢腾场面。两宋之交李持正的乐府《明月逐人来》

亦用“禁街行乐，暗尘香拂面”描绘汴京元宵夜的观灯情景。而苏轼的《蝶恋花·密州上元》没有用过多的词句把元宵之夜写的像苏味道等人描绘的那样侈靡喧哗，甚至用“更无一点尘随马”描写北宋杭州与唐代京城长安之不同，耐人品思。

要评价苏词的艺术风格，就应该了解苏轼的境遇与情怀。从写作艺术上讲，苏轼不是不能写出像苏味道那样的元宵诗句，而是两人的处境不同，心情各异，选题的角度和措辞技巧就有区别，表现出来的诗词也就各有特色。

苏轼出任密州太守的第二年，即宋神宗熙宁丙辰九年（1076）写的《水调歌头·中秋》，就在艺术高度和思想蕴涵上都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上阙“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可以说是脍炙人口，乃为千古绝唱之作。而在下阙“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抒发了苏轼难以排遣的惆怅与困惑，幽愤与失意，间杂幻想与希冀的情怀，这是苏轼强烈的入世思想与客观环境不能契合的矛盾反映。对于苏轼来说，欢度上元的心情，比起壮志难酬、内忧外患的国势来说，毕竟是后者占据了偌大心间。因而，苏轼上元之作，较之苏味道元宵诗作，各有特色，也就不难理解了。

苏轼的上元诗词，多含忧国爱民之心，用词简朴，内容充实，含义深刻，思想性很强，耐人寻味。从苏轼的上元诗词中，也可以印证林语堂先生曾经评论过的，“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怜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

他不仅“是散文家，是诗人，是词人”，而且是一位难得的天才，是一位忧国爱民的优秀诗词名家。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河北省栾城县苏氏联谊会会长、栾城县苏轼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东坡调谑亦雅诮

许植基

内容提要：以《调谑编》的故事为例，分析苏东坡疾恶如仇，以言刺之；仁民爱物，旷达潇洒，甚至自我解嘲，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

关键词：处世态度 调谑编 雅诮

苏东坡，一个伟大的名字，他代表着伟大的中国文化，中国文人的文品和人品。他的著作浩如瀚海，其丰厚深不可测。其诗、其词、其文、其杂著都是灿烂的中国文化结晶。即使一些不入流的异类别录，如调谑也是别有格调。

《三苏全书》中《调谑编》收录了苏东坡29则调谑故事，为苏东坡与士贤交游之轶事笑话。展现了苏东坡的智慧、才情、人品和秉性，我们看到了“苏东坡比中国其他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林语堂）。

古学者在论述苏东坡调谑故事说“用诸酒杯流行之际，可为善谑。其言虽不雅驯，然所诃诮，多中俗病。闻者或足以为戒，不但（仅仅）为笑也”，其言甚是。

东坡和王安石虽政见不同，但却相互尊重。不过王安石治学，过于偏执，一如其外号“拗相公”，东坡很不以为然，常以言刺之。王安石常以个人之见解释字源，东坡谑之。有一例：

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篠，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问曰：“‘鳩’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乎？”坡云：“《诗》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似九个。”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

先是，东坡质疑荆公，如果“篠”是解释为用竹鞭打马，那么用竹打犬，有什么可笑呢。王

安石反问“鳩”从“九”从“鸟”有什么证据。东坡说，诗经上说布谷鸟在桑林中叫，七只小鸟加上爷和娘，正好九只鸟。王安石开始很高兴，以为东坡帮他解决了谜团，继而一想，东坡是故意曲解诗经，讽刺他。

还有一例：

东坡尝举“坡”字，问荆公何义？公曰：“‘坡’者，土之皮。”东坡曰：“然则‘滑’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

这一则故事东坡更不客气，他先问“坡”字释义，王安石牵强附会解释了。东坡接着用“滑”自问自答，用王安石的方法错解这个字，暗批王安石字源说之谬误。设了一个套让王安石丢面子，难怪王安石老大不高兴了。当时，王安石权倾天下，炙手可热，东坡敢捋王安石的虎须，调谑王在学术上不懂汉字结构的音旁义旁的规律。这是何等的胆识，不惧权贵，不计后果，维护了科学，维护了读书人的品质。

东坡对当朝的宰相的态度是站着而不是跪着，他决不惟惟诺诺，卑躬屈膝。有一则故事：

一日，东坡谒微仲（吕大防），微仲方昼寝，久不出，东坡不能堪。良久，见于便坐有一昌蒲盆，畜绿毛龟，东坡云：“此龟易得，若六眼龟，则难得。”微仲问六眼龟出何处？东坡曰：“昔唐庄宗同光中，林邑国曾进六眼龟。时伶人敬新磨在殿下，进口号曰：‘不要闹，不要闹，听取这龟儿口号！六只眼儿，分明睡一觉，抵别人三觉。’”

吕大防摆架子，午觉贪睡或装睡，不见老朋友。东坡火了，拿绿毛龟说事，说绿毛龟不及六眼龟，六眼龟有六只眼睛，普通龟只有二只眼，六眼龟睡一觉要抵别的龟睡三觉。这则调谑不管吕大防能否受得了，明显批评吕大防对老朋友摆

架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让吕很难堪。这就是苏东坡，卓然独行的苏东坡。

有一则东坡和司马光的故事。

东坡公元祐时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诸公卿，率有标目，殆遍也，独于司马温公不敢有所重轻。一日，相与共论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及归舍，方卸巾驰带，乃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

司马光是东坡的前辈，东坡一向尊重他。但政见的不同发生争吵，东坡当场没有发作，回家不禁连叫司马牛。司马牛是孔子学生，东坡可能借此说明司马光象牛一样固执牛气。东坡十分机智和敏捷，随手拈来，天衣无缝，幽默至极。当然，东坡对民生疾苦的关心，东坡的正直至此毕现。

东坡对一些附庸风雅的文人，毫不掩饰他的鄙视。

秦少章尝云郭云甫过杭州，出诗一轴示东坡，先自吟诵，声振左右，既罢，谓东坡曰：“祥正此诗几分？”坡曰：“十分。”祥正喜问之，坡曰：“七分来是读，三分来是诗，岂不正是十分。”

东坡对这个文人的讽喻，正是对一种不良文风的否定。

但东坡对真正有才学的文人，却是心折动容。

坡公在维扬，一日设客，十余人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自赞曰：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子瞻公笑曰：“吾从众。”

这一个米芾，狂放自负确也了得，竟在东坡面前卖弄起来。但东坡毫不计较，竟笑着肯定他。真是惺惺惜惺惺。东坡原本是真性情重才学的人。

当然，东坡对相知甚深的文人，无所恶意的戏谑，显示了文人之间的随意和相知。

陈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于黄州之岐亭，自称‘龙丘生’，又曰‘方山子’，好宾客，喜畜声妓。然其妻柳氏绝凶妒。故东坡有诗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狮吼”指柳氏也。

这是流传久远的一著名的戏谑，陈季常惧内的神情活灵活现。当然，诗中也表露了东坡对妒女柳氏的嘲弄和反感，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东坡信佛，但常常拿佛开玩笑，戏谑高僧，他和佛印的轶事为后人称道传颂。有一则他戏弄另一高僧的故事。

大通禅师者，操律高洁，人非斋沐，不敢登堂。东坡一日挟妙妓谒之，大通愠形于色。公乃作《南柯子》一首，令妙妓歌之，大通亦为之解颐。公曰：“今日参破老禅矣。”其词曰：“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捶，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悉（一作愁）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二五（又作三五）少年时。”

大通禅师是杭州的一代名僧和高僧，和东坡交厚，东坡居然带妙妓去闯佛堂，老和尚当然不高兴。但东坡是有恃而来，带来了一首新词，令妓演唱，老和尚竟然笑了。可见东坡逢场作戏功夫之深、之妙，看来出格又不伤大雅。林语堂斥其词为“小丑的独白”（这是林对东坡少有的批评），因为林是方正君子，对苏东坡嬉皮士式的放浪形骸缺乏感性和理性的认识。东坡的脱俗和游戏人间，固是他性格的体现，也是他对现实不满的曲折反映。

东坡对下层的歌妓，是同情的，保护的。有这样一则故事：

先生在黄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与人。至于营妓、供侍，扇书带画，亦时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颇知书札，坡亦每顾之喜，终未尝获公之赐。至公移汝郡，将祖行，洒酣，奉觞再拜，取领巾乞书。公顾视久之，令琪磨砚，墨浓，取笔大书：“东坡七岁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即掷笔袖手与客笑谈。坐客相谓语：“似凡易，又不终篇，何也？”至将撤具，琪复拜请，坡大笑曰：“几忘出场。”继书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一座击节尽欢而散。

看起来是东坡故弄玄虚，实际上是对李琪无限怜悯、同情、惋惜，对其遭际的愤慨，自己又无奈解助，这充分传递了东坡的人文观念。在戏谑的后面，是辛酸。

东坡和下属有一个故事。

鲁直戏东坡云：“昔王右军字为换鹅书，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师姚麟许换羊肉十数斤，可名‘二丈书’为‘换羊书’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圣节撰著

纷冗，宗儒日作数简以图报书，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坡公笑语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

这则调谑极风雅，那位韩姓的属官也太贪婪，利用东坡的字换羊肉上了瘾，几乎到强索的程度；东坡明知而心实喜之，得意之状可掬。但是，东坡的这种好日子并不太多。

东坡一生坎坷，虽生性达观，但不免怨望，当朝云生了小儿子时，东坡作《洗几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不是戏作，这是悲愤的呼声。

东坡是一个旷世天才，总遭人妒物议，但他直道而行，无所顾忌。他的亲人是如何看他的：

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扣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机械。”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朝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大笑。

不合时宜，是苏东坡最本质的特点，没有了“不合时宜”，苏东坡就不成为苏东坡。

因此，苏东坡的调谑，是苏海的一部分，是苏东坡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本文的目的至于此。

（江苏省常州市浦前镇）

（上接 79 页）

对中国及世界苏学研究的现状、前景进行评估，争取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对苏轼文化给予相应的重视。

（三）引进现代管理科学开展苏学研究

创立苏学发展学本质上是一个管理创新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系统工程学的运用，管理科学快速发展，未来学、科学学、文学学等研究也应运而生。苏学界应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扩大视野，跳出苏学看苏学，与时俱进，形成新的思维。

（四）争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新突破

我认为热点和难点问题，主要有 4 个方面：

一是对苏轼和苏学的定位问题。这个问题至今在中国各界未能形成统一的看法，即使在苏学界内部口径亦不一致。

二是如何实行苏学研究“三化”，即政治化、社会化、群众化问题。

三是如何让东坡精神进机关、进基层、进课堂、进千家万户的问题。

四是苏学研究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改革问题。其中党政机关、科研院校、民间组织的职责与关系也在待研究之列。

五是改进研究方法问题。应借鉴工程实验的一些观点与方法开展社会实践，下苦功夫，培养典型。用事实和数据说明效果，以扩大苏轼文化的影响。

三 关于创立苏学发展学的若干具体建议

（一）建议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将创立苏学发展学课题纳入学会的研究规划。同时，还建议参加中国第 16 届苏轼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能就此课题开展研究。

（二）建议中共眉山市委、市政协邀请苏轼任职和谪居地的市委、市政协领导同志，就市委、市政协如何领导和指导苏学研究问题开展座谈讨论。在眉山市委直接领导，市政协具体组织下所开展的眉山市范围内的“东坡精神”大讨论，取得了重大成果，具有重要意义，应加以推广。

（三）建议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及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将利国镇列入苏学研究“三化”及东坡精神“四进”的试点单位。该镇苏轼文化资源底蕴深厚，弘扬苏轼文化基础工作做得较好。

按照苏学发展学的观点编著的 30 万字的《苏轼与利国》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领导的好评，并对迅速打开利国苏轼文化建设的局面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利国中小学苏轼文化普及读物《苏东坡的故事》一书，近日即可印制出来，其效果将是不言而喻的。建议其它市也作相应的试点安排。

（四）建议中国第 17 届苏轼学术研讨会把交流苏学研究“三化”及东坡精神“四进”经验列入会议重要内容。以便各有关方面早作准备，将下届会议开的更好。

最后说明一点，因篇幅和时间所限，本文未作展开论述，拟撰写的关于提出创建苏学发展学的理由及关于提出创建苏学发展学课题的认识过程也未写入。

本课题仅仅是对苏轼研究的一点探索，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难免失当。仅作抛砖引玉，敬请专家学者指教。

（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庐山一游，卓绝千古

——《记游庐山》在“苏轼生平传记”中的选用评析

山流水

内容提要：重点分析了林语堂、曾枣庄和李一冰写作苏东坡传记时对苏轼《记游庐山》的创造性选用，比较其优劣长短。

关键词：记游庐山 传记版本 选用评析

说到庐山，我们就会想到歌咏庐山的千古绝唱：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和苏轼的《题西林壁》。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离开黄州至筠州，途中游历了庐山，并写下了《记游庐山》。此随笔全文共340字，叙述了苏轼自己写数首咏庐山之诗，还评论了徐凝、李白庐山瀑布诗的优劣。苏轼《记游庐山》①全文如下：

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谬，又复作两绝云：“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忆清赏，初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是庐山。”是日有以陈令举《庐山记》见寄者，且行且读，见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诗，不觉失笑。旋入开先寺，主僧求诗，因作一绝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唯有谪仙辞。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往来山南北十馀日，以为胜绝不可胜谈，择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峡桥，故作此二诗，最后与总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绝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仆

庐山诗尽于此矣。

在我所拥有的多种有关“苏轼生平传记”的图书中，有7种选用了苏轼《记游庐山》作为素材。通过这篇随笔，我们可以穿越时空，洞见苏轼的人生旅迹，窥见传记作者的创造才能和写作技巧。

一、诸版本选用概览

序号	作者	书名	出版时间	对苏轼《记游庐山》的选用	字数
1	林语堂	苏东坡传	1936	改写为概括叙述	84
2	曾枣庄	苏轼评传	1981	改写为概括叙述，补两诗鉴赏“李白辩解”评析	889
3	李一冰	苏东坡新传	1983	改写为具体描写，补“传说可遵故事”	4400
4	宁业高 宁耘	苏东坡演义	1995	改写为具体描写，补“传说可遵故事”	1153
5	刘小川	苏轼：叙述一种	2001	改写为概括叙述	214
6	由兴波	苏轼	2002	改写为具体描写，补“传说可遵故事”	1600
7	王晋川	苏东坡故事精选	2004	改写为具体描写，补“传说可遵故事”	1100

资料一：

苏东坡和参寥一同游庐山数日。在数百和尚中曾引起极大的轰动，因为消息已在他们中间传

开，大家都说“苏东坡来了！”虽然苏东坡只写了三首游庐山诗，其中一首成了描写庐山最好的诗。

②

资料二：

苏轼来到九江，游历了庐山。庐山山谷奇秀，风景优美，目不暇接，不可胜记。苏轼在这里写下了《初入庐山》、《题西林壁》（《东坡集》卷十三）等诗篇。他在《初入庐山》诗中写道：

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

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

意思是说如果同庐山素无往来，庐山就会非常高傲（“偃蹇”）不和你亲近；要认识庐山的本来面目，就必须过去就是庐山的老朋友。这首诗强调了不和庐山接触，就不可能认识庐山。《题西林壁》写道：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从表面看，这首诗的观点似乎与前一首的观点刚刚相反，身在庐山反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其实，后一首的意思是说，事物是复杂的，具有多方面的性质。看庐山，横看和侧看，远看和近看，高处看和低处看，往往有不同景色。身在庐山，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不到庐山的全貌；或常在庐山，反而熟视无睹，感觉不到庐山之幽美，正如久居芳室而不闻其香一样。这两首诗是从不同角度讲的认识论，都以理趣见胜，从人们司空见惯的事物中揭示了一个颇富哲理的问题。

李白曾隐居庐山，写有《浔阳紫极宫感秋》诗。诗中有“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复”之句。苏轼这次来到九江，恰好也是四十九岁，他也发出了“世道如弈棋，变化不可复”（《东坡集》卷十三《和李太白》）的感叹。他在《李太白碑阴记》（《东坡集》卷三十三）中为李白参加李璘幕府辩解说：“太白之从永王李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寢陋，虽庸人知其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必不然也。”他还说：“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倖以取容，其肯从君子昏乎？”说李白参加李璘幕府是出于“迫胁”，倒也未必，正如郭沫若同志所说：“李白当时是兴高采烈的。”（《李白与杜甫》第63页）他参加李璘幕府是为了参予平定安史之乱，所谓“永王李璘之乱”是肃宗横加

给李璘的罪名，李白也是无辜的受害者。但苏轼说李白“不肯附权倖以取容”却是对的，而且是在借李白以言己志，因为他也是“不肯附权倖以取容”的人。

六月，苏轼与其长子苏迈游览了鄱阳湖口的石钟山，写下了著名的《石钟山记》。③

资料三：

继与刘格同游简寂观，后至归宗寺，黄龙山北麓的温泉院。

苏轼在温泉院随便翻阅游客留题的诗文，看到可遵和尚的题壁诗：

禅庭谁作石龙头，龙口汤泉沸不休。

直待众生总无垢，我方清冷混常流。

苏轼本有好辩的嗜癖，欢喜做翻案文章，一时兴起，即题一绝于后道：

石龙有口口无根，自在流泉谁吐吞？

若信众生本无垢，此泉何处觅寒温。

其时这可遵和尚住在圆通寺里，听说大名鼎鼎的苏轼续了他的题诗，大大得意起来，立刻追踪前往，要求一见；途中听人传说苏轼作了《三峡桥》诗，所以，待他追到苏轼面前，就急急慌慌说道：“和尚也有一首绝句，要题在尊作三峡诗后，身上没带纸笔，只好读给你听——”接着边高声朗吟起来：

君能识我汤泉句，我却爱君三峡诗。

道得可咽不可漱，几多诗将竖降旗。

苏轼看了这和尚，那副硬攀知己的面目，丑俗不堪，自悔落笔轻率，误惹劣僧，便叠口催促轿夫快走，不加理睬，旁观者方大称快，不料可遵和尚却大言遮羞道：“子瞻护短，见我诗好甚，嫉妒而去。”

可遵立刻回到栖贤寺去，要把他那首续三峡诗题上寺壁，不料栖贤寺僧正在忙着磐磨碑石，准备镌刻苏诗，见他那种好名若狂的样子，骂他一顿，撵出寺门，山中传为笑谈。④

二、诸版本选用评析

林语堂《苏东坡传》，选用苏轼《记游庐山》时，改写为概括叙述，以略写为特色。与苏轼相关的地方多达18个城市。庐山一游，在苏轼的人生旅程中只是飞鸿驻足，只因《题西林壁》的脍

炙人口、家喻户晓，林氏提上一笔，仅用 84 字，可谓简明扼要。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果交代清楚，人物语言渲染出当时庐山的轰动场景。刘小川《苏轼：叙述一种》也采用概括叙述。

曾枣庄《苏轼评传》，选用苏轼《记游庐山》时，改写为概括叙述，补充两诗鉴赏和“李白辩解”评析，以评论为特色。着重鉴赏了苏轼的《初入庐山》和《题西林壁》，这两首诗都以理趣见胜，有诗歌的形象而无说理的抽象，令人耳目一新。另外，还对苏轼《李太白碑阴记》中为李白参加李璘幕府的辩解作了评析。

李一冰《苏东坡大传》，选用苏轼《记游庐山》时，改写为叙述描写，以详写为特色。参用其他资料补充了苏轼一行的游踪和见闻，游踪变化如下：山南入山——开先寺（漱玉亭）——栖贤寺（三峡桥）——圆通禅院——简寂观、归宗寺、温泉院——白石庵——白鹤观——东林寺——西林寺——岭北云峰下山。在选用苏轼《记游庐山》时，运用联想、想像，补充了庐山变幻莫测的美景描写，如“这一路栖贤涧水，汤汤流到寺东数百步处，忽遇巨石，与水相激，惊波喷空，鸣声震天，飞泻而下，是名‘玉渊’。涧水南下二里许，宋祥符间建三峡桥于此。桥身横跨绝壑，高出两崖之上，桥下则百尺深渊，急流澎湃，令人目眩。”补充了人物语言、行动、心理等描写，如“最后由东林长老陪往西林寺。苏轼一路观察山景，峰峦重叠，不但距离远近，形势向背，各有不同的容色，而高低起伏，姿态互异，更是变化无穷。苏轼这几日来，看山所得，不仅是美感上的享受，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一重解悟，得到了一重隽妙的见知。”其描写详细到读者怀疑其真实性，因为与苏轼《记游庐山》的反差太大。其后，宁业高、宁耘《苏东坡演义》，由兴波《苏轼》，王晋川《苏东坡故事精选》，均沿用但没有那么琐细。

另外，根据苏东坡的《书遵师诗》（《东坡题跋》⑤）和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描写了可遵和尚硬攀知己、狂妄自大之事，与陆游所写的故事情节相同。此故事被其后的苏轼“生平传记”诸版本沿用，且变化不大。如宁业高、宁耘《苏东坡演义》中将“可遵”改为“可山”，将“禅庭谁作石龙头”改为“禅庭谁立石龙头”，将“直待众生总无垢”改为“直待众生尘垢尽”，将“石龙有口无根”改为“石龙有口却无根”，叙述语言不同。由兴波的《苏轼》和王晋川的《苏东坡故事精选》均与李氏版本类似，故事情节雷同，叙述语言稍有不同。

论文注释：

①苏轼《东坡志林》中《记游庐山》，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4 页。

②林语堂《苏东坡传》，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9 页。

③曾枣庄《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55—157 页。

④李一冰著《苏东坡大传》，九州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0 页。

⑤苏轼《东坡题跋》，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64—165 页。

（四川省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上接 49 页）

②、⑤、⑧、⑨、⑩、⑪、⑫、⑬、《苏轼诗集》，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019 页《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二首》之一、第 162 页《和子由蚕市》、第 938 页《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之四和五首、第 1027 页《戏作种松》、第 1902 页诗题中语、第 1966 页《书晁说之<考牧图>后》、第 938 页。

③、⑭、⑮、⑯、⑰《苏辙集》，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130 页《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第 921 页《葺东斋》、第 25 页《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东胡》、第 166 页《次韵张耒见寄》。

⑯苏洵《途次长安上都曹傅谏议》。

⑰苏洵《上田枢密书》。

⑲《龙川略志》卷一《梦中见老子》条。

⑳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40 页。

㉑、㉒、㉓、㉔ 1992 年出版的《眉山县志》第 78 页。

（四川乐山市文化艺术研究所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也探三苏故居

赖正和

内容提要：本文把三苏父子叙及故居或故居所在环境的文字搜集来分为甲、乙两组，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三苏在眉山的故居有两处。庆历六年苏轼11岁前，三苏居住在今眉山县西之三苏场，其地当有三苏故居，但已荡然无存。庆历六年苏轼11岁时，三苏由今之三苏场迁至眉山城内纱縠行居住。元代将苏家故宅改建为苏祠祭祀三苏，即今三苏祠。

关键词：三苏故居 三苏场 三苏祠

2008年第4期《苏轼研究》所载的黄冈市东坡赤壁管理处王琳祥先生的《“三苏”故居初探》，提出了一个在苏学研究中众说不一的问题，并发表了他的探考结论，很值得重视。作为三苏故里人，我觉得更有责任探究三苏故居，所以写了这篇文字。

为了便于探究，我把三苏父子叙及故居或故居所在环境的文字搜拢来分列为两组：

甲组：

一、“先夫人僦居于眉之纱縠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于地。视之，深数尺，有一瓮，覆以乌木板。夫人命以土塞之。瓮中有物，如人咳声，几一年乃已。人以为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侄之间闻之，欲发焉。会吾迁居，之间遂僦此宅。掘丈余，不见瓮所在。”①

二、“忆我故居室，浮光动南轩。”②

三、“念昔各年少，松筠闕南轩。”③

四、“假寐，梦归縠行宅，遍历蔬圃中。已而坐于南轩……予取笔作一篇文，有数句云：‘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既觉，惘然怀思久之。南轩，先君名之曰‘来风’者也。”④

五、“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忆昔与子皆童丱，年年废书走市观。”⑤

乙组：

一、“昔年倦奔走，闭户事农耕。”⑥

二、“洵有山田一顷，非凶岁，可以无饥。”⑦

三、“归耕何时决，田舍我已卜。”“卜田向何许，石佛山南路。下有尔家川，千畦种秔稌。山泉宅龙蜃，平地走膏乳。异时亩一金，近欲为逃户。逝将解簪绂，卖剑买牛具。故山岂不怀，废宅生蒿蕘。”⑧

四、“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⑨

五、“予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皆中梁柱矣。”⑩

六、“至春初，敲取其实，以大铁锤入荒茅地中数寸，置数粒其中，得春雨自生。……然始生至脆弱，多畏日与牛羊，故须荒茅地，以茅阴障日。”⑪

七、“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川平牛背稳，如驾百斛舟。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前有百尾羊，听我鞭声如鼓鼙。我鞭不妄发，视其后者而鞭之。泽中草木长，草长病牛羊。寻山跨坑谷，腾趠筋骨强。”⑫

八、“我生溪山间，弱冠衡茅住。生来乏华屋，所至辄成趣。”⑬

九、“余幼居乡间，从子瞻读书天庆观。”⑭

十、“异乡虽云乐，不如反故岑。瘦田可凿耕，桑柘可织紝。东有轩辕泉，隐隐如牛湧。西有管辂宅，尚存青石砧。彭女留膝踝，礼拜意已钦。慈母抱众子，乱石寒萧森。朝往暮可还，此岂不足临。”⑮

甲组第一项文字明确说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僦”眉山县城内西南隅纱縠行一座宅子，让家人居住。第二、三项文字是苏轼和苏辙忆起少时读书的纱縠行宅中南轩。第四项文字是苏轼说他梦见回到纱縠行宅中坐于南轩。清人王文浩《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云，三苏僦居纱縠行的次年，苏洵“改南轩为来风轩”，表明南轩在纱縠行。第五项文字说苏轼、苏辙两弟兄每年都要放下书本(大约相当于课间休息吧)走到蚕市上去观看。蚕与丝帛相关，蚕市很可能就在纱縠行或其附近(绝不可能在远离城镇的偏远山乡)，也可反证他们此时的住宅就在纱縠行。

1992年出版的《眉山县志》说：“元代将苏家故宅改建为苏祠祭祀三苏。”这当是纱縠行三苏祠之始。明代万历末年担任四川右参政的曹学佺在《蜀中名胜记·眉州》中说：“有三苏祠，在纱线街，即苏氏故宅也。”这说明明人也确认三苏祠是三苏故宅，同时也表明纱縠行那个地方到明万历时已改叫纱线街了。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镌刻着“古纱縠行”的高约三丈的牌坊都还屹立于纱縠行口。

这一切，均无可辩驳地表明位于纱縠行的三苏祠是三苏故居。当然，历时几近千年，眉山县城又数遭兵燹，房舍数次被毁，宋代建筑不可能保存下来。然而，纱縠行三苏故居之址是永远存在的。

关于程夫人“僦居于眉之纱縠行”的时间，王文浩是这样推定的：“公幼居纱縠行宅，初不知始于何时，及考此文(指《记先夫人不发宿藏》)，有先夫人僦居之语，乃知在宫师游学四方之后也。明年，宫师归，始改南轩为来风轩。今据此定作庆历年事。”这就是说，程夫人僦居眉山城内纱縠行是在庆历年(1046)。这年苏轼11岁、苏辙8岁，而苏洵则与史经臣前往京师同举制策。

那么，庆历年以前，三苏居于何处？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研究研究乙组文字了。

乙组第一、二两项文字表明苏洵早年家在农村，自有山田一顷，算是耕读之家吧。“闭户事农耕”五字，表明他亲自从事农耕，至少参与经营吧。“山田”二字告诉我们，他在山区从事农耕，而不是平坝，更不会在城里。同理，此时他的家也在山区，而不是平坝，更不会在城里。

乙组第三项文字把苏洵没有细说的在山区农

村的那个家的环境具体描述出来了——这个家的位置在“石佛山南路”。山下面有尔家川，种着千畦粳稻。从山中流来的河水里住着螭龙，河谷两岸平坦的土地很是肥沃。他对弟弟苏辙说，归耕的事何时能决定下来？我已经选择好归耕的地方了，那就是我们非常怀念的“故山”和“废宅”。

乙组第七项文字是苏轼说他“知牛与羊”。他骑在平稳的牛背上读书，还用鞭子赶着前面的“百尾羊”。这里的“知”字不容忽视。他“知牛与羊”达到什么程度？他说泽中“草长病牛羊”，一般人难以理解——牛羊都食草，草长不是更好吗？怎么会“病牛羊”呢？有个故事回答了这个问题——有人见牧童驱羊于瘠地放牧，便问牧童：“那边泽地草美，怎不去那儿牧羊？”牧童答曰：“美草则见食，羊何自而肥？瘠地之草，羊细咀其味，乃得肥也。”苏轼少时即知其理。他还知道，要驱赶牛羊走山路、跨坑谷，使之“腾趠”，以强其筋骨。这些放牧牛羊的“秘诀”，只有农村孩子才可能知道。如果苏轼生在纱縠行、长在纱縠行，能如此地“知”牛羊吗？再说，纱縠行及其附近也绝无可让苏轼放牧“百尾羊”的牧地。

乙组第八项文字是苏辙肯定地说自己生在“溪山间”——有溪有山的地方，而且住在简陋的房子里。纱縠行在眉山城中，而在“溪山间”，所以苏辙不在纱縠行出生。苏洵的祖父“终其身田不满二顷，屋弊陋不葺也”(苏洵《族谱后录下篇》)。苏辙在《次韵子瞻颍州留别二首》中说，“茅屋半破蜀江边。”这说明那不加修葺的弊陋之屋，直到苏辙少时尚住，致其晚年还感慨说“生来乏华屋”。

乙组第九项文字是苏辙说自己幼时居住在乡间(而不是在城里)，跟随苏轼去天庆观读书。

乙组第十项文字是苏辙向苏轼表白“反故岑”的愿望。岑，山也。故岑，就是故山。苏轼说“故山岂不怀”，苏辙说“不如反故岑”，两弟兄想归耕家乡(具体说应是“山乡”)的情怀毫无二致。他们想归耕的家乡是什么样的呢？苏辙描述得很具体——有瘦田可凿耕，有山地可栽桑养蚕、抽丝织紝；东边有轩辕泉，西边有管辂宅；不远处有供礼拜的摩崖造像，可以朝往暮返。这样的环境，绝不可能在纱縠行及其附近。

那么，苏轼、苏辙想归耕的“故山”或“故岑”，苏轼栽松、牧放牛羊的地方，苏辙出生的溪

山间、幼居的乡间，无疑应当是同一处乡间。可究竟在何处呢？

《“三苏”故居初探》说：“石佛山，宋人李厚注曰：‘在眉州眉山县之南。’《元丰九域志》说：‘眉山县有石佛镇。’”又说：“苏家在眉山县之南的石佛山、尔家川一带有田一廛。”总之，它认为三苏曾由纱縠行迁至眉山县南之石佛镇居住，其故居之一在石佛镇。《苏轼诗集》在“石佛山南路”^⑩句下注：“（王注厚曰）：‘石佛山，在眉州眉山县之南。’（查注）《九域志》：‘眉山县有石佛镇’。”以上两处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从石佛镇之名而误断其镇有石佛山。

南宋著名画家夏圭所作之《长江万里图》在眉山县城之南画有石佛镇，并用文字标名。可见石佛镇在宋代就很重要。1992年出版的《眉山县志》说，石佛乡在“北宋为石佛镇，系兵防重地……后废。清雍正建石佛庵，光绪年间成集市，名石佛场。”这段记载表明石佛镇在北宋是一处“兵防重地”，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场镇。石佛镇之“镇”不是场镇之“镇”，而是一个军事机构。在古代，统治者于边塞设“镇”，派兵将驻守。到了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除人口众多的“镇”之外，都将镇使、镇将罢免，收权归知县，但“镇”这个军事机构依然存在。眉山县南之石佛镇就是这样的“镇”。它地处平坝，附近无山，更无所谓石佛山。论者、注者不能因为有石佛镇便认定有石佛山。石佛镇一带也无尔家川。

民国《眉山县志》卷一载：“石佛山，治西，山半有石佛像。东坡寄子由诗：‘卜宅在何许，石佛山南路’指此注：旧志记二十五里，今失其处。”因诗句还有“下有尔家川，千畦种秔稌”，“《眉山县志》卷一谓尔家川在石佛山下，今失所在。”^⑪民国《眉山县志》说石佛山在眉山县城之西，而不在城之南，这是对的，但说石佛山“今失其处”则不妥。因为，一座山是不可能轻易消失的。民国《眉山县志》又说“尔家川在石佛山下”，这是对的，但说尔家川“今失所在”也欠当。

眉山县原有48个场镇，其中有一名三苏场者。县志^⑫说：“三苏场原为苏洵父子故居处，元代建三苏祠，后称拨股祠，清代以此建场，起名三苏场。”此县志认定“三苏场原为苏洵父子故居处”，应当说是正确的。

要认定三苏场为三苏故居处，首要的是要看

其北面(因诗句有“石佛山南路”)有无石佛山。民国县志说石佛山“山半有石佛像”。据县志载^⑬，三苏场附近山半有石佛像的地方有两处，一处“位于县城40公里的三苏乡陈沟村七组境内，众多的摩崖造像组成三壁，最长的一壁长7米、高2米，刻佛像千尊”；另一处“位于三苏乡三苏村东南4公里的三峰山，原有古刹三峰寺。造像始凿于唐，分布在长7米、宽4米和长10米、宽3米的两块半圆石头上，共8龛、576尊”。这两处有石佛像的山是否是石佛山呢？我认为不是。因为三峰山位于三苏村(三苏场所在地)的东南边，而不在北边，位置不对。陈沟村的佛像在三峰山下，位置也不对。在我为找不到石佛山而发愁之时，眉山市政协教文卫委的廖副主任帮我解决了这道难题。他的外婆家就在三苏乡，那一带到处都有他的脚板印。他告诉我，当地老人说，距三苏场四五里的望苏村附近的山就叫石佛山，其位置正好在三苏场之北。前些年，国家把石佛山一些地方推平了，建设保密单位，当地群众不知单位名称，便随口把这个单位叫做“石佛厂”。因为三苏场北确有石佛山，也就可以认定“石佛山南路”说的就是三苏场。

苏轼诗中说石佛山“下有尔家川，千畦种秔稌”。那么，就还必须找到尔家川。经询问，当地人都不知尔家川其名，带“尔家”的地名也没听说过。我绞尽脑汁苦苦琢磨，最后似乎解开了这个疙瘩，我把我的想法写在下边，以抛砖引玉。

我先以为尔家川是一条河的名称(不少研究者都这样认为，一些书也这样写)，但当地人没听说过哪条河叫尔家川，甚至连尔家这个词也没听说过。我反复读苏轼诗句，才悟到尔家川的“川”跟“川平牛背稳”的“川”应当同义，而且苏轼就是在尔家川上骑牛的。川字多义，有平地之义，如说平川，就是平地，成语有一马平川。苏轼在平地上骑牛，自然“牛背稳”啰！到三苏乡实地考察，可以看见在石佛山与三苏场之间有一条河，河的两岸有平畴沃野，形成一条较宽的山间河谷。我认为这就是苏轼所说的尔家川。只有把川解释为平地，也才把诗句读得通——种秔稌的千畦只能在平地上，绝不会在河中间。因是平地，又临近河岸，田块才能关水种粳稻。我还认为尔家川并不是一个固有的名词——《篇海类编·著卜类·爻部》：“尔，近也，又同迩。”据此，尔就是

近。那么，尔家，就是离家不远。苏轼说的尔家川，就是指离家不远的河谷平地。

苏轼诗中还有“山泉宅龙蜃，平地走膏乳”一句，当作何解？上面说到石佛山与三苏场之间有一条河，这河发源于丹棱县的龙鹄山，流到三苏乡境内的这段叫做龙洞河（伏龙河），再往东北流，流到一个乡场边，架有一座青石桥，名曰龙洞桥（伏龙桥），桥下悬了一把降龙剑（此桥后来重建过，俗称“弯弯桥”），这个乡场也就名之曰伏龙场。从龙鹄山到伏龙场都与龙有关，可见古代这一带就有关于龙的传说，古人就相信这条河里有龙，所以苏轼才有“山泉宅龙蜃”的诗句。因为龙洞河灌溉着两岸的庄稼，所以苏轼说“平地走膏乳”。这条河流出伏东乡后折往东南，叫思蒙河，直至青神瑞丰乡注入岷江。

把位于三峰山脉中的三苏场确定为三苏故居地，三苏诗文中的“故山”、“故岑”便可落实到位了，苏辙说他“生溪山间”亦就顺理成章了。至于苏辙诗中提到的轩辕泉、管辂宅以及彭女等，尚待考。

那么，在三苏场的三苏故居究竟在三苏场的什么位置上呢？县志^⑩说，元代在三苏场“建三苏祠，后称拨股祠。”明成化举人刘鸿所作《典记》云：“而州西七十里有拨股祠，亦相传为三苏故宅。说者谓三苏父子皆生于拨股祠，既乃迁于纱縠行，理合然也。”这说明明人就认为拨股祠是三苏故宅。但是，这里的三苏祠(后称拨股祠)是否是将三苏故居改建而成的，县志上没有说。刘鸿则说拨股祠“相传为三苏故宅”。我认为，苏轼说“废宅生蒿穧”，也就是说在苏轼在世的时候，其旧宅就废弃了，就生蒿穧了。这样的三苏故宅到元代必然早已坍塌了、毁圮了，因此，元代建三苏祠不可能利用故宅改建，只可能在故宅地址上重建，或者在故宅附近新建。这就是说，三苏场上的三苏祠还不能准确无误地肯定就是三苏故居。县志说这里的三苏祠“后称拨股祠”，似乎与现实也有距离。我们去三苏场考察，当地老者赵文成领我们看了现场——今之三苏中学校内一隅，就是三苏祠(又叫苏祠或苏公祠)所在地。他少年时，曾在此祠内读小学。祠是一座四合院，除有正殿外，两侧都是一楼一底的木楼。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殿位置上尚有旧房数间(当然不是元代建筑，而是后代重建)，房内尚有三苏塑像；祠内尚存清代石碑

一通，碑文曰：“元明以来，即有三苏祠。而今所谓场者，嘉庆二十年始兴，因三苏祠而得名……三苏祠为南岳所侵占，到咸丰八年，始另建南岳庙，恢复三苏祠。”而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祠已荡然无存，其基址上已种小树上百株，寻觅石碑亦不得见。赵文成领我们走出中学校门，指着三苏场上另一片房子(与三苏祠相距几十步，但祠在山坎上面)说，那里就是拨股庙，已拆建为屠场、仓库了。据此可知，三苏场上既有三苏祠又有拨股庙，两者并非同一场所。这里边又生出几个问题：1.拨股祠是否就是拨股庙？是否既有拨股祠又有拨股庙？2.三苏场上的三苏祠后来是否真改称为拨股祠？3.有了由三苏祠改称的拨股祠(在山坎上，即所谓凤凰山上)，为什么又另有拨股庙？这些问题均待考。

通过上述考察，我认为可以作这样的结论：三苏在溪山间的故居，应当是在后建的三苏场上。但不能肯定其宅址就是原来场上的三苏祠或者拨股庙的基址。

把溪山间的三苏故居认定在三苏场上，则可进而推定苏轼、苏辙的出生地和最早的读书地。

苏辙说“吾生溪山间”，据此可确定苏辙的出生地在三苏场。前边说了，三苏是庆历六年才迁居纱縠行的，其时苏轼已11岁了，因此苏轼绝不是在纱縠行出生的。三苏迁居纱縠行以前，是住在三苏场的，那么，他也就应当同苏辙一样，出生在三苏场。刘鸿说“说者谓三苏父子皆生于拨股祠”(拨股祠在三苏场)，很有参考价值，可作为有力的旁证。因他距苏轼逝世只有三百几十年，那时的眉山人(包括在三苏乡的苏氏后人)说三苏故事还不可能太离谱。

苏轼《众妙堂记》云：“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苏辙也说他幼时“从子瞻读书天庆观”。这表明苏轼、苏辙在天庆观张易简门下读书是确凿的了。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说：庆历六年，“公乃谢张易简归，成国亲授以书”。这段记载，明确说苏轼因于庆历六年迁居纱縠行，才“谢张易简归”，由程夫人“授以课”。由此亦知，张易简是在三苏一家居住在溪山间的时候教苏轼、苏辙读书的。那么，天庆观在哪里呢？当时，苏轼年幼(8至11岁)，苏辙更小，读书的地点不可能离家太远。但三苏场是清代才兴

建的，建场之前仅有三苏一家(或许还有邻居)在此居住，张易简的学校不太可能办在苏轼的家门口。我去三苏乡考察后猜想，天庆观很可能就是坐落在三峰山中的古刹三峰寺。理由有五：1.三峰寺附近的摩崖石佛像始凿于唐代。一般是始凿石佛像时(或其前后不久)即营建寺庙；或者先有寺庙然后组织凿佛像。因此，苏轼读书时三峰寺应该早已存在了；2.三峰寺距苏轼、苏辙的家只有七八里远，他们是可以去那儿上学的。就在近现代，农村孩子走七八里去上学也常见；3.张易简的学生“常百人”，一般农家容纳不下，势必选用寺庙。就在解放前后，不少农村小学还设在寺庙里。三峰寺无疑是完全可以容纳“百人”的，因而成为张易简办学的首选之地，也可能因为有了可办学的天庆观北极院，张易简才办学的；4.张易简是道士。历史上佛道交替占有古刹的事例是常有的。唐武宗曾下令灭佛，后周世宗也曾下令灭佛。这两次灭佛，好些佛教徒占有的寺庙被道士接手。三峰寺或者在很早以前就叫天庆观，或者由道士占有后改叫天庆观，都是有可能的。张易简应该是天庆观的道士，用北极院办学是顺理成章的；5.丹棱人彭遵泗所著《蜀故》曾记：“三峰山有东坡读书处。”我根据以上五点来推测苏轼、苏辙读书的天庆观就是三峰寺。当然，这仅是推测而已，需要找到确凿的证据才可以下结论。

《“三苏”故居初探》根据《记先夫人不发宿藏》中“会吾迁居”一句，断定苏家由穷家变成富家之后迁出了纱縠行，到“眉山县之南石佛山、尔家川一带购置了田地”，住进了蜀江边的半破茅庐，其依据是苏辙诗句“半破茅庐蜀江边”。①前面已解说了石佛山、尔家川，即可否定三苏由纱縠行迁到眉山县之南石佛山一带居住之说。曹学佺《蜀中名胜记·眉州》说：“《方舆》云：‘蜀江在城外，一名玻璃江……’”眉山人都知道，岷江流经眉山的一段称为玻璃江。按《方舆》之说，蜀江当为岷江。那么，苏辙说的“半破茅庐”当在岷江边啰！其实，苏辙说的蜀江，不可以就认定为流经石佛镇旁的岷江，因为三苏没有在那里居住过。我认为，思蒙河(上游乃龙洞河)是眉山境内岷江之最大支流，把它称作蜀江并无不可。再说，从广义而言，把蜀地之江称作蜀江亦无不可。三苏场的三苏故居，距龙洞河不远。廖副主任说，他小时候龙洞河上尚有船只来往，可见其过去水

量十分丰富。因此，苏辙完全有可能把龙洞河称作蜀江。

《“三苏”故居初探》之说还有讲不通之处——据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程夫人“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数年遂为富家”。既然苏家变为富家了，为何还去居住“半破茅屋”？是要做秀吗？不可能。是想做苦行僧吗？没必要。那到底为何？不知道。

当然，“会吾迁居”写得明明白白，那一定是迁过居的。但不能由此就断定三苏迁出了纱縠行，更不能由此就断定三苏迁去了石佛镇蜀江边的“半破茅庐”。我认为，程夫人接手“治生”后，苏洵及二子均专意读书，全家生活及三苏父子赴京的全部费用，均需程夫人继续筹措，程夫人也就必须继续经营纱縠绢帛之类的生意(由“二婢子熨帛”一句可证程夫人在经营这项生意。在古代，商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由“士农工商”的排序可见。所以，在三苏的文献中无更多的关于程夫人经商的记载)。因此，三苏这次迁居估计不会迁出纱縠行，而有这样的几种可能：由一处僦屋迁入另一处僦屋；由僦屋迁入买下的房屋或自家新建之屋；迁出多余的僦屋。究竟属于哪种情况，苏轼兄弟均未细说，我们只能猜想，但不可以妄下断论。

最后归纳一下：三苏在眉山的故居有两处。庆历六年苏轼 11 岁前，三苏居住在今眉山县西之三苏场，其地当有三苏故居，但已荡然无存。庆历六年苏轼 11 岁时，三苏由今之三苏场迁至眉山城内纱縠行居住。“元代将苏家故宅改建为苏祠祭祀三苏。明洪武年间(1368 至 1398)扩建，明末毁于兵燹，仅存五碑一钟。清康熙四年(1665)，知州赵蕙芽主持重修三苏祠”此后，三苏祠时有扩建维修，至今保存完好，并建三苏祠博物馆专事保护。

以上对三苏故居的探考，仅是个人管见，恳请方家指正。

论文注释：

- ①、④、⑥ 《苏轼文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373 页《记先夫人不发宿藏》、第 2278 页《梦南轩》、第 2361 页《种松法》。

(下转 44 页)

苏洵对族谱学的贡献

——恭读苏洵经典之作《族谱后录》

陈子彬

内容提要：苏洵对族谱学的贡献是：北宋族谱学的奠基者，阐明了大宗之法、小宗之法，考述了苏氏远祖及苏氏之源，提出了修谱间隔三十年一易世的原理。

关键词：族谱学 大宗之法 小宗之法 苏氏远祖 苏氏之源 三十年一易世

苏氏家族是中华民族最为古老的家族，又是一个文明灿烂、名贤辈出的家族。老泉公苏洵，就是苏氏家族中最为杰出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宋代族谱学的奠基者。2009年（己丑年）是老泉公千年诞辰，正当印度尼西亚苏用发先生倡导编著《新编苏氏总族谱》之际，重温老泉公族谱学著作，对于我们参加这项工程的编著人员极具教益。

“苏洵是宋代撰写苏氏族谱学的第一人，撰有《谱例》、《苏氏族谱》、《族谱后录·上篇》、《族谱后录·下篇》、《大宗谱法》、《苏氏族谱亭记》等等。苏洵的《苏氏族谱》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贡献至大。”^①

老泉公在族谱学方面的著述丰富，均堪称经典之作，为北宋以来乃至明清族谱的编制发展打下了理论基础和科学的编制方法；继承《世本》、《谱牒》关于血缘关系的传统；并深刻地阐明了何谓“大宗”，何谓“小宗”；历史上首次考述并梳理了苏氏远祖、苏氏之源、苏氏家族分布及其宗支、自昆吾至苏味道及其高祖世系；说明了族谱的修制年限。

一、北宋族谱学奠基者

老泉公首创苏氏族谱。老泉公在族谱学的论述中特别强调的是“苏氏族谱，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并不涉及大宗。大宗之法是宗法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在宗法制度已消亡二千多年后的今天，再倡导“大宗”，那是极不合时宜的了。

到了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兴盛起来，这个时候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尤其是老泉公创立苏氏族谱，其作用已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家（族）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时，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一项重大事件。到了明代，家（族）谱的结构已基本定型。明奉直大夫河南开封府许州知州阜山公希栻先生历五十年三修苏氏族谱，其谱之作完全悉循继承老泉公之经典之作，并进一步完善了族谱学，为明代家（族）谱之修撰的结构定型及易于普及做了应有的贡献，是闽南家（族）谱的楷模。

关于家（族）谱的起源，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是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的早期文字及史料文献，对家（族）谱的考证，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世本》早已亡佚，今日我们所能见到的《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其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历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当

时和当代各血缘集团谱系进行综合性总结的全国性总谱。

司马迁在《史记》所使用的《谱牒》、《牒记》仅是周以后的。周代《世本》，对司马迁创作《史记》有过参考作用，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家谱的开山祖。战国时代的《春秋公子血脉谱》，开启了国家庭史籍以“谱”为名的先河。

周代的《世本》在于“奠系世”和“辨昭穆”，其所奠之世系是周宗室的帝王世系；其所辨的昭穆是尊卑贵贱的亲疏。完全是推行宗法分封，为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周代的所谓大宗宗法分封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是“礼崩乐坏”，瓦解了。到了汉高祖“徒步天下”，其大宗宗法组织由兴到衰亡，由破坏到重建，至东汉时已被世族所代替了，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所以说两汉时期的家谱功能的恢复、重建和形成，是为巩固世家大族的统治服务。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势力极度膨胀，选用官吏实行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家”，官之任用，“不考人才行业，空辨姓氏高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家之婚姻，必由谱系”，这个时代的家族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依据。因之此时与之相适应的是修谱之风仍为盛行，但是由国家设谱局，置谱官，“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同时，伪造世系门第的造假现象也应运而生，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到了唐代初年，修谱之业仍继续为官方所垄断。唐朝初年，为了打击旧有门阀势力，抬高李唐皇族的社会地位，唐太宗李世民组织庞大力量编纂《氏族志》，以唐初之官爵为等级高下，因而使旧有的门阀势力受到重大打击。

谱牒是适应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需要而兴起的，在唐朝末年至五代，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的瓦解，故世家大族的谱牒也彻底地衰绝了，专门研究编制谱牒的谱学及其人士也消失了，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世家大族式的家族组织已经彻底地瓦解了。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庶族地主、商人在社会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到了宋代，继先秦的《世本》到汉唐时的《谱牒》衰绝之后，家族谱的编纂方式由过去主要是官府修谱发展演变成私家修谱。宋代苏洵的族谱学应运而生。其功能由过去的主要

是出仕、联姻的政治功能转化为尊祖、敬宗、睦族的社会伦理道德教化功能。

到五代北宋时期，历代皇室以至达官显宦大都出身于庶族地主，还有贫穷士子通过科举考试登上高官显位，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弄清楚自己五代（高祖、曾祖、祖父）以上的祖先是谁，即使是有的人本人心中有数，但也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草野之民。在那个年代能够理清自己祖先者已是为数不多吧！例如宋初的几位宰相范质、王溥的家世，只能数到他们的父亲。魏仁浦幼时孤贫，父亲叫什么名字，连《宋史》上都无记载。赵普的世系虽说能数到曾祖这一辈，可再往上也搞不清楚了（这种情况均可见《宋史》本传）。宋初的这些高官显贵宰相都是靠科举中进士这条路而占据高位的，绝不存在周王室分封制度；也绝不是汉唐（包括五代）时的世家大族的荫庇门阀势力。由于没有了谱牒的记载，其家族世系的脉络只能靠口耳相传，时间久远，谁是谁的祖先，谁又是谁子孙，在世的人们相互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血缘关系，能够搞清楚的人实在是不多见了，家族的世系成了一本难以理清楚的糊涂账了。即使是那些确实出身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的人们，也弄不清楚自己的家族来历了。也正如《经学理窟·宗法》的作者张载和《伊川先生语》、《二程集》作者程颐等人所言，人们都已不知道自己的“统系来处”的意思。

我们说老泉公的“《苏氏族谱》起了开创性的作用，贡献至大”，是宋代以来族谱学的奠基者。其伟大意义不仅在于继承了《世本》、《谱牒》关于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的重大作用；将谱学由官府制度政治的功能发展为尊祖、敬宗、睦族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正如苏洵在其经典之作《谱例序》②中所言：

古者，诸侯世国，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庙，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独贤士大夫尊祖而贵宗，盖其昭穆存乎其庙，迁毁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与为服，死丧嫁娶相告而不绝，则其势将自至于不忘也。自秦、汉以来，仕者不世，然其贤人君子犹能识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绝，无庙无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忘而独存，则由有谱之力也。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

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承其祖，而谱遂大废。

昔者，洵尝自先子之言，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世次。而其本出于赵郡苏氏，以为《苏氏族谱》。他日欧阳公见而叹曰：“吾尝为之矣。”出而观之，有异法焉。曰：“是不可使独吾二人为之，将天下举不可无也。”洵于是又为《大宗谱法》，以尽谱之变，而并载欧阳氏之谱以为《谱例》，附以欧阳公《题刘氏碑后》之文，以告当世之君子，盖将有从焉者。

族谱学的开创到北宋仁宗时代得到了推行。其所推行的族谱的形式首先是老泉公的苏式族谱，又称垂珠体。苏式族谱世系表的特点是：世系直行下垂，世代间无横线连结，全部用竖线串连，图表的格式也是由右向左排列的，主要是强调宗法关系。还有欧式：又被称作横行体，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所创立的。欧式族谱，其特点是：世代分格，由右向左横行，五氏一表，用起来很方便。欧式中，每个世代人名左侧都有一段生平记述，介绍该人的字、号、功名、官爵、生辰年月日、配偶、葬地、功绩等。另外还有宝塔式：顾名思义，就是将世代人名象宝塔一样由上向下排列。宝塔式采取横竖线连接法，竖线永远处在横线的中间，这对人多的大家族而言，因人名不可能排在同一页纸上，兄弟之间长幼关系不清，会为写谱或是看谱带来许多不便。再则还有牒记式：不用横竖线连续世代人名间的相互关系，而是纯用文字来表述这种世代之间的关系。对每个人的名下都有一段相关的履历简介，如：字、号、功名、官爵、生辰年月日、葬地、功绩等。牒记式的世系形式相对固定，其次序也分明，还比较节约纸张。

大量史籍与文献记载都证明，族谱（又称家谱、宗谱、家乘等不同的名称）始于北宋，完善于明清之际。《宋史·艺文志·三》还有司马光《臣寮家谱》一卷。在中国，尤其是闽南地域（包括台湾）每个聚族而居的家族，有一部以至数部族谱。人口众多的大家族的族谱，同他们的祠堂一样，还分为通谱、支谱、总族谱、分族谱、大同宗谱、小宗谱等等。北宋以后，随着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修制族谱的风气十分盛行。到明清两代，尤其在农村中，可以说既没有无谱之族，

也没有无谱之人。

宋文彦博在《苏氏族谱叙》一文中盛赞老泉公族谱学之作，“规夫族谱之作，尊祖也。尊祖而谱族，知祖宗之所出，非特以著世次，纪官位，而夸于人世也，盖将后世观之而考世德之纯庇，明统泽之广狭，俾其子孙益思所以自立云尔”。

二、阐明何谓大宗，苏氏族谱小宗之法

“大宗”，是古代宗法制度的一种称谓：“在宗法制度下，宗族中分大宗、小宗。周天子自称是上帝的长子，天下的大宗，政治上的共主。而同姓的诸侯国则为小宗。诸侯对天子来说是小宗，但在其国内则为大宗。王位和诸侯国君位一般都是由嫡长子世袭。”③苏氏之国有君在苏国之内为“大宗”。夏昆吾封于苏，始有苏国。商灭苏国，苏国失君，苏国失君已失“大宗”。在宗法制度完备下的周朝，苏氏仅有司寇、苏公等称谓。中国进入封建社会，虽说在世系传承上保有嫡长制，尤其是东汉以后在地主阶级内部形成大姓豪族，即所谓世族（士族）基本保留嫡长制，但并非保留“大宗”制度。战国六国为相的苏秦不是嫡长子未称“大宗”。汉武帝时苏建，随后之苏威，父子宰相均封许国公的苏瓌、苏頲，又有那一个称作大宗了呢？到了唐代末五代十国之初，随着世家大族式的家族组织的瓦解，门阀士族制度消亡，哪还有“大宗”之存在呢？

老泉公苏洵曰：

古者有大宗，有小宗。《传》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别子者，公子及士始为大夫者也。别子不得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后之，则为大宗。故曰“继别为宗”。族人宗之，虽百世，而大宗死，则为之齐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无子，则支子以其昭穆后之，此所谓百世不迁之宗也。别子之庶子又不得称别子，而自使其嫡子为后，则为小宗。故曰“继祢者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则易宗。其继祢者，亲兄弟宗之；其继祖者，从兄弟宗之；其继曾祖者，

再从兄弟宗之；其继高祖者，三从兄弟宗之；死而无子，则支子亦以其昭穆后之，此所谓五世则迁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与始为大夫者，而后可以为大宗，其余则否。独小宗之法，犹可施于天下。故为族谱，其法皆小宗。④

老泉公苏洵曰：

《苏氏族谱》，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

大宗之法，冠以别子，由别子而列之，至于百世而至无穷，皆世自为处，别其父子，而合其兄弟。父子者，无穷者也；兄弟者，有穷者也。无穷者相与处则害于无穷，其势不得不别。然而某之子某，某之子某，则是犹不别也，是为大宗之法云尔。

故为大宗之法三世，自三世而推之，无不不及也；人设二子而广之，无不载也。盖三法以为谱，学者之事也。由谱而知其先以及其旁子弟，以传于后世，是古君子之所重，而士大夫之所当知也。以学者之事不立，而古君子之所重，与士大夫之所当知者随废，是学者之罪也。于是存之《苏氏族谱》之末，以俟后世君子有采焉。⑤

东坡先生在其《亲睦说》一文中曰：“自秦汉以来天下无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复立。而可以收合天下之亲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无宗也。有族而无宗，则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则虽欲亲之而无由也。族人而不相亲，则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夫贤人君子之后，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悠久弗替者，以其族散而忘其所谓祖也。故莫若复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今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平而易治，其必自小宗之法始。而小宗之法岂行之难哉，亦在乎久而不怠耳！”

苏大先生《姓氏族说》曰：“赵宋以来，官失其守，谱牒散逸，姓氏混淆，无所考据，识者惜之，此吾老泉先生所以仿古谱牒，创为《苏氏族谱》藏于家，世之士大夫君子，有意于是者，莫不法焉。呜呼！王教既远，宗法攸废，缀之以姓，系之以氏，序昭穆，别亲疏，使人咸知水木本源之义，而不忘其祖者，舍族谱奚以哉！”

三、关于苏氏远祖及苏氏之源

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有别于世界其它民族者，正是“慎终追远”，尊祖敬宗，敦睦亲族；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人文始祖，其亲合力、凝聚力、号召力是无与伦比的。

先秦的《世本》，汉唐的《谱牒》，先后均失去为记载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图书体裁，老泉公创制的“苏氏族谱，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今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平而易治，其必自小宗之法始”。“王教既远，宗法攸废，缀之以姓，系之以氏，序昭穆，别亲疏，使人咸知水木本源之义，而不忘其祖者，舍族谱奚以哉”。

为阐明创建苏氏族谱宗旨，老泉公首先考述了苏氏远祖、源流以及苏氏分布及宗支。

苏氏之先出于高阳，高阳之子曰称，称之为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吴回。重黎为帝喾火正，曰祝融，以罪诛。其后为司马氏。而其弟吴回复为火正。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长曰樊，为昆吾；次曰惠连，为参胡；次曰篯，为彭祖；次曰来言（一本作求言），为惠人（一本作会人）；次曰安，为曹姓；季曰季连，为芈姓。六人者都有后。其后各分为数姓。昆吾始姓己氏，其后为苏、顾、温、董。当夏之时，昆吾为诸侯伯。厉商而昆吾之后无闻。至周有忿生，为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称之，盖《书》所谓司寇苏公者也。司寇苏公与檀伯达皆封于河，世世仕周。家于其封，故河南、河内皆有苏氏。六国之际，秦及代、厉，其苗裔也。至汉兴，而苏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杰以实关中，而苏氏迁焉。其后曰建，家于长安杜陵。武帝时为将，以击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后世遂家于其封。建生三子：长曰嘉，次曰武，次曰贤。嘉为奉车都尉。其六世孙纯，为南阳太守。生子曰章，当顺帝时，为冀州刺史，又迁为并州，有功于其人，其子孙遂家于赵郡。其后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者。味道，圣历初为凤阁侍郎，以贬为眉州刺史，迁为益州长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归，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苏氏。

故眉之苏，皆宗益州长史味道；赵郡之苏，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风之苏，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内之苏，皆宗司寇忿生；而

凡苏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吴回。

盖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长史味道，自益州长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间世次皆不可纪。而洵始为

《族谱》以纪其族属。《谱》之所纪，上至于吾之高祖，下至于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呜呼，高祖之上不可详矣。⑥

老泉公族谱之作，尊祖也。尊祖而谱族，知祖宗之所出，但绝不是以著世次，纪官位，而夸于人世。

四、修谱间隔三十年一易世

自苏氏入秦，而平陵侯建、典属国武始显。迁于赵，而并州刺史章、益州长史味道始有闻于世。迁于眉，而至于今无闻。夫是惟谱不立也。自昆吾至《书》之苏公，五百有余年；自《书》之苏公至《诗》之苏公，二百有余年；自《诗》之苏公至平陵侯建、典属国武，七百有余年；自平陵侯建、典属国武，至并州刺史章，二百有余年；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长史味道，五百有余年；自益州长史味道，至吾之高祖，二百有余年。以三十年而一易世，则七十有余世也。七十有余世，亦容有贤不贤焉。不贤者随世磨灭，不可得而闻；而贤者独有七人。七十有余世，其贤者亦容不止于七人矣；而其余不传，则谱不立之过也。⑦

老泉公将修谱之间隔锁定为三十年而一易世，是符人类生活生存的实际，也为后世历代人们修谱的实际所证明，是符合人们生存的自然规律的。

一个家族或是一个族群，必须定期续修家（族）谱。家族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必然会有新生儿的出生，或要娶进新娘等增添人丁；还会发生故世的老人，新增坟墓等变化，均须反映到族谱上来，这样才能确保家族成员血源关系上的清楚准确的记载，故必须定期续修家（族）谱。

续修家（族）谱的间隔时间，绝大多数的家庭或族群，一般都沿袭传统习惯的三十年或三世。有的地方或家族规定家族谱要三十年一小修；六

十年一大修。若是世隔久远，家族情况散或乖离等弊病客观实际，势必要求至少三代，或是三十年续修一次家族谱。一个家族三十年不修族谱，即被视为极大的不孝。古人云：“谱定三十年一修，若不尊此，即属不孝”。

家族谱三十年一修，是遵从人类的成长规律，即是老一辈（祖父）健在，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的时候，将三十年内的家族（特别聚居一地群体大姓家族）亲缘关系的变化，能够无误的记录下来，实属是件很不容易办到的。尤其是时隔久远、社会变化、老人故去、族中人丁移动变化，稍有记忆记录失误，势必会引起血缘关系的混乱，使尊祖敬宗造成不必要的失误。

二〇〇九年（己丑）清明节

论文注释：

①引自颜中其、苏汝谦、苏克福主编《新编苏氏大族谱·苏氏家族的发展简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④、⑤、⑥、⑦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六册），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261页、第267页苏洵《族谱后录上篇》、第771页苏洵《大宗之法》、第265—266页苏洵《族谱后录上篇》、第268页苏洵《族谱后录下篇》。

③参阅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篇第三章第二节。

参考资料

《礼记·大传》译文（关于宗法制度“大宗”、“小宗”的定义）。

苏洵《族谱后录·上篇·下篇》译文、注释，《苏氏族谱引》，《大宗谱法》，《苏氏族谱例》，《苏氏族谱亭记》。

文彦博《苏氏族谱叙》、《眉阳苏氏族谱引》。

苏轼《亲睦说》。

苏继芳《眉山苏氏本宗谱系便览》、《眉山苏氏重修族谱说》。

苏大《大宗小宗说》、《姓氏族说》。

《入弦一字，万世一系》（据《史记》编制，附注释）。

《苏荣（河北栾城）至“三苏”（眉山）世系》附注释。

（河北省承德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河北省承德苏武苏颂研究会会长、秘书长）

浅谈苏轼徐州农村词

韩国强

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知徐州。同年七月，苏轼率领军民防洪。元丰元年（1078），徐州又发生大旱，苏轼到石潭去祷雨，后来春旱缓和。同年夏初，苏轼又去石潭谢雨，沿途看到一派丰收景象，情不自禁地写作《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

其一

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溪绿暗晚藏鸟。黄童白叟聚睢盱。
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归家说与采桑姑。

其二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挨踏破蒨罗裙。
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其三

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
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搗捣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其四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唯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其五

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何
时收拾耦耕身。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
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这五首词，历来被评论家看好，特别是现代更被苏学专家推崇。邱俊鹏先生在《中国第十一届苏轼研讨会开幕词》中指出：苏轼“徐州时期的五首《浣溪沙》，又在题材的拓展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苏轼用五首《浣溪沙》，不仅描写了农村的自然景物、风俗和劳动，而且直接描写了村姑、老农、儿童等众多农村人物。”“这些都是词史上值得大书特写的。”

—

我们知道，晚唐五代“花间派”词风，从习惯上把词看作“艳科”、“小道”，认为许多不便公开的男女私情、生活细节，才利用词的形式进行表达。譬如，“花间派”鼻祖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
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
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这是典型的花间派之作，通篇写闺怨之情。

宋初，柳永行为放荡，更把“艳词”推向高峰。他在《迷仙引》等词写歌妓怎样热切盼望过正常的夫妇生活。《雨中花慢》等词又曲折、细致地传达出她们被轻薄男子欺骗的痛苦。他的《定风波》：“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
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
暖酥消，腻云蝉、终日恹恹倦梳裹。
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
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
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
免使年少，光

苏文感悟

阴虚过。”这是柳永俚词的代表作，它倾诉了闺中少妇的离愁别绪。

词的发展至宋代已走入狭窄的道路。苏轼举起词革新的旗帜，“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人耳目。”^①他不仅打破了传统文人词的艳科陋习，还远远超出了他所开创的豪放词的范围。

这五首《浣溪沙》词，第一首写石潭的村野风光，以及村民欢乐的情绪。第二首写作者与百姓同赴春社赛会的欢腾景象。第三首写煮茧缫丝的劳动和丰收后农民的生活。第四首写生产繁忙和作者与百姓的亲密无间。第五首写农村美好风光，抒发作者欢快的情怀。苏轼“在徐州所写的几首农村词，是北宋词史上第一组饶有风味的农村风景画和风俗画。这几首词用清新隽永的语言，从不同角度写农村小景”，^②勾勒出一幅幅绚丽多姿的画卷。从徐州的创作实践看出，苏轼已把文学革新之笔伸向词的领域。唐圭璋、潘君昭在《论苏轼词》中认为：“在苏轼以前，还没有文人采用过这类题材，苏轼能把他创作视野扩展到农村方面，是与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倾向有密切关系。”因此可以说，苏轼徐州农村词是“继密州狩猎词、悼亡词之后，对词的描写题材的又一次突破。”^③

苏轼在词的题材上冲破“艳科”之牢笼，解放了词体，为北宋词坛带来崭新的风气。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等农村词就明显地受到苏轼农村词的深刻影响。

苏轼“用词体系统地描写农民生活前所未有”^④，“为词苑开辟了一片崭新的疆土”^⑤。他在词题材上的革新作出的贡献，应该得到更广泛的重视和评价。

二

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指出：“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我揣测，刘辰翁的话，除了赞扬苏轼在词题材的革新外，还含有赞美苏轼农村词格调清新的意思。

苏轼这五首词运用白描手法，语言自然生动，音节和谐优美，“给充满着脂粉气、士大夫气味的词境注入了新鲜的泥土气息和乡村风味。”^⑥我们先看第二首。上半片，写词人进村后看到的热闹的生活场景：一群农村姑娘知道太守到来，匆忙地梳妆打扮。她们三个一团，五个一伙，你拥

我挤在“棘篱门”前，乃至“蒨罗裙”被“踏破”。上半片既逼真地表现农村姑娘的好奇、羞涩的情态，也刻画出农村迎神赛会。农民们“老幼扶携”在参加庆祝丰收的祭神活动。乌鸦和老鹰在赛神会的上空盘旋飞舞。一位老叟因为喝多了几杯酒，竟然倒卧在路旁。“如果说全词就像几个电影镜头组成，那么，上片则是连续的长镜头；下片却像两个切割镜头，老幼收麦、鸟鸢翔舞是远景，老叟醉倒道旁是特写。”^⑦词人把一幅充满浓郁生活气息和丰收喜悦的农村风俗画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赏心悦目。

第四首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则是另一幅“清新自然、饶有情趣的乡村初夏图”。^⑧词人从枣花下笔，渲染出浓厚的农村生活气息。接着描写村子里将蚕茧缫成丝的繁忙景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穿粗麻布衣服的农民正在叫卖黄瓜。上片有景、有声，读罢，使人心旷神怡。下片转入写词人内心的感受。在初夏暖烘烘的阳光照射下，词人因喝多了点酒，走进农村有点累了，敲门探问，农民家有没有茶喝。“敲门试问野人家”一句把苏轼平易见人的情操展现出来。他不摆官架子，态度谦和。一个一州之长，能与老百姓亲密，在当时已算难能可贵了。

苏轼曾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⑨苏轼的徐州农村词“没有深奥的典故，也没有生僻的词语，而是采用白描的艺术手法，描写谢雨途中的所见所闻，展示出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农村生活画面，清新、活泼、朴实、优美。”^⑩

胡寅《题酒边词》说苏轼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态”，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

三

苏轼在徐州任上遇到两大自然灾害：一是洪灾，二是水灾。

熙宁十年七月十七日，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曹村埽决口，洪水向东南灌流，很快掩没了四十五个县，“汗漫千余里，漂庐舍，败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壮者狂走无所得食，槁死于丘陵林木之上。”^⑪八月二十一日，洪水抵达徐州城下。情况十万火急，苏轼率领军民抗洪救灾。他派员从城内运干粮救济逃难灾民；他阻止城内富

户出城避难，稳住民心；他动员禁军参加抗洪；他亲荷畚锸，布衣草履，结庐城上，过家不入。在抗洪救灾的日子里，苏轼可谓身心憔悴，疲惫不堪。“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⑫便是那些难忘日子的活写照。

元丰元年，徐州大水后，又遇天旱。苏轼恪尽职守，与百姓休戚与共。他奔波到城东二十里的石潭求雨，写作《徐州祈雨青词》：“徐居下流，受害甲于他郡。田庐漂荡，父子流离……望二麦之一登，救饥民于垂死。……今者麦已过期，获不偿种，禾未入土，忧及明年。”苏轼为百姓过上好日子，费尽心机，流尽汗水。

两大自然灾害耗尽了苏轼的精力，然而，好人终得好报。元丰元年初夏，徐州一带农村获得农业大丰收。苏轼写作的五首《浣溪沙》词，从不同的场面表达他欢快的心情。这组词与他之前写的救灾的诗文在心情上形成强烈的反差。组词写了黄童、白叟、采桑姑、络丝娘、卖瓜人、醉叟等各种农村人物，以及“煮茧”、“响缫车”、“捋青捣麯”等农事活动；写了丰收后农家祈雨谢神的社祭活动；写了村姑“旋抹红妆”争看使君的热闹场面；也写了词人“酒困”、“思茶”，向“野人家”“敲门”的情景。词人欢快的心情在组词中得到充分的表露。

我们在阅读苏轼五首《浣溪沙》词时，还要进一步探讨，为什么苏轼在组词的最后说“使君元是此中人”呢？

苏轼一生仰慕陶渊明，欲效陶渊明归隐田园，“种豆南山下”。他一贯有归田乐农思想。他通过这组词描写农村美好的风光，表达他对农村生活的向往。“我是识字耕田夫”^⑬，正是他内心的表白。

在徐州，自然灾害给苏轼带来了忧虑，而战胜了灾害，夺取农业丰收，喜悦写在苏轼的心中。这组词体现了苏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广胸怀。苏轼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一生坚守“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爱民”、“忧民”，以实际行动实践自己的远大抱负。当看到大灾之后，农民丰收的喜悦，他怎么不高兴呢？

论文注释

^⑪ 王灼《碧鸡漫志》。

^⑫ 刘乃昌《苏轼选集·略论苏轼及其文学成就》。

^⑬ 张崇琛《密州到徐州——谈谈苏轼徐州时期的思想与创作》。

^⑭ 刘乃昌《漫谈东坡徐州诗词的淑进精神》。

^⑮ 王文龙《苏轼词新辑评·浣溪沙》。

^⑯ 王兆鹏《唐宋词的审美层次及其嬗变》。

^⑰ 周啸天《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

^⑱ 朱靖华《苏轼词新释辑评·浣溪沙》。

^⑲ 周紫芝《竹枝诗话》。

^⑳ 贺新辉《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

^㉑ 苏辙《黄楼赋》。

^㉒ 苏轼《九日黄楼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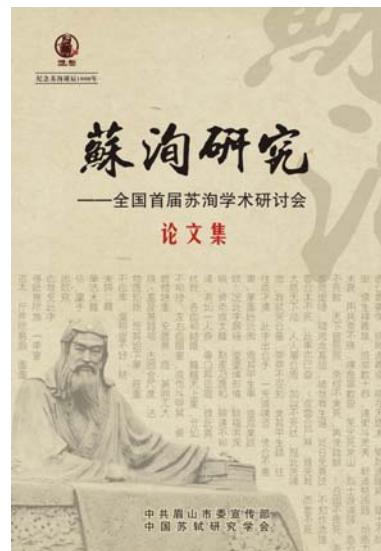
^㉓ 转引自董治祥 刘玉芝《苏轼在徐州》。

(原海南省儋州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局长)

《苏洵研究》简介

“全国首届苏洵学术研讨会”收到苏洵研究论文35篇，28万字。这些征文内容丰富，涉及苏洵的生平、思想、作品和遗迹研究；质量上乘，有的以新颖的见解取胜，有的以翔实的论据服人，有的以视角的独到见长，达到了苏洵研究的前沿；范围广泛，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河南、山东、河北、湖北、江苏、浙江、广东10省15地市。

论文集《苏洵研究》由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编辑，2009年5月出版，16开本，324页，约30万字，准印证号：眉新出内（2009-65），工本费：38.00元。



《叶梦得与苏轼》序

张志烈

读到潘殊闲先生这本《叶梦得与苏轼》，我立刻想到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过的一些话。《艺术哲学》第一编第一章《艺术品的本质》中，对认识艺术品和艺术家，提出了“三步走”的办法。

第一步是：

一件艺术品，无论是一幅画，一出悲剧，一座雕象，显而易见属于一个总体，就是说属于作者的全部作品。

第二步是：

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例如莎士比亚，初看似乎是天上掉下来的奇迹，从别的星球上来的陨石，但在他的周围，我们发现十来个优秀的剧作家……在画家方面，卢本斯好象也是独一无二的人物，前无师承，后无来者。但只要到比利时去参观根特、布鲁塞尔、布鲁日、盎凡尔斯各地的教堂，就发觉有整批的画家才具都和卢本斯相仿……到了今日，他们同时代的大宗师的荣名似乎把他们湮没了；但要了解那位大师，仍然需要把这些有才能的作家集中在他的周围，因为他只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只是这个艺术家庭中最显赫的一个代表。

第三步是：

这个艺术家庭本身还包括在一个更广大的总体之内，就是在它周围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因为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对于艺术家是相同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

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

对于宋代文化和文学来说，苏轼确实是如丹纳所说的“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是“最显赫的一个代表”。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迹”，也不是“从别个星球上来的陨石”，而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他是前有师承，后有来者。在他的声音之下，有无穷无尽的“四周齐声合唱”的“一片和声”，而叶梦得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星。从平生创作之丰富，作品流播之广远，读者之众多，研究争论之热烈，以及对后世人文精神影响之巨大看，他都有着独特的光芒。就“文化”而言，他广涉各个领域，是多专长的学者。从哲学、政治学、艺术理论到医药学、水利学，甚至在盆景制作、园林设计、自来水装置、制墨、酿酒、烹饪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研究。就“文学艺术”而言，他是少有的多能文艺大师。散文是唐宋八大家中巨擘，诗为宋调最杰出的代表。书法、绘画俱臻上乘。其崇高精神境界和卓越人格魅力，成为历史上文化人敬仰的典范，倾慕的楷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宋代特定的社会环境孕育并造就了苏轼的伟大，而苏轼在各方面的创新贡献又给予中华历史文化以巨大、深沉而久远的影响。苏海汪洋，确可谓“说不全”、“说不完”、“说不透”，正唯其如此，更加激励学者们探索钻研的斗志。苏轼的精神世界无比广阔丰厚，但有其核心价值观存在。研究苏轼的全部著作和其立身行事，我们可以大

致看到贯穿他全部意识形态的最根本、最基础的东西，简略言之，就是：爱国爱民，奋力当世的崇高理想；求实求真，探索创新的认识追求；信道直前、独立不惧的处世原则；坚守节操、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我以为这些就是苏轼毕生坚持、维护的最高价值追求和生活信念。持此以观苏轼的著作，基本上可以处处皆通。

认识和研究是无限的，理解和阐释是永恒开放的、变动的、创新的。学者可以从无穷多的角度去观照自己的探究对象。殊闲先生这本书的写法，使我对丹纳所讲的“和声”的比喻似乎更体会到了一点东西。乐谱上标示的和声音符，如果单独奏出来，只能算是一些节奏似的响声，只有它们和主旋律同时奏鸣，才能展现出意韵无穷的音乐世界，才是真正活的乐曲。认识文化生态，似乎也有这个道理。本书从政治实践、文学活动、学术兴味、生活旨趣几方面比较了苏轼和叶梦得各自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又从叶梦得与苏轼后人、叶梦得与晁氏家族、叶梦得与苏门及其追随者和友人几方面的联系影响进行考察，从而结论出叶梦得是窥探宋代“苏轼文化现象”与宋人“苏轼心理情结”的重要窗口。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路数，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和声”似地展现了当时文化生态的诸多关联和内蕴，加深了我们对苏轼和叶梦得两人的理解，这是别的写法所不能代替的。此书还有一个特点是资料翔实，所言处处皆细致有据，启迪人作更远的思考。

比如第八章谈到叶梦得由于其特别的文化生活环境，故能“绍承苏轼之余韵，开启一代之新风，成为一个与苏轼类似的在多方面都有一定影响和建树的复合型人才”。“宋代文人较之过去，博通型的多面手是很多的，像叶梦得这样的‘杂家’，不在少数，而苏轼无疑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这里讲到苏轼、叶梦得及宋代许多人的“复合型”与“博通型”的特点，就是很值得注意的。

追求“打通”，正是宋代文化学术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人类的任何文化创造之间，都含蕴着“共性”和“打通”的契机，这是由人的生活环境的一致性、相通性所决定的。首先，人类的生态具有一致性。生物进化赋予人类的肢体结构、身心功能及其基本欲求、生存方式是一致的。其二，人与客观世界的对象性关系

及其开展实践活动具有一致性。人处在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与已有文化、与历史进程的对象性关系中，面临这一切在进行生存实践活动。其三，人既作为个体又作为类群的存在物的一致性。人的本质，决定了生活实践面临共同的问题需要解决。其四，由于古今中外人类生活的共性，决定了人类心灵深处有着共同祈向，从根本上说，无不追求与自然的和谐，无不追求情感与理性的和谐，无不追求个体与类的和谐，无不追求历史与伦理的一致，亦无不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这四点内在地决定了人们的文化创造之间总具有“公因子”，总存在“打通”的可能性。

从特殊意义上讲，宋代文化发展之间的各种条件（也可看作是一般条件在宋代的显现），造就和催促这种“打通”局面的形成。宋人是自觉的“打通”追求者。略为思索宋代文化诸现象如理学的出现之类，对此便可意会。苏轼在《祭龙井辩才文》中抒写了他的“打通意识”：

呜呼！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
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南北东。江河虽殊，
其至则同。虽大法师，自戒定通。律无持破，
垢净皆空。讲无辨讷，事理皆融。如不动山，
如常撞钟。如一月水，如万窍风。

（下转 61 页）



潘殊闲著《叶梦得与苏轼》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9年3月第1版

定价：21.00元

《东坡文化产业发展概论》序

王均

社会科学研究要为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服务，充分体现其应用性和创新性，东坡文化博大精深，东坡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是一项全新的课题。如何把握其精髓和核心，努力实现“文化富民”的产业发展目标？东坡影响所及，特别是其成长的老家——眉山，及其为官行政、贬谪流放的遗址遗迹地，都做了大胆而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眉山历来高度重视东坡文化研究、东坡文化产业发展，相继成立了三苏文化研究院、投巨资改扩建三苏祠、新建三苏纪念馆、成功举办了东坡国际文化节；三苏祠博物馆以东坡老家守护者为己任，精心研发东坡文化产品；三苏酒业以《东坡酒经》为其酒魂，传承东坡文化，以做中国最好的白酒为追求；北京眉州东坡酒楼以“为全世界人民做饭”为理想，矢志传承东坡美食养生文化；徐州以东坡遗迹、抗洪功业为依托，倾力助推东坡文化旅游业；河南郏县、河北栾城、湖北黄冈、广东惠州、海南儋州等地，东坡文化产业发展有声有色。这些重大举措和活动，进一步深化了东坡文化研究，进一步推动了东坡文化产业发展。东坡文化产业发展已纳入加快这些地方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和旅游重头戏的整体规划中，苏学研究实现了东坡文化研究与东坡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的结合。基于文化富民的宏愿，苏学界加强了东坡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眉山市组织社科工作者完成了《东坡文化产业发展概论》，《概论》填补了国内外苏学研究的空白。《概论》既是东坡文化研究的应用性成果，也是国内外东坡文化产业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学术专著，为加快发展东坡文化产业提供了蓝图，可喜可贺。

《概论》层次分明，内容丰富，逻辑严密，深

入研究东坡文化产业发展，首先必须弄清楚何为东坡文化？《概论》从家学渊源、文脉传承、勤奋好学、一代宗师等方面详尽阐述了东坡文化的形成，展示了东坡既是一代文化宗师又是一代生活大师的波澜壮阔人生，展现了东坡文化博大精深的丰富内容。深入研究东坡文化产业发展，充分说明东坡文化有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概论》从在中国历史上、当今中国和在世界上的影响等方面，精当总结了东坡文化的历史价值和对未来的深远影响。在此基础上，《概论》进一步详尽阐释了东坡文化产业无比丰富的内涵和无比宽泛的外延，由东坡文化的研究上升到东坡文化产业的研究。论证了东坡文化产业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高度概括了东坡文化发展的策略，东坡文化产业发展应处理好的关系、核心竞争力、环境条件，层层相因，学术探求与实践密切结合，理论特色十分突出。

研读全书，我以为有以下几大特点：

一、《概论》紧扣东坡文化产业发展主题，揭示了文化产业发展带规律性的东西。发展文化产业，必须研究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必须研究应处理好的关系，必须研究其核心竞争力和发展环境等等。这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不仅是东坡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把握的，也是其他文化产业发展可借鉴的。

二、《概论》既有精辟的论证，也不乏精彩的个案分析，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概论》无疑首先是一部学术专著，但又不全是理论说教，有议有论，更兼案例演示，论证互补，相得益彰，既增强了《概论》的可信性、应用性，又增强了可读性。

三、《概论》从基础知识普及入手，说理叙事，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什么是东坡文化？什么是东坡文化产业？该产业如何发展？作者披沙拣金，从浩瀚的史料中，精心选材，恰当取舍；深入浅出，发微探幽；既继承、丰富和完善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因而，《概论》既是一本普及东坡文化、东坡文化产业知识的优秀读物，又能给有志于苏学研究、有志于东坡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的专业人员、爱好者提供有益的启迪。发展东坡文化产业的策略、步骤，简明扼要，操作性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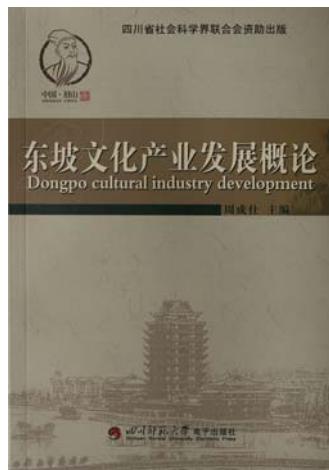
四、理论创新，填补了东坡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的空白。东坡文化和东坡文化产业由来已久，苏学研究汗牛充栋，但从未有人涉足东坡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更遑论形成一本洋洋大观的专著。《概论》填补了苏学研究的空白，体现了作者理论创新的智慧和勇气。

对于东坡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是新的尝试。这种尝试，虽有待进一步深化和突破，但对于推动我国东坡文化研究必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对于推动中国东坡文化产业发展必将起到深远的影响。理论指导实践，理论研究必须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为我国东坡文化产业的又好又快发展，我希望大家来读读这本书。

是为序。

二〇〇九年七月

(四川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周成仕主编《东坡文化产业发展概论》
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 2009年8月第1版
定价：36.00元（书籍附光盘）

(上接59页)

这就是苏轼在自觉而明确地追求“打通”。无独有偶，连被称为醇儒的司马光，也写了《解禅偈六首》：

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铓锋。
终朝长戚戚，是名阿鼻狱。

颜回安陋巷，孟轲养浩然。
富贵如浮云，是名极乐园。

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蛮貊。
积善来百祥，是名作因果。

言为百代师，行为天下法。
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坏身。

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
行之诚且久，是名光明藏。

道德修一身，功德被万物。
为贤为大圣，是名佛菩萨。

司马光的本意是在说明佛学的那些所谓精言微义，并没有超出我们儒学的深广范围，而表达方式则鲜明地体现了“打通”型思维。

至于叶梦得之能“通”于苏轼，除了上述一般条件、宋代特殊条件之外，还有他作为个体的微观具体条件，本书后四章就特别详细清晰地考论了这些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也是“打通”思维的产物。

殊闲治宋代文史有年，扎实细密，眼界开阔，循此以往，当见其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此书行将出版，殊闲要我写几句话。我仅就一时感触，说了上述肤浅的想法，不当之处，还祈读者正之。

己丑人日浣花溪畔
(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

走入苏海

——杨胜宽先生的苏轼研究道路

何晓苇

杨胜宽先生曾受教于谭优学、赵怀德二先生，酷爱古典文学、研究古典文学，从大学时期起就已融入他的生命旅程。1986年从西南师大调入乐山师专，为了体现研究的地方特色，1990年夏申报了省级青年基金课题《苏轼人格研究》。这也是得益于曹慕樊先生的指点：治学须从“大家”入手。“道理在于：只有吃透‘大家’，才能了解古典文学的代表与精华；只有领略了‘大家’的世界，才能具备高屋建瓴的眼光，一览众山小，拿准对其他作家评价的尺度和分寸。”（杨胜宽《我的古典文学研究历程》）

苏轼人格研究历时一年半，于1992年底基本结束。三十三万字书稿直到1994年才印行。在此期间，书中的某些章节先后在《四川大学学报》、《中国文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其中有四篇文章分别被人大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复印转载。表明杨胜宽先生经过几年努力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学界引起了反响。可以说，是苏轼人格研究开启了杨先生研究苏轼的学术历程，也是苏轼人格研究使杨先生以苏学专家之名立足于学界。曾有学者这么评价道：“杨胜宽的《苏轼人格研究》开拓了苏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古典作家研究方面，开了人格研究的先河。”（饶学刚《开拓苏学研究的新领域》）

苏轼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文学方面，他的文化性格、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子者虽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人格精神对后世的影响，自然会使人们从文化层面上来认识苏轼。杨先生对苏轼的人格魅力

进行文化学阐释，可谓得风气之先。对于这样一位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物，杨先生在书中应如何去描述和阐释呢？

第一部分“理论篇”，苏轼人格的魅力事实所体现的是一种文化的魅力。他把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儒、道、释融化成为一种生活的智慧，并以一生去演绎这种文化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是传统文化的人格化身。苏轼的人格思想，反映出的正是苏轼力图融合传统文化精神的人生理想。苏轼偏爱水，称“君子如水，因物赋形”，主张君子在进退出处上应采取灵活变通的态度。苏轼好竹，从竹意象中寄寓着“群居不倚，独立不惧”的人格操守。杨先生从这两个意象入手认为苏轼“把君子的人格模式规定为‘柔外刚中’”，“柔外非奉迎屈服之谓，刚在其中，面临困难有必达之志，期于必胜；刚中非矫世骇俗之谓，柔其外形，进退出处灵活变通，既度其君，又度其身”。“柔外刚中”的人格模式融入了儒家刚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和道家贵柔守雌、体道顺物的思想。“柔外刚中”是苏轼总的处世原则。杨先生进一步指出了苏轼言论中“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和“可以寓意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人生态度。这是苏轼在遭遇人生挫折以后，力求将儒道的思想智慧加以融会的人生价值意义追求：当儒家的入世精神受到挫伤后，走向道家的超然物外、自由高蹈，但并不逃世、避世，仍葆有儒家的操守与情怀，热爱生命、关怀民生。由此，儒道互补，儒与道得以圆满的融合。理想只是一种可能性，成为现实还需要人生的历炼、反省和调整。

第二部分“特征篇”，不仅是对苏轼人格特征的多侧面的描述和全面的观照，而且也是对苏轼

一生人格理想追求和实现过程的历史性探寻。天赋秉性的“生性狂直，与物多忤”，初入仕途的“锐于报国，拙于谋身”，政治实践中的“知易行难，恪守其中”，新旧党争中的“群而不党，交而不随”，与正统理学家争辩中所表现出的“情不离性，散而有为”，贬谪生涯中的“乐天知命，随遇而安”，最终成就了“气体内充，风华外焕，清远脱俗”的“美化人生”。苏轼性格的不同侧面在不同情景和人生变故中的自然而丰富的展现，使我们对苏轼的人格特征有了更深入而真实的理解和把握。

第三部分“原因篇”，苏轼的人格理想追求，是在纵向的传统文化和横向的时代政治人文背景、地方文化、家庭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下的必然选择。其分析细致、独到，新意迭见。

对杨先生而言，苏轼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苏轼本身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二是扩大到与苏轼相关联文人的研究。

苏轼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人生经历也多姿多彩。杨先生在《苏轼人格研究》一书中曾将苏轼的政治态度、哲学思想、美学观念、文学艺术创作、身世遭遇、文人交往、家庭亲情等统摄于人格特征的表现与形成的原因来考察，但主要结合人格特征来谈及，意犹未尽。故而，杨先生以专文的形式作了更为细密的阐述。如《苏轼的气论与养气方法》（《四川师大学报》年1993年2期）总结苏轼的养生之道；《佛道思想与苏轼仕途生涯》（《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4期）论述苏轼的儒道思想，以及在苏轼仕途生活中的作用；《道德人格与艺术生命的契合点》（《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3期）从苏轼道德修养的角度分析苏轼文章和绘画气韵生动的原因；《试论苏轼的艺术追求与人格境界的统一》（《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2期）从“知之”、“好之”、“乐之”的三重境界，追溯其人格理想和艺术境界的追求和统一的过程；《崇杜到慕陶：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2期）阐明苏轼在对陶渊明、杜甫其人其事的伟大价值的发掘中，联系其立身处世来确立文学创作中的风格、品味和价值的艺术演进历程。除此之外，在其它文章中还对苏轼的性情观、婚姻和感情生活、躬耕生活、利民思想、军事思想、赏罚观及其改革思想、礼制观、自然与任性观念作了深入的探讨。上述文章着力于苏轼其人其成就的某一方面的考察，

分析的角度和观点颇有新意、发人深省。

杨先生在苏文研究上作了可贵的尝试。《笔势仿佛离骚经——东坡赋考论》（《西南师大学报》1994年2期）是一篇关于东坡赋的考论文章，《说苏轼的论体散文》（《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和《论苏轼的记体散文》（《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10期）两篇文章则是分体散文研究的结晶。

关于与苏轼相关联文人的研究，杨先生主要以苏轼作为参照对象，来审视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文人的人生态度，以及创作理论和实践。如《苏轼与秦观用情的不同方式》（《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6期）一文，分析了苏轼与秦观都是性情中人，但却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历程的原因，在于用情方式的不同。这是前人注意却未深究的一个话题。在其它相关文章中，他还探求了张耒文艺理论、创作实践，李之仪文艺思想与苏轼之间的关系。

深受苏轼影响的文人不止以上作家。故杨先生把与苏轼相关联的文人纳入苏门作家群来作整体研究，背后贯穿着对北宋后期文学全面繁荣原因与宋代文学特征的思考。这一思考形成了《苏轼与苏门人士文学概观》一书。该书首先界定了苏门的概念，梳理、甄别和补充了苏门作家的核心成员与一般成员，研究了苏门作家群体的形成过程；其后考察了苏门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苏门人士的政治遭遇与人生经历；最后总结了苏门人士共同遵守和追求的人生观念、文学理想和行为准则，及其文学创作成就。此书体现了与《苏轼人格研究》一致的研究旨趣：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探寻具体问题的深层内涵，深刻认识苏门文人集团的形成及其作用。文人集团形成于文人之间的交往，由文人群的交游能更深入探讨共同的文学趣尚，所以杨先生在研究苏门作家群体的过程中，写了一系列文章，考证苏轼与毕仲游、李王已、李之仪、李膺、米芾、陈师道、赵令畤、道潜等苏门文人之间的交往情况。从杨先生的研究路径来看，苏轼与宋代士林风气应是他下一步思考的重点。

杜学是杨胜宽先生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杜甫研究的成果收入《杜学与苏学》一书中。杜学与苏学构成了他学术研究的双壁。

（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西方汉学界的苏轼研究

——比较文学

唐凯琳

鉴于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把他与其他的著名文人联系起来研究就不足为奇。实际上，苏轼经常将自己与前人相比，以示自己与他们息息相通。苏轼时常与韩愈、李白、杜甫相比，但他提到最多的可能还是陶渊明与白居易。恰好这两个人物也是西方学术界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因为苏轼渐为西方学者所了解，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同其他文化、时代、语言的人物进行比较的对象。苏轼不仅在比较文学领域是一个合适的比较主体，在其他领域亦然。在这一节中，我们将依次回顾苏轼与中国诗人、苏轼与他国诗人的比较研究情况。

在《道根深：苏轼与白居易》一文中，萨进德引用了苏轼的绝句“微生偶脱风波地，晚岁犹存铁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可见，在这首诗中苏轼将自己比作退隐的学士白居易。萨进德的目的是想表明苏轼把自己与白居易联系起来，可能始于谪居黄州期间，但此后这种想法便伴其终身。元祐初期（1087），当苏轼以翰林学士任职京城时，其作品中不止一处明确提到了白居易。为了揭示苏轼基于过去的感受与未来的憧憬以白居易自况的情况，萨进德翻译与分析了这些作品。在读了白居易的集子后，苏轼说自己与白居易出处去就大略相似，希望自己也能复享白居易晚年的闲适之乐。根据萨进德的分析，苏轼被贬黄州后经常自号“东坡居士”，但1087年后，在诗歌里他不再用“东坡”这个号，可能是因为他不愿再提及自己被贬后重新回朝的经历。相反，苏轼的号可以说是由他或以学士的白居易自居，或以退隐的白居易自喻。

萨进德文章最独到的地方是讨论了苏轼为曾

给他画像的画家李得柔所作的诗。在这首《赠李道士》诗中，苏轼暗用了白居易的一首诗，白居易在诗中比较了他作翰林学士时的画像与退隐后在香山寺的画像。在苏轼的诗中，白居易二者兼有，学士与隐士融为一体。据萨进德的观点，苏轼以白居易自况表明他在两个世界中徘徊，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但在心理上这两个世界又同时存在。这也是苏轼对白居易进退两难窘境的理解。但苏轼却以“道根深”来表达其隐退的期望。萨进德还强调，无论进退，苏轼所指的道都不是儒家、佛家或者道家的命题，而是世缘的反语（风波地与铁石心）。虽然苏轼在有些情况下，尤其是贬谪岭南时都自比于白居易，但萨进德只是简略谈及苏轼在1089年希望能去杭州与白居易在822年请求任职杭州，这是苏轼又一次把自己比作白居易，因为二者都是为了远离世缘。

在《苏轼的和陶诗是文学的还是心理的标志》中，戴维斯首先从苏轼诗与陶诗中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比较。作者认为：苏轼早期的和陶诗相对说来是个人心理的表现，而晚年贬官海南时的和陶诗则是重于文学创作；苏轼对陶渊明的极大倾慕是着眼于陶的文学和为人两方面的；由于苏、陶二人在时代、经历和性格等方面差异，苏轼的和陶诗并不是对陶渊明的简单追随和模仿，而是他个人文学修养和人格的自然流露。

此外，还有任杰威的一篇硕士论文《初谈苏轼〈和陶诗〉》也对苏轼的和陶诗进行了阐释和分析，特别是苏轼的《和陶饮酒二十首》。

苏轼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已成为世界文坛上令人瞩目的人物，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都对他进行深入研究。虽然一些传统的汉学家会认为这

些比较有些牵强，但对于那些喜好中西文学以及文化比较的学者和读者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杨文森的《自然与自我：苏东坡与华兹华斯诗歌的比较研究》是比较文学的成果。书中将苏轼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两位诗人都有从“此岸的红尘世界”向“彼岸的超然世界”转换的特点，他们都在各自的诗歌传统中发展出一种新的感受力，在文学理论、技巧及风格方面也都有新的建树；他们都从大自然中感受到自我超脱的自由和愉悦。该书对苏轼描绘自然景物的诗篇作了较多的介绍和研究，探讨了苏轼诗词中佛、道思想日益增长的倾向。

还有一篇博士论文《不语诗与无形画》也从比较文学的角度通过对一些典型作品的分析来探讨苏轼与意大利全才达·芬奇在绘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并指出二者在诗歌与绘画理论上的不同之处。

张隆溪在一篇论人生的痛苦的文章中，将苏轼与西方几位古典作家作了比较和对照，张氏从三位作家著作中挑选出一些作品试图说明这种“互文性的阅读”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文本本身的理解，而且可以深化我们对“人类痛苦”这一主题的理解。

张氏在2000年3月美国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的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人类痛苦的思考：苏轼与波伊提乌和弥尔顿的对话》的文章。痛苦作为人类的一种共同经验，它的普遍存在导致了全世界许多伟大作家对之作种种思考。文中选了苏轼的名篇包括《赤壁赋》，张氏从作品的体裁、作品中哲学思想藉以表达的方式等方面对这些作品作了分析，他的结论是：苏轼采用了“多面观”的方式来证明忧伤和欢乐、变化与永驻、悲观与乐观仅仅是对人生的不同视角而已，在这方面，他同时引用了苏诗《题西林壁》中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来说明这种观点。在对17世纪英国作家弥尔顿的讨论中，张氏选了两首诗相互对照，这两首诗也显示出一种“多面观”。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读，则读者会感到在面对人生的困境时，人既可以悲观也可以乐观。

另一方面，张氏却证明：在弥尔顿的巨著《失乐园》中，弥尔顿转向用上帝的安排来为解决人生

的苦痛提供一种安慰。公元6世纪的罗马作家波伊提乌，其遭遇也与苏轼颇为相似。他也同样经历了流放和贬谪，但他却更多地从对上帝的热烈信仰中寻求慰藉，而很少诉诸哲学。像苏轼那样从自然中寻求安慰，寄情于山水，在波伊提乌看来是求助于身外之物。

通过对这些作家、作品的比较，张氏把苏轼放在了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苏轼完全可以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理解和欣赏。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不难看出，西方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探讨苏轼著作，并总是特别强调苏轼的某一侧面。毫不奇怪，因为苏轼在看到他的水中面容被粼粼波纹“散为百东坡”时，就已经意识到他自己的多面性。正因如此，对苏轼生平和作品的这面或那面的强调很可能还将继续下去。但至少在这个时代，欧洲和美国那些不懂中文的读者都知道苏轼的生平和主要作品的概貌。

苏轼研究近来已成为西方汉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得到证明：一是有很多直接和间接涉及苏轼的著作和论文出版发表；二是地方性和全国性研讨会常以苏轼为讨论的主题之一；三是近25年来有好几篇博士论文以苏轼为题，最近几年，甚至有硕士论文也把苏轼作为研究的对象。去年，美国一所知名的大学还开设了专门讨论苏轼及其作品的一门课程。

西方学者的努力使苏轼日益成为国际性的人物，在这一点上，用西方语言出版著作的华人学者所作的贡献尤其值得重视。由于尊崇苏轼的创造性天才，他们已在翻译、介绍以及讲授这个重要中国人物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并将继续在此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随着中国和西方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各种国际性学术会议的日益增多，可以相信，在21世纪，苏轼的作品在西方将更加流行。苏轼作为一个有趣的人物，他总是在不同时代里引起不同的论题，受到不同的强调，正因为每一代人都对苏轼研究提出新的论题，所以新的理解总会不断发生。苏轼的多面性将继续激发出各种独特的学术成果，因为从“散为百东坡”中不可能只捕捉到一副单一的面容。

（美国西华盛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苏东坡的政治人生（第一章）

雷金贵

编者按：本文作者怀着对苏东坡的敬爱，集十余年的研究心得，以散文的笔调，叙述了苏东坡波澜壮阔的政治人生，从本期开始连载全文。

第一章 苏轼原来不是纯粹的文学家

一 《苏轼传》里的苏东坡

华夏多文士，千古一东坡。

不止一个人这么说。

不止现在人这么说。

我也长时间这样认为。

古之人广泛流传，今之人随声附和，有意无意，就把东坡的身份固定了，叫文士或叫作家，豪迈一点，称为文豪，再豪迈一点，赞为大文豪。的确，东坡诗文，从小学到大学，语文课本里，或由老师讲授，或者学生自己阅读。《饮湖上初晴后雨》、《题西林壁》、《赤壁赋》、《后赤壁赋》、《喜雨亭记》、《念奴娇·大江东去》、《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等，一代一代人，都耳熟能详。

文士东坡，可谓深入古今之人心。

东坡故乡之故宅，眉山三苏祠，大门口的一副楹联，为朱德元帅所撰，曰：“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元帅拜谒三苏祠，感慨不已，留下一首五言绝句，这是起首两句。后两句为“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这样的文辞，还很多，我读过一本书，叫《历代名人吟东坡》，从东坡的同代名人，至于当代名人，不可胜数。

但是，我读《四库全书·宋史·苏轼传》，感觉却很怪，我们津津乐道的文豪苏轼，《苏轼传》竟是轻描淡写的。

为什么？

大量的篇幅，所记所载者，乃其政治之主张、政治之态度、施政之政绩、从政之声誉。

又是为什么？

之前，我读过一些苏轼文选的本子，简化字的本子，介绍苏轼，“苏轼反对变法，政治上是

保守的。”几乎都这么说。这是政治定性。我等二十世纪的60后人，从课堂上书本上认识的苏轼，就是这个自身矛盾的苏轼：文章写得好，政治很落后。不是又红又专的人。是个专而不红的人。2008年的某个时间里，有人在央视的《百家讲坛》讲苏轼，也是这个观点。这个讲坛，捧红了很多人，讲《论语》的于丹，讲《三国》的易中天，等等，好象还掀起了一股国学热。这个讲坛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因为如此，主讲人的观点，流传就相当有市场。后来我读一些文章，找到了这个观点的来龙去脉，上个世纪的“文革”里，有一批人，为了迎合，把商鞅搬出来，把王安石搬出来，作为法家的代表，作为革命的代表，那个时候，革命很时髦。而苏轼，则是商鞅的敌人，是王安石的敌人，是儒家的代表，是保守的代表，是被革命的对象，是要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的，永世不得翻身的。某个寺庙，苏轼当年停留过，留了诗——他走过的的地方，几乎都留过诗——也被开了批判会，被写了大字报，主题是打倒反革命两面派苏轼，《漫话东坡》的作者所亲见，应该不假。

苏轼的政治、政绩、政声，在《苏轼传》里，和我先前所知道的，竟是颠覆性的，不仅都是褒扬，而且浓墨重彩。传文的作者，不惜篇幅，援引其《论学校贡举状》、《上神宗皇帝书》，张扬苏轼的政治主张，政策方略。传文对苏轼一生的评价，不仅仅是文学大家——

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守，皆志与气所为也。

苏轼原来不是纯粹的文学家。

因为如此，我就广泛阅读。

无数的信息，海量的贮存起来，闭上眼睛，眼前是一组一组的画面，连续不断的画面，或推拉，或摇移，或俯仰，或超大的全景，或细致的特写，场景或恢弘抑或简洁，或和婉抑或凄清，

或闹热抑或寂寞，或洒脱抑或悲壮，苏轼就行走在这些场景里，居然没有时空的阻隔。

我有了写下一些文字的冲动。

就写苏轼的为政。

不想以时间为序，也不想以事件为序，我想写得自由一些，预备以散章的方式，写政治风浪里的苏轼，它最看得出一个人的品质、德行、操守，也才探寻得到苏轼灿烂文章的活水源头。

睁开眼睛，写下这个题目。

二 笑问汝为谁

苏轼，我们更习惯称为苏东坡，这样叫法，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苏东坡是个好动的人，脚总是闲不住；屁股上好象长有刺，总坐不住。小时候，就好在郊外踏青，好赶蚕市。年纪稍长，足迹已经遍及故乡眉州，以及临近州府的名园古刹，在栖霞寺的连鳌山，与一帮意气风发的同年，联诗游戏，以帚为毫，写下屋宇大的“连鳌山”，至今如故。在先有中岩后有峨眉的中岩寺，留下了唤鱼联姻的千古佳话。登峨眉山，攀瓦屋山，体验出“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的经典；阅乌尤山水，读乐山大佛，留下凌云载酒的豪情。至于走出四川盆地，更是在我闭上眼睛也十分清晰的无数场景里，风雨兼程，走得铿锵锵锵，走得洒洒脱脱，走得无畏无惧，走得——历史都被震撼了，从西而东，由北往南，把北宋王朝的版图几乎要走遍了。

苏东坡，我的乡亲先贤，眉山的乡亲先贤，一千年了，我们一直热爱着。我们热爱的程度，很深厚；我们热爱的感情，很诚挚。我们——蜀中的眉山——东坡故乡的人民，一直在力图打造一个金字的品牌——以东坡命名的文化。“东坡老家，快乐眉山”，就是眉山对外宣传的核心词。而且不仅我们，但凡苏东坡走过的地方，甚至没有去过的地方，甚至在海外，一千年了，人们都还在念叨着他，纪念着他，热爱着他；而且，热爱的程度，是在与日俱增。甚至在1998年，法国的《世界报》，评选出影响世界一千年的12位英雄人物，来自东方的九百多年前的苏东坡，竟然赫然在列。

苏东坡，竟然不受时间的限制，也不受空间的限制，与人会面，与人交流，与人畅谈，与人结为不知多少代的忘年之交。从公元999年到公元1999年，我们和苏东坡，活在同一个一千年里。

现在，我们外出，公干或者私游，说从眉山来，别人多疑惑，眉山在哪里？眉山的知名度，实在太小。我们换一个说法，从苏东坡的故乡来，

别人便恍然。2009年3月上旬，我去经济改革前沿的深圳，到一家上市公司考察学习，我们与这个公司的业务部门作了联系，想与他们作业务交流。出乎我们意料，公司的老总来了，向我们介绍经验，十分热情，毫不保留。上市公司的老总，多忙的人呐。公事之后的闲聊，他说他到过眉山，拜谒过三苏祠，尤其他说，他是苏东坡忠实的粉丝，让我们一下就没有了距离。哦哦，原来是因苏东坡，苏东坡故乡来的人，苏东坡的忠实粉丝，就是一家人嘛。

哦！苏东坡！

大浪淘沙，一千年了，多少风流人物，已被风吹雨打去。而先贤东坡，竟还让人一直的仰望着。

苏东坡不仅是个文士。

是的，他留下的名篇文章经典诗词，让一代一代的后来人受用无穷。但是如果我们只认识文士的苏东坡，如同盲人摸象，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苏东坡。单纯的文士，不可能成为一名真的文士。文士的身后，有一大片文士以外的世界。

苏东坡是丰富多彩的。

林语堂是深入了苏东坡诡云谲的世界的，他为苏东坡总结了十几个身份后，诸如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悲天悯人的道德家，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散文作家，新派画家，伟大的书法家，酿酒的实验者，工程师……等等之后，赶紧说了一句话：“可是这些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文士就更不是苏东坡的全貌。

公元1091年8月，秋意正浓，56岁的苏东坡，逃离嘈杂的朝廷，出知颍州。他已然在北宋的庙堂之上，以及江湖之远，历练了三十余年，虽是弹指一挥间，却是感慨万千，到官仅仅十来天，有九天是在颍州西湖度过的。

苏东坡所到之处，总是有水相伴，或者是河，或者是江，或者是湖，或者是海。

水是透明的。

苏东坡是透明的。

我性喜临水，得颖意甚奇。

到官十来日，九日河之湄。

吏民喜相语：“使君老而痴。”

使君实不痴，流水有令姿。

绕郡十余里，不驶亦不迟。

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

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

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

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

此岂水薄相，与我相嬉嬉？

声色与臭味，颠倒炫小儿。

等是儿戏物，水中少磷缁。

赵陈两欧阳，同参天人师。
观妙各有得，共赋《泛颖》诗。
——《泛颖》

这不是一首游水观景的诗，已然经历了个人的出生入死，已然经历了世事的云翻雨覆，如同这透澈的颍州西湖之水一样，苏东坡已然把北宋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自己也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苏东坡是为自己作了一个小结：无论经历和收获，苏东坡都是丰富的，所以散为百东坡；但苏东坡又是纯粹的，我就是我，所以顷刻复在兹。

散为百东坡的东坡是什么样子的东坡？
顷刻复在兹的东坡是什么样子的东坡？
换为林语堂的问话：“一千年，为什么中国历代有那么多人热爱这位伟大诗人？”
这的确是个问题。

我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寻找文士以外的苏东坡。

我想，如同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只要愿意，都会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苏东坡，而且以自己的方式，画一副属于自己的东坡画像。

三 晦明风雨不改其度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我们常常把它们拿出来，与世界说事。除了唐代发明的造纸术，其余三项，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就赫然诞生在北宋。北宋的的确是可以因此而笑傲世界的。让人郁闷的是，这些傲视世界的发明，并未一鼓作气，转化为先进生产力。所以北宋没有飞机可以朝发午至，没有专列没有服务员周到的侍候，有马车或者木船，大多数的时候，走的是一双脚，苏东坡几乎却把北宋的版图走遍了。

苏东坡不是旅行家，不是去观风赏景，不是去览山阅水，不是去体验生活，说起来，历史都会感到汗颜，要么是被贬谪流放，要么是不堪高堂之嘈杂而再三请外。

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
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
形容虽似丧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
——《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

不以穷达而移志的苏东坡，他居然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为了老百姓买卖自由，为了老百姓税赋合理，为了老百姓少受榨取，为了老百姓少受欺凌，一句话，为了老百姓的生活，为了老百姓天天要过的日子，而不随从老子天下第一的皇帝，而不苟且于朝廷，而不随波于当权者，而不出卖自己的信念，或主动请求外放，或被打击贬

谪，之所以，他才走得“一蓑烟雨任平生”——他的这句诗，伴随了他命运多舛的一生——浮沉坎坷，然则荡荡坦坦，无怨无悔。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

公元 1082 年，贬谪黄州三年时，四十七岁的苏东坡，写下了这首词。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背景交代得很清楚，但是，这当然不仅仅是自然界的一次风雨感慨。道说眼前景象，曲笔而言胸臆。在此之前，不要忘记了，“乌台诗案”——北宋为苏东坡“创造”的文字狱——险些让他丢了脑袋，虽然挂着名义的官衔，黄州团练副使，其实是被“监外执行”了。如此境况，苏东坡居然还是一派“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淡淡定定，一派“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从容从容，一派“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铁骨铮铮，一派很是“死不改悔”的凛然形象。

吾闻君子，蹈常履素。
晦明风雨，不改其度。
平生丘壑，散发箕踞。
坠车天全，颠沛何惧。
——《孟嘉解嘲》

好一个不同凡响的苏东坡。
好一个不摧眉折腰的苏东坡。
好一个堂堂正正的苏东坡。

苏东坡，以诗文“讪朝政，谤皇上”之罪，而被逮捕入狱，却在贬谪黄州的途中，居然还是依然故我，写他不平则鸣的“抗暴诗”。

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
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

——《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女图》

一个封建时期的士大夫，才因此而入狱，又在贬谪途中，继续的揭露，继续的批判，除了真理在握，而且忠于真理，不改操守，任何解释的理由，都是苍白的。

苏东坡因为无私，所以他无畏。

不畏皇帝的威，不畏当权者之势，不畏小人得志者的猖狂。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初到黄州》

本身行为不端，本身欲壑难填，本身肮脏不堪，本身蝇营狗苟，可以假装一时正经，但终究是经不住拷问的。苏东坡，站在“以民为本”的立场上，是国家基石也是民族基石的广大民众，所以他不怕，所以他理直气壮，所以他很坦然泰然，所以他很自然自如，所以他笑看风云淡。

这就是苏东坡！

这才是苏东坡！

四 难以追陪新进

有些热爱苏东坡的人，说到苏东坡遭遇的“乌台诗案”，总是为苏东坡抱屈，总是为苏东坡鸣不平，谴责那些政治小人，在苏东坡的诗文中断章取义，攻讦他，诽谤他，陷害他。这样的心情，这样的动机，看不得俊人身上的丑一样，实在是好的，但是却生生的把历史的事实弄错了。那些政治小人，扣在苏东坡头上的帽子——讪谤朝政之昏弊也罢，讥讽“新法”之祸害也罢——除了那首《桧树》，皇帝都说举报者牵强得荒唐，皇帝是要维护自己的龙颜；我看却未必，苏东坡满怀抱负，但是无处施展，他要向皇帝吁请，当然，忠君爱国的苏东坡，绝没有象举报者说的那样，要谋反，要另立皇帝。考察那些举报，一是一，二是二，还都是事实，一点都没有冤枉苏东坡。

黄州之前，苏东坡已经有了相当的经历。

公元1068年，十二月，寒风冷雪里，家事国事，都发生了骤变。苏东坡居父丧期满还朝，带着续弦的妻子，原配的堂妹，名谓王闰之，苏东坡后来的坎坷岁月，她陪伴了大半。他的结发妻子王弗，已在三年前抱病而逝，苏东坡是把妻子的灵柩和父亲的灵柩一起，一船两灵柩，扶送回眉山老家的。后来的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苏东坡已经是密州的太守了，正月二十的夜里，苏东坡梦见了王弗，为她写下一首荡气回肠的词章：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五月，苏东坡的原配王弗，二十七岁英年早逝，她十六岁多与苏东坡成亲，以实年计，他们相伴了十年，今又死别了十年。前一个十年，小两口情深意笃，恩恩爱爱，小日子过得幸福有加；后十年，在熙宁新法的浪潮里，苏东坡饱受陷害打击，政治上极度苦闷。此词，名曰记梦，其实渴望家和国的温情港

湾。所以，它其实不是悼亡词，是爱情诗。而此诗一出，所有的爱情诗都相形见绌了。苏东坡对他的三任妻子，都爱得极深。在他不同的仕途时期，每一位妻子，给予他无限的理解、支持、帮助。

还是回到1068年的寒冬，苏东坡已经三十四岁了，从二十四岁进士及第，十年过去，岁月蹉跎，满腹经纶，还没有落实到真的舞台上。父母和妻子，已在故乡安息，所以这一次离开故乡，苏东坡走得很彻底，他是预备着把以后的岁月，全部交给朝廷的。

然而，朝廷的天已然变了。

皇帝不是叫做天子么，天子都换了，天也就变了。

十分赏识苏东坡才华的英宗皇帝，龙椅都还没有坐热，就呜呼而去了。

所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那是臣子们集体献给皇帝的新衣。皇帝也乐意穿上这件天花乱坠的新衣。而且不止一个皇帝。而且不止中国的皇帝。

仁宗皇帝之后，北宋和南宋，皇帝的命都不长，风流的徽宗稍微例外。在中国的历史上，皇帝无不追求万寿无疆，求神者，拜仙者，炼丹者，不可计数，而长寿者，实在屈指可数。是皇脉的基因出了问题，还是御医们耍了手脚，还是后宫的佳丽粉黛耗尽了他们的阳气。这里的想象空间，很大，很玄机。也很有戏眼。

神宗皇帝，君临天下。

这是一位年轻的皇帝，一位有理想的皇帝，却急于有功，以示君威，以示君恩。

治平年号，已经被熙宁取代，同样激进的王安石，终于等到云开雾散，登台亮相了。

所以人生，离不开机遇。机遇者，可遇不可求，失而不可再得。

王安石曾经给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却被老到的仁宗皇帝束之高阁。这有两种可能，其一，老皇帝不欣赏王安石的变革方案。其二，老皇帝老了，不想给大宋动手术，那是儿孙们的事情，子孙自有子孙福，子孙自有子孙事，所以他启动了庆历新政，又迅速的腰斩了庆历新政。王安石就一直蛰伏下来，韬光养晦，等待机会。而现在，机会终于来了，而且已然势不可遏。欧阳修，古文运动的领袖，苏东坡的恩师，已经退隐林泉；富弼韩琦等一批忠臣，正在靠边。一批急功近利之徒，趁势而进，一两年间，整个北宋的组织人事，几乎全部重新洗牌。苏东坡到任湖州后，按例所上谢书，说得很明白：“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察事，或能牧养小民。”

北宋王朝，已是黑云翻墨，山雨欲来。

景苏札记

王安石借助急于有功的神宗皇帝之手，神宗皇帝打出王安石这张激进的牌，以极迅猛之势，朝议暮出，迭出新法，朝局动荡，社会骚然。

在一批重臣的发言权被削减后，三十出头的苏东坡，知无不言，全力抗争，与神宗皇帝，与王安石，与朝廷，不但没有用，甚至还让皇帝生厌了，终于遭遇围攻、弹劾、入狱、贬谪。

皇帝的出尔反尔起了致命的作用。

变革科举，年轻的皇帝吃不准，一直犹疑不决，于是诏求直言。苏东坡有话要说，他的官位还小，不能直接给皇帝说事。现在，皇帝诏求直言，苏东坡遂上《议学校贡举状》皇帝看了很受用，殿见苏东坡。

皇帝摆出虚心听取意见的姿态，让苏东坡放言：如今的政策是否对头，即使是我皇帝个人的过失，你都可以批评。

苏东坡是个率真的人，他果然就很不客气，批评了皇帝。苏东坡说，变革是没有错的，而且不能不变革，而且必须要变革，但是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史说，听了苏东坡的慷慨陈辞，神宗皇帝一时肃然动容，还说了一番鼓励苏东坡的话：“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

神宗皇帝殿见苏东坡，很让人猜想。年轻的皇帝，晓得老爷子的政治遗嘱——苏东坡兄弟，是老爷子为子孙选拔的宰相人才。现在，老臣们不顾皇帝的眼泪挽留，纷纷离开了朝廷，新法的急速推进，正当用人之时，皇帝或许是要通过面试方式，起用苏东坡。但是，苏东坡的想法，却与皇帝不在一条道上。面对苏东坡的无情批评，皇帝的肃然动容，或者是强压了心中的怒火，口头上，却给苏东坡一颗酸甜的糖果。

苏东坡却很兴奋，以为皇帝金口玉言，驷马难追，神宗熙宁的乱象，或将因皇帝的动容而止了。苏东坡真是个天真的人，以为人人都象他一样，率直，坦荡。苏东坡懂得世俗生活，却不懂得官僚的官场。皇帝召见了苏东坡，王安石已经知道了，也晓得了苏东坡对时政和皇帝的批评，也知道了皇帝对苏东坡的鼓励，王安石很不高兴，皇帝要把苏东坡招到身边工作，王安石坚决反对；皇帝再与王安石商量改革的事情，王安石依然坚持己见。皇帝没有办法，只得听从王安石。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一言九鼎的皇帝，要么是迷糊了，要么是个傀儡，才可能听人摆布，而神宗皇帝是有想法的，却不能自己决断，整个变革的过程中，从熙宁到元丰，十八年里，几乎都被重权在握的大臣牵着鼻子走，最终因为轻信一地方官的《平西夏策》，贸然出兵西夏，吃了耻辱的败

仗，郁郁而送命，万岁的皇帝，竟在三十八岁的英年，呜呼哀哉。

神宗皇帝其实是死于一个阴谋。阴谋策划者，是时为宰辅的王珪、蔡确。当时，神宗皇帝已经准备起用司马光、苏东坡等旧人了，而且为他们预备了位置，皇帝要安排苏东坡做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王珪、蔡确害怕司马光苏东坡等回朝，为了转移皇帝在人事上的注意力，由蔡确授意，庆州知州俞充的《平西夏策》就这样出笼了。

神宗皇帝其实一直没有忘记苏东坡。

然而，在当时的情景里，皇帝动容了苏东坡的“三言”，却又不采纳他的建议，任由王安石我行我素。

神宗之前的宋皇帝，出尔反尔是有传统的。宋太祖赵匡胤，与后周世宗是出生入死的战友，世宗刚死，他领后周小皇帝之命，继续收复燕云十六州，却在陈桥密谋，变了后周天下。而且，害怕失去不正当而得的天下，撕毁了与将军们达成的誓言，“杯酒释兵权”。宋太宗更毒，忘了要听哥哥的话，居然弑兄篡位。真宗皇帝，同意寇准建议，御驾亲征，收复燕云十六州，走到澶渊城，将士斗志昂扬，辽之主将被击毙，正可以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真宗却不打了，不顾寇准再而三的劝谏，与辽议和。澶渊之盟，让北宋之广袤北方，失去了长城的坚强屏障，所以宋太祖时，就一直想把京都从开封迁往洛阳。宋仁宗，把范仲淹调回朝廷，主持庆历新政，刚刚开始，就把新政夭折了。

所以神宗皇帝再来出尔反尔，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苏东坡是个实在人，把皇帝的温谕牢记在心，虽然他只是一个八品小官，虽然他以小官而横议国是已经遭人嫉恨，但是苏东坡仍然忍不住要说话，这一次，熙宁四年公元 1071 年二月，他言之切切的《上神宗皇帝书》，一篇三千多字的长奏：“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为什么要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怎么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苏东坡条分缕析，把一颗心，掏给了皇帝，极力建议神宗皇帝，切勿求治太急，切勿任用小人，如果这样，祸害无穷。

后来的事实，无情的证明了苏东坡的预见和判断。

古人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王安石变法，涉及面很广，变革的方略，却没有经过广泛讨论，更没有取得大多数支持，一开始，就埋下了乱象的祸根。又被小人钻了空子，整个神宗朝，熙宁十年，元丰八年，前后十八年，王安石两进

两出之后，朝政就被把持在了王珪、吕惠卿、蔡确之流的手中。

三月，他忍不住《再上神宗皇帝书》，锋利的矛头，直指那些投机钻营的小人，和皇帝本人，和新法本身。当时是，朝廷派出若干钦差大臣，考察新法的运行和效果，这些人几乎都是马屁精，回来后，全都睁着眼睛说瞎话，只报喜，不报忧，把新法的推行，说成久旱逢甘霖的及时雨，把新法的结果，说成天下人都满意的天花乱坠。

苏东坡奋不顾身，说得十分严厉，“而近日之事，乃有文过饰非之风，此所以愤懣而太息也。”他甚至把骤然推行的若干新法，比喻为一副胜过一副的致命毒药，而且愤怒的指责皇帝和当权者，你们明知是毒药，还要用老百姓的生命来做试验。

时局的发展，令苏东坡痛心疾首，他不管不顾了，把枪口对准皇帝本人，“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苏东坡说的很毒，历史已经证明，是神宗朝的新政，把北宋进一步的推进了积贫积弱的深渊。

苏东坡两上皇帝书，极论国是，说的有些话，足可以杀头的，皇帝没有杀他，是因为皇帝自己说过，要苏东坡“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皇帝不好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但是神宗皇帝心中并不舒服，拥有天下的皇帝，肚量大的没有几个——我堂堂的皇上，天都是我的，地也是我的，你小小一个苏东坡，却要来处处与我作对，事事唱我的反调，我的金銮殿还坐不坐。

关于朝政，苏东坡极尽心，总会以自己的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公元1057年，苏东坡以殿试前两名而高中进士，还没有踏上仕途，因母亲在蜀中老家溘然长逝，按大宋律，苏东坡回乡为母宾丧三年。公元1058年，苏东坡以在籍进士身份，向知成都的龙图阁学士王公仪进言，希望他能够在蜀中民困已久时，借此机会，解蜀中百姓赋税之沉重，救蜀中民生之艰困。有宋以来，宋廷治蜀，施以苛政，王公仪虽然有心，但是却无力。因为苏东坡的建议，让他认识了这位初出茅庐的后辈，而且极为赏识，并让他的儿子王巩拜苏东坡为师，“从轼问学”，王巩与苏东坡，从此成为患难与共的知交知己。“乌台诗案”后，王巩因收藏有苏东坡的诗词而获罪，而被贬谪，至于比黄州更远更偏僻的滨州。如果说苏东坡是主犯，王巩只能是从犯，而从犯所获的处罚，竟然比主犯还重。

但是此时的京都朝廷，不是成都的知州府，王安石也不是王公仪，而且还有神宗皇帝，还有一批急进的新锐，八品官的苏东坡，声音实在太微弱。无休止无意义的朝廷论争，后来人谓之所谓“党争”者，让苏东坡很厌倦；其实，这一次

的朝廷论争，是以新法为焦点，是与非，为的还是大宗本身，而后来的元祐之争，就成了纯粹的政治斗争。

此时，朝廷惟王安石是瞻，有人借机奏苏东坡的本，说苏东坡“穷治无所得”，苏东坡不予辩论，请求外任。该说的都说了，再说下去，还是白费口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与其如此，还不如到基层去，做些事情。皇帝和当权者，也正好有了冠冕的理由，把这个知无不言的人，把这个言无不尽的人，把这个多嘴多舌的人，弄出朝廷去。

苏东坡于是通判杭州，然后知密州、徐州、湖州，然后是“乌台诗案”，时光流水，白驹过隙，竟然八、九年。有意思的是，十多年之后，苏东坡为躲避元佑“党争”，连章请郡，太皇太后也就是英宗皇帝的皇后，深知苏东坡内心的苦楚，无奈的准许了他的请求，去的第一站，也是杭州。

苏东坡与杭州很有缘分。

这期间，由王安石引发的“新法”，席卷北宋。

风暴的最后，王安石自己都不曾料到，自己扣动的扳机，却把自己击中了。王安石二次还朝，熙宁“新法”至于九年时，公元1076年，王安石被自己一手栽培提拔的得力干将吕惠卿，一个很阴险歹毒的小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拿出王安石与其私人通信，其中有不要皇帝知道的言论，那是一颗致命的子弹，一枪射出，命中了王安石的要害，打得王安石血咕叮当，而被神宗皇帝扫地出门，下放到金陵，且从此，居然再未还朝，在金陵寂寞的山林间，骑驴寻诗，从闹哄哄的朝廷，到冷清清的山林，寥落度余生。

对王安石来说，很黑色幽默吧。

对大宋王朝来说，加重的是积贫积弱的深度和力度。

五 以曲折的方式为百姓代言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7月，三十六岁的苏东坡，携家带口，走出京城，前往杭州。一路之上，拜谒世交张方平、恩师欧阳修，与弟弟苏辙一家团聚，走走停停，直到十一月底，才抵达杭州。杭州任满，然后知密州、知徐州、知湖州，八年多里，苏东坡行走于江淮水乡，施政于齐鲁大地。

一路走来，新法席卷，农民破产，工商业萎缩，老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日子过得极艰难。

苏东坡是个看中过日子的人，日子过得不好，他当然要说话。

景苏札记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山村绝句》

古稀之岁的山村老翁，不是满腹经纶的孔夫子，可以很高雅的赏《韶》乐，而三月不知盐滋味。山村的老翁，很凄惨，很无赖，三个月了，没有尝到盐巴的味道了。百味千味，盐是第一味。人是离不开盐的，但是老翁买不起盐。“新法”由朝廷垄断盐业生产，垄断盐业经营，贱买贵卖，目的在于要多多的收钱，想着一切的法子多多的收钱，以富有朝廷，“盐价既增，民不肯买”。盐巴都买不起了，这日子还如何过法。

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栏归期无。
一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棰环呻呼，追
胥连保罪及孥。

——《李杞寺丞见和〈腊月游孤山〉
前篇复用原韵答之》

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
但叫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

——《山村绝句》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山村绝句》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叫斥卤变桑田。

——《八月十五看潮五绝》

王安石的干将们，在弹劾苏东坡的奏章中，指责这些诗攻击皇上和新法，而且一一的解读，生怕皇帝太弱智，搞不明白苏东坡是怎样以文字为武器，发出攻击的。其实神宗皇帝很喜欢苏东坡的文字，常常读得废寝忘食，读得感慨万千。那些得志的小人，真的不弱智，看得很明白。

皇帝并不比那些小人弱智，只是各人所取不一。

这样的诗词，如《戏子由》，如《吴中田妇叹》，如《鱼蛮子》等等，还很多，苏东坡从杭州，一直写到远谪之地的海南，黑白分明，指向明确，一点都不含糊。这自然也就成了把柄，如同指控者一一分析的那样，苏东坡讽刺新法，讪谤朝政，讥斥先帝。

这样的罪名，全都是可以把脑袋从肩膀上搬下来的。

苏东坡其实做得很光明，很磊落，很阳光，他写这些抗暴的诗词，完全不是在抒发牢骚，他是在写实，用现代流派划分，苏东坡的文字，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流派。他其实以这种曲折的方式，为百姓代言，因为如此，翻阅他在这个时期里，一而再，再而三，他同时在向朝廷报告，也同时在向皇帝上书奏章，对民间的疾苦，对百

姓的艰难，同样毫不隐瞒，一五一十，实话实说。而他的奏章，要经过若干的关口，而把关的人，多是新法的既得利益者，或许就被扣押下来了，所以他要用诗歌来散布。

但是，皇帝，以及当权者——王安石提拔的那些政治小人，可听不得这样的反调。我在莺歌燕舞——“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管弦，暮列笙琶。”这是皇帝做得最昏庸、却是艺术天才、又最好寻欢作乐的宋徽宗，在做了俘虏后，还不忘当时的奢侈排场，而苏东坡却来大声的断喝。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历史上，君子哪里搞得过小人，权重一时的王安石都被修理了，何况苏东坡，朝外的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居然还要发扁言，这还了得。

即使已经风烛残年，被远贬惠州，他依然在写。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
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酌伯游。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疣。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

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爱，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
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荔枝叹》

承认苏东坡写了那些抗暴诗，承认了苏东坡的若干诗文，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才能真正的认识真正的苏东坡。真的诗文，无不根植于现实生活，真的诗人，无不生长于现实生活。

苏东坡这些诗，已经背叛了诗。后来的不少理论家，比如严羽，比如王夫之，都是著名的理论家，他们批判苏东坡的诗，背叛了传统诗歌的“吟物言志”的宗旨。理论家眼里，只有空洞的物，虚幻的志，他们的眼里，没有生活。苏东坡却从生活出发，为文，为人，为政，生活有问题了，他就要不平则鸣。不是他个人的生活，而是更多人的生活。

不平则鸣，当然就要惹祸。因为你的鸣响，让别人的耳朵不舒服。

黄州，不是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开始，也不是结束，只是其中的一站。

但是苏东坡却是做好了准备的。（待续）

（眉山市广播电视台副局长）

“全国第 16 届苏轼学术研讨会”欢迎词

段 雄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朋友们、同志们：

今年是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 29 周年，也是苏轼离别徐州 930 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徐州有幸承办“全国第 16 届苏轼学术研讨会暨全国苏轼遗址景园旅游发展论坛”。在此，我谨代表徐州市人民政府向参加本次活动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徐州古称彭城，为华夏九州之一，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有 5000 多年的文明史和 2800 多年的建城史，是上古养生学家彭祖的故国、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故里、西楚霸王项羽的故都，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和商贾云集之所。徐州现辖 2 市 4 县 5 区，总人口 950 万，2008 年全市 GDP 达 2007.4 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实现 125.9 亿元，在中国城市最新经济实力排行榜中名列第 38 位。徐州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科教兴市先进市、全国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也是江苏省重点建设的四个特大城市和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之一。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的旷世文化巨人，他以辉煌的文艺成就、深邃的哲学思想和伟大的东坡精神，开创了独特的东坡文化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神宗熙宁十年，即公元 1077 年 4 月，苏轼自密州转任徐州知州，由此和徐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徐州人民热爱苏轼、纪念苏轼，不仅因为他是历史文化巨人，更因为他具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勤政爱民、富民强国的政治家胸怀。在任徐州知州期间，他关注民生，体恤民情，抗洪水、筑堤坝、劝农桑、掘煤炭、兴冶铁，行迹和政绩深深地印刻在徐州大地上。勤政之余，他还写下了 330 多篇描绘徐州风土人情、

讴歌彭城山水的诗词文，给徐州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纪念苏公的丰功伟绩，丰富徐州旅游资源，近年来，我们紧紧抓住苏轼历史文化这条主线，累计投资 12 亿元，将云龙湖风景区和故黄河风光带建设成为全国面积最大、景点数量最多的苏轼文化游览区。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徐州的苏轼文化游览区整体文化生态环境还不如杭州西湖，美誉度和知名度还不如黄州东坡赤壁，苏轼文化氛围还不如四川眉山。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盛会学习苏轼文化兄弟城市的经验，再接再厉发展好苏轼文化旅游景区。

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同志们，这次学术研讨会和旅游发展论坛的召开，对传承东坡精神、弘扬传统文化、发展旅游产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相信随着本届研讨会的召开，苏轼文化兄弟城市的交流与合作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我们将借此机会把苏轼曾经为之奋斗过、付出过心血的古城徐州，建设成为经济发达、科技进步、文化繁荣、环境优美、社会文明和谐的现代化新徐州。

最后，预祝“全国第十六届苏轼学术研讨会暨全国苏轼遗址景园旅游发展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各位！

2009 年 9 月 9 日
(徐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全国第 16 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张志烈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全国第 16 届苏轼学术研讨会暨全国苏轼遗址景区旅游发展论坛”今天在这里召开。我谨代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向不远千里万里光临会议的专家学者、各界朋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徐州的朋友，为筹办这次会议，做了大量的周密细致的工作，我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1980 年 9 月在四川眉山成立并举行首届学术研讨会，第 2 届学术研讨会 1982 年在湖北黄冈召开，第 3 届学术研讨会 1984 年在广东惠州召开。此后，第 4 届 1986 年在河南平顶山、第 5 届 1988 年在浙江杭州、第 6 届 1990 年在陕西凤翔、第 7 届 1992 年在山东烟台、第 8 届 1995 年在海南儋州、第 9 届 1996 年在四川眉山（纪念诞生 960 周年）、第 10 届 1998 年在山东诸城、第 11 届 1999 年在江苏徐州、第 12 届 2000 年在河北栾城、第 13 届 2001 年四川眉山（纪念逝世 900 周年）、第 14 届 2002 年在河南平顶山市郏县（纪念葬郏 900 周年）、第 15 届 2004 年江苏江阴市。

除了这十五届之外，还有几次专题大型学术研讨会，就是 1987 年 9 月在眉山开的纪念东坡诞生 950 周年学术研讨会，1987 年 12 月在儋州召开的纪念东坡贬儋 890 周年学术研讨会，2007 年 11 月在眉山召开的纪念东坡诞辰 970 周年的苏轼民本思想研讨会。

2005 年起，学会会址由四川大学迁到眉山，得到眉山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帮助。眉山市成立了三苏文化研究院。现在学会秘书处的工作由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负责，加强了与海内外

学者的联系，创办了刊物《苏轼研究》，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发展的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近年来苏轼研究的新高潮。

苏轼生前大起大落，身后的评价也大起大落，但越到近世，研究越热烈，现在正处在一个新的高潮时期。说是新高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研究队伍庞大。近几十年来，有关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文博单位均有众多学者投身于苏学研究。很多地方（如北京、上海、四川等地）老一辈学者是苏学重镇，而他们的学生研究苏轼，现在学生的学生成也在研究苏轼了。

二是研究成果丰富。近几十年，有关苏学研究著作，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而且学术含量高，许多方面有新的突破。我经常收到各地朋友寄来的新作，看都看不赢。

三是专门研究机构增多。最显著的是有苏轼文化遗迹的地方，纷纷成立了关于苏轼的研究学会。

四是专门发表阵地增多。比如刊物方面，有诸城的《超然台》，常州的《苏学通讯》，徐州的《放鹤亭》，眉山的《三苏祠》、《苏轼研究》；有关大学的学报设立专栏，如《乐山师院学报》、《黄冈师院学报》、《中国苏轼研究》（北京，辑刊）等。以上仅是挂一漏万地举点例子来看。

为什么会出现苏东坡研究的这一新高潮？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两个方面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

第一方面是时代的赐予，或者说是时代的需求。人类的文化创造是一条连续不断的河流。文化传承的实质，就是把不同时代的文化联系起来，

使过去的文化经验为解决当代的任务服务，并从而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形成新的优秀的新传统。在今天，弘扬民族传统，借鉴世界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苏东坡的宏伟丰富的著作，苏东坡的博大深邃的文化精神，就正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资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资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文化资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苏学研究的高潮就是在这个大的时代环境下，顺应历史潮流而必然出现的。

第二方面，从东坡本身看。他是中国历史上永恒地闪耀着自己独特光芒的文化巨星。从“文化”角度看，他是多专长的学者。从哲学、政治学、文论、画论、书论到音乐学、农学、水利学、医药学，都有自己的研究和造诣。从“文学艺术”角度看，他是多面的全能冠军。他的散文包罗宏富，雄辩滔滔，气势纵横，兼有魏晋文风的自由通脱，而又具唐宋文的明白简练，诗情画意，一出自然，代表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他的诗，摆脱束缚，发抒自由，独行其意，命意新鲜，体物工巧，语句畅达而精练准确，比喻丰富而贴切新鲜，是宋诗别开生面、首屈一指的代表。他的词开拓了词坛豪放清旷一派；书法丰腴跌宕，为宋四家之冠。他的绘画是“湖州竹派”的重要代表，竹石自成一格，开文人画的先锋。从“精神品格”的角度看，他是体现中华名族传统文化中优秀道德的一种典型。他充沛的生命活力和无穷的文化创造力，都来源于他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贯穿他全部思想精神的最根本最基础的东西。这就是他爱国爱民、奋力当世的崇高理想；求真求实、探索创新的认识追求；信道直前、独立不惧的处世原则；坚守节操、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苏轼所思考和论述的问题，广泛而深刻地涉及社会与人生，对于后世的人们如何面对生活、开创未来，具有多方面的借鉴和启迪作用。因而，他崇高而丰富的精神境界和卓越的人格魅力，成为后世人们敬仰的典范、倾慕的楷模。

上述两点，是苏轼研究高潮形成的最重要的

原因。

《淮南子·缪称》篇上说：“圣人之道，有中衡而致尊邪？过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高诱注云：“一人来得其心，百人来亦得其心。”苏东坡的著作、思想、精神，就是这位文化巨人为我们设置的“衡尊”，应有尽有（如今之自助餐，能满足各种人的各种需要），永远滋养着后人。

东坡精神对当代的影响，佳话甚多。我这里说一个。

2007年11月在眉山开会，一位女学者文章题为《来生再嫁苏东坡》，她发言全场为之热烈鼓掌。我当时口占二首小诗赞叹此事：

休叹平生坎壈多，文章德业事难磨。
嫁人恨识千年晚，来生便嫁与东坡！

拈花传道佛多情，仁者爱人孔圣心。
历尽沧桑灵性在，人间何处不相寻！

这种文化现象的背后，我们看到东坡的人格魅力穿越时空，在今天所产生的深广影响。

我们今天的会议，是在苏轼作第二任知州的徐州召开。苏轼在徐州作官三个年头，实际时间是一年又十一个月。这两年中，苏轼的活动和著作可以说是集中而浓缩地展现了他的核心价值观，表现了他的精神本质，留下了为后人永远追念的文化遗迹。人们一提到苏轼，就必然要说到徐州。比如苏轼一生到处为民做实事，做好事，而徐州防洪救灾是最突出的。这是感动千古的光辉事迹！又比如元丰元年他在徐州任上写了“上皇帝书”，陈述他的为政主张，内容丰富，如论述利国监一段话非常有名。全书实质理念就是保民生、保增长、保稳定。又比如他关心人民生产生活，关心国防事业，写了“石炭”诗和石潭谢雨

“浣溪沙”词五首，这是较早的工业诗和农村词，不仅思想内容丰富，文笔优美，而在创作理念上有着巨大的开拓，具有多方面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又比如他在徐州做官时，已经是海内外知名的大作家了。熙宁十年高丽使者过杭州，就要求买他的集子回去。而他作为欧阳修之后北宋文坛盟主的地位，恰好是在徐州奠定基础：黄庭坚来信并呈上古诗二首，在这个时候；秦少游首次来拜见并呈诗，也是这个时候；第一次与陈师仲、陈师道兄弟见面，是这个时候；参寥子（道潜）

本期关注

第一次来拜见、呈诗，也是这个时候！秦少游“别子瞻”说：“人生异趣各有求，系风捕影只怀忧。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套用李白语）下文比之为麒麟、凤凰，无限仰慕。联系到黄楼建成后徐州的一系列诗文酬唱活动，可以想见当时的盛况。对后世影响很大，如“日喻”讲认识规律、讲活学之道。《放鹤亭记》讲人生价值、人生修养、生活态度，都是中华文化最宝贵的遗产。

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苏东坡早就预料到了！苏词中最好的词作之一，（在徐州作的）他在夜宿燕子楼，梦盼而作的《永遇乐》中说：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中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这首词借怀古幽梦，抒写宦游羁旅之情，寄寓一种对人生的深沉叹惋。最后一句话，含意深远。他早就料到，他身后必定有一批又一批的文化人要到徐州、到黄楼来凭吊他、忆念他。我们今天开会，弘扬东坡精神，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服务，东坡在天有知，他一定是含笑九霄，热烈欢迎大家到徐州到黄楼来的！所以我认为，做好苏轼文化遗址景区旅游的建设与开发，这本身就是最生动、最形象、最亲切、最深入地弘扬、普及东坡精神，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服务，也是我们苏学研究应该特别重视的一个阵地。

我们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海内外苏学研究，是继续的促进，而且也必将推动徐州市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更上新台阶！

我相信，在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会议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最后我用一首小诗表达我对本次会议的欣喜和希望之情：

泉源万斛溢芳馨，亘古眉山降巨星。
糠粃百家求大道，纵横三教本真灵。
尧风舜雨仁天地，韩笔杜诗并古今。
盛会徐州同仰止，开来继往展群英。

祝各位领导、专家学者、朋友们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2009年9月9日

（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

（上接78页）

徐州市有关部门积极协助，为会议顺利举行提供了各项保障。作为具体承办单位的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作了大量会务工作，对会议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在这里，我代表与会全体代表，向他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各位代表，我们这次会议是在迎接伟大祖国60周年华诞的大喜日子里召开的，这些会议成果也是我们苏轼文化研究学者向伟大祖国献上的一份礼物。本次会议既是一次很好的学术交流，也是各位专家学者间零距离恳谈的难得机会。我们相信，本次会议必将极大地推动苏轼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加强全国苏轼文化研究专家学者间的友谊和合作。我们也衷心期望在苏轼文化研究方面，不断涌现出更多具有真才实学、造诣深、成果丰的顶尖苏轼专家学者，涌现出更多见解独到、学术水平较高的学术文章和专著，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服务于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9年9月10日

（原徐州市市长、市委书记，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会长）



儋州东坡笠屐铜像

“全国第16届苏轼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希龙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

由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与徐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全国第十六届苏轼学术研讨会暨全国苏轼遗址景园旅游发展论坛”于2009年9月9日至10日在徐州召开，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今天就要闭幕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14个省的33个市县150多名专家学者，还有来自日本的朋友。会议开始时，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张志烈先生作了讲话，对开好本次会议和会后的苏学研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徐州市副市长段雄先生在讲话中介绍了徐州情况和徐州快速发展的成就，并对加强苏学研究提出了希望。他们的讲话都使到会代表受到启发和鼓舞。

这次会议，主要有两项议程，一是学术交流，二是参观考察。时间虽短，但内容丰富，收获颇多。本次会议收到论文40多篇，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这些文章学术水平都比较高，在不少领域都有新的尝试、新的突破、新的成果，说明苏轼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令人欣慰。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苏轼文化的宏观研究有所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对苏轼的研究逐步深入，自1980年成立苏轼研究学会至今近30年。这期间，关于苏轼的生平、苏轼的思想、苏轼的作品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纷纷问世，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在此基础上，大家提出了东坡文化的总体把握问题，这次研讨会上论文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周成仕、蔡心华的《东坡文化概述》就是一篇从宏观上研究苏轼文化的力作，文章论述了东坡文化的内涵和形成的主客观条件。文章把东坡文化表述为“东坡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

部分，是以苏东坡为代表的集苏洵、苏辙文化成就而形成的融哲学、历史学、文学、领导学、军事学、养生学、美学、烹饪学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现象。”文章还指出了东坡文化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并上升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且反作用到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了门类众多的产业，如文博业、餐饮业、建筑业、文学艺术团体等。这种宏观论述的尝试，有开拓指导意义。从宏观上阐发东坡精神的另一面文章是陈弼的《苏东坡魅力和精神的探讨》。2008年，眉山把“东坡精神”概括为16个字，四句话：“关注民生、勇于创新，和谐相处，自强不息”。陈弼的文章对这一表述提出了修改意见，这种比照探讨，也给人以启发。

从政治和思想上研究苏轼的有高纯林的《苏轼的变革思想及其实践初探》、陈慧君的《苏轼的社会变革理论与探索》、苏灿的《论苏轼的廉政理念》、刘艳琴的《苏轼的富民强国思想及其历史现实意义》、杨胜宽的《富民之路竟在何方——苏轼关于国家财产分配的思考与困惑》，其中刘艳琴和杨胜宽关于苏轼的富民强国思想的论述，有一个相同的观点，就是在富民和富国关系问题上，在苏轼那里是个无解的方程。一切封建专制统治者，总是把富国置于富民之上，这就是苏轼无奈的困惑。希望专家学者进一步深入探讨。

赖正和的《苏东坡一生为民请命》则用大量史实、论证了苏东坡的为官之道和做官原则，揭示了苏东坡亲民爱民的这一高尚品质，这无疑对今人不无借鉴意义。

二、研究的角度有新的开拓

曾枣庄的《身行万里半天下——论苏轼的杂记文》通过对苏轼60篇杂记的疏理分析，不仅让

我们领会到苏轼杂记的特色，还揭示了一种做学问的方法，那就是先要对文献作一个辨伪、编年的工作，然后再仔细研读。这也是大师对后学者的一种示范。吴继路的《苏东坡亭文化展观》和刘清泉的《东坡亭台》则是从苏东坡与亭的不解之缘，赋予建筑物以文化内涵，昭示了苏轼的才情和意趣，研究角度颇为别致。张永芳的《苏轼论养生》通过全面介绍苏轼的养生理论和实践，揭示了苏东坡的放达、适性、平和、淡然的精神境界。

陈冠明的《论三苏的‘六国论’史论》，张斌的《苏味道与苏轼的比较研究》，则是通过分析与苏东坡密切相关的历史名人的异同来揭示苏东坡的主张和品格。这种研究方法的好处是有了参照对比，更易突出彰显苏轼的特点。另外，袁成兰的《苏东坡在徐州》，则以剧本的形式，形象地再现了苏东坡当年在徐州的活动。这种文学尝试在徐州的苏轼研究中还是第一次。

三、苏轼的遗迹和作品考证有了新的成果

何家治的《三苏父子的出生地——眉山县纱縠行（sha hu hang）》、臧伟腾的《苏公祠考》，用确凿史实考定了眉山三苏的出生地和蓬莱苏公祠的确址。李世明的《苏轼在徐州诗文篇目考》，通过艰苦的查阅、收集，重新认定了苏东坡在徐州创作的诗词篇目，为苏轼研究提供了有用资料。刘继增与袁桂娥的《苏洵苏轼昆阳城诗赋若干问题辨证》对昆阳城的地址，苏氏父子的行迹和作品的流传，作了疏理。尤其是苏轼30世孙苏肇平先生的《眉山堂苏氏为苏轼长子长孙后裔》，依据家传的眉山堂族谱的记载，详细介绍了苏迈定居徐州城南苏家湖和其后族人流散皖北、苏北、鲁南、广东、广西乃至全国各地的情况，为苏轼文化以及家谱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四、开拓了苏轼遗址景区旅游发展研究领域

对苏轼遗址的保护、修建和开发利用，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这方面的论文有马湘君的《东坡文化遗迹景区旅游发展浅谈》，该文论述了这些年全国各地东坡文化遗址旅游开发的情况，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了加快东坡文化遗址旅游发展的五点建议，对各地苏轼遗迹旅游开发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王文斌、王海伟的《苏轼梦圆彭城山水——徐州建设全国最大的苏轼文化游览区纪实》和《我眼中的徐州

苏轼文化游览区》二文介绍了徐州打造全国最大苏轼文化游览景区的发展历程。惠光启的《千年徐州应重建千年胜景放鹤亭》，对市政建设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齐会斌的《苏轼与凤翔东湖》介绍了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凤翔历史和建造国家级旅游景点东湖的盛况。还有的学者在论文中提出苏轼遗址城市缔结苏轼文化旅游联盟的建议，这对发展苏轼文化旅游具有积极意义。

五、学术研究出现了商榷争论的可喜现象

赖正和的《读‘康震评说苏东坡’后与康震商榷》一文用大量事实，对北师大教授、文学院副院长康震关于苏东坡政治保守、反对改革以及打击报复改革者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实际上是对苏东坡、王安石二人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比较研究，更加突出了苏东坡政治主张的合理性。这样的文章针对性强，观点鲜明，可读性强。我们应该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比较和争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苏学研究才能出更多人才、更多力作。

六、对苏轼作品研究更加丰富

本次会议收到的关于苏轼的生平和作品研究方面的论文较多，言之有据，论之有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有独到之处，大大丰富了苏轼研究的内涵，这里就不作一一详述了。

先生们、女士们，十年前的1999年10月26日，在苏轼离开徐州920周年的时候，在徐州举办过第十一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十年后的今天，各地专家学者又欢聚徐州，举行第十六届苏轼学术研讨会，也是对苏轼离开徐州930周年的纪念。这次会议得到了徐州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高度重视。市委曹新平书记亲自过问，对办好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批示，又在百忙中出席本次会议。市人大刘忠达主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邹徐文部长、市政府段雄副市长、市政协赵彭城副主席、市政府周建洪秘书长等领导都出席了本次会议。市政府和有关部门还精心安排了参观的景点景区，使会议代表目睹了徐州苏轼文化景区和历史文化名城的风采，认识徐州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厚，感受徐州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徐州山清水秀，旅游资源丰富，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景点最多的苏轼文化旅游景区，与会代表对徐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苏轼文化研究和旅游景点建设留下了深刻印象。（下转76页）

关于创立苏学发展学的构想与建议

孟昭全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开创苏轼文化研究的新局面，特提出本构想与建议。

一 关于苏学发展学的概念

什么是苏学发展学？苏学发展学是研究应用苏轼文化发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一门科学。

苏学分为理论苏学（或苏学理论学）和应用苏学（或苏学发展学）。前者，重点研究苏轼文化，包括生平、思想、作品和研究等；后者，重点研究苏学如何为现实服务，为苏学构建雄厚的社会基础。两者相互关联，不可截然分开。

苏学发展学的精髓，是苏学研究的“三化”，即政治化、社会化、群众化。

政治化——就是把弘扬苏轼文化提高到有利于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高度来认识其重要性。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以及民主党派都要负起各自应负的历史责任，结合执政和参政实践来弘扬苏轼文化。广大的公务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县处级以上干部是重点）都应学习和研究苏轼从政为民的精神。

社会化——就是社会各阶层人士，都要熟悉苏轼的生平事迹，并要结合各专业的特点对苏轼进行研究，从而形成全社会全方位弘扬苏轼文化的格局。

群众化——就是苏学研究要面向群众，面向机关、学校、厂矿、企业、农村、部队等基层单位。广大干部群众都要结合自身实践，对苏轼文化进行学习和应用。

苏学发展学的灵魂，是东坡精神的“四进”，即走进机关，走进基层、走进课堂、走进千家万

户。

苏学研究的“三化”，重点在搞好苏学研究，东坡精神的“四进”，重点在弘扬东坡精神。两者相互关联，后者更是弘扬苏轼文化的归宿点。

苏学发展学强调，苏学研究要实行提高与普及并举的方针。既要重视专家学者的作用，又要重视广大干部群众的作用；既要重视对典籍的整理研究，又要重视社会实践，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在人类社会和科技发展史上，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个概念的提出和运用，会改变人们一系列的做法，从而获得前所未有的效果。创立苏学发展学是弘扬苏轼文化中的一个新概念。笔者坚信，这一概念若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运用，一定会给苏学研究带来革命性的进步。

二 关于创立苏学发展学的途径

（一）解放思想，勇于创立新学说

近几年来，我常思考一个问题：苏轼生在眉山，成长于中国，授予苏轼“世界千年英雄”美称的，为什么是法国人而不是我们中国人？就苏学知识而言，中国人比外国人差吗？显然不是。问题症结何在呢？我认为关键在我们的思想解放不够，创新精神不足。

在中国的历史名人中，苏东坡是勇于创新的典范。只要我们用东坡精神开展理论创新，苏学发展学是一定能创立成功的。

（二）对苏学研究的现状和前景进行评估

建议中国苏轼研究学会邀请中共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教育部、文化部、民政部，以及著名科研院所等高层部门和苏学界一道，

（下转 41 页）

远追东坡遗韵，近承时贤风流

——“全国第 16 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在徐州召开

本刊讯(白水)9月9—10日，“全国第16届苏轼学术研讨会暨全国苏轼遗址景园旅游发展论坛”在徐州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徐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承办。

研讨会共收到论文40多篇约40万字，涉及宏观研究、遗址研究、作品研究、旅游发展、商榷争鸣等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内容；来自国内14省35个市县和日本的150多名专家学者，零距离对话，新视点碰撞，远追东坡遗韵，近承时贤风流，交流研究成果，达到了预期目的。

2007年眉山市政协“东坡足迹万里行”考察团实地考察了苏轼出生、任职、贬谪和安葬地18

城市，初步统计有苏轼文化景点500多个。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苏轼文化18个市(县)对苏轼旅游文化的高度重视，打破地域观念，开发中国苏轼文化旅游线的构想，成为“全国苏轼遗址景园发展论坛”的关注论题。与会代表共同探讨和研究助推东坡文化产业发展、打造苏轼文化游览线路、缔造苏轼文化旅游联盟事宜，取得了重大突破。

2009年，是苏轼离任徐州知州930周年，为怀念苏轼在徐州的业绩，展示全国最大的苏轼文化游览区——云龙山、云龙湖的靓丽风采，继1999年成功承办第11届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之后，徐州再次承办了第16届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

说东坡 品东坡

——康震莅临眉山

本刊讯(流水)8月4日至5日，由眉山市东坡区委、区政府主办的苏东坡文化报告会、座谈会分别在眉山市会议中心和眉山宾馆隆重举行。

4日下午2时30分，“百家讲坛”《苏轼》主讲，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康震教授为东坡区委中心组专题(扩大)学习会的1000余名副科级以上干部作了题为《诗词、境界、人生——我心目中的苏东坡》的主题报告。

5日下午2时30分，康震教授与眉山籍苏学研究专家、苏学研究爱好者、文化界人士30多人

共聚一堂，围绕东坡文化的研究与传承进行学术交流。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周成仕，市政协副主席张忠全出席座谈会。

与会人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分别从苏东坡的文学、政治、人格等多方面广泛展开交流，认为苏东坡的文学艺术、执政理念和人生态度值得后人深入研究并发扬光大。与会人员还对包括四川省三苏酒业有限公司在内的企业用多种形式参与宣传弘扬东坡精神给予了极大赞赏。